日本为什么「成功」

VISIT…

2 020 7876 8

日本为什么“成功”

—— 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

〔日〕森岛通夫 著
胡国成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杨忠学
封 面 图：广 军
插 图：王贻华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日本为什么“成功”

胡 国 成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9.375插页6 字数140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64 印数：1—60,000

定价：1.35元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lh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日本为什么“成功”

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

〔日〕森岛通夫著

胡 国 成译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咨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衡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斌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秦晓鹰　贾新民　翁永曦　唐若昕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卷，第16页。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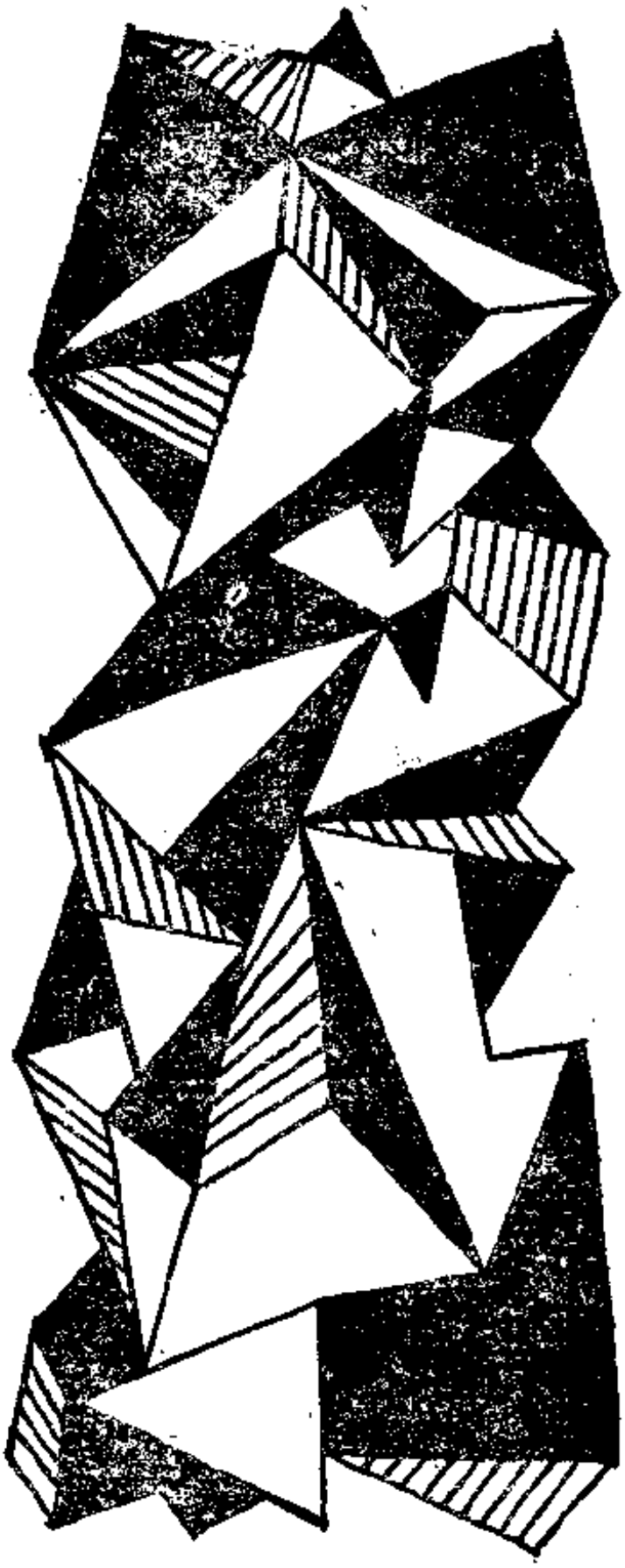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导言……（2）
第一章　大化革新及其后…（30）
第二章　明治维新……（78）
第三章　日本帝国(之一)…（132）
第四章　日本帝国(之二)…（182）
第五章　旧金山政体……（230）
结论……（280）



导　言

1

卡尔·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而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则证明了与此相反的关系的存在，他认为，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将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它必然兴盛起来。韦伯正是运用这种观点考察了世界的主要宗教。

韦伯所得出的关于儒教的结论可以归纳如下：儒教，正像清教一样，是出于理性的；不过，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差别：清教的理性主义寻求运用理性去控制世界；儒教的理性主义则试图在一种理

性的方式中使自身去适应世界。韦伯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儒教信奉者的这种思想方式，正是阻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主要因素。

尽管结论是这样，韦伯仍然承认："中国人很可能有很强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不比日本人更强，也会和日本人相当）吸收在近代文化领域中技术和经济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是，必须指出，日本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是日本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教。由于韦伯很少明确地谈到日本，这一点就不是很清楚（至少从他的《儒教和道教》中来看），他是否认为日本是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此外，韦伯是否认为日本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是与遵奉新教伦理道德的"现代资本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这一点也很不清楚，韦伯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论断。不过，尽管有这些缺欠，上述韦伯的这些论述本身却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希望阐明这个事实：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日本的儒教是非常不同于中国的儒教的。此外，与儒教同时传入日本的道教，经历了相当大的改造，发展变化为日本的神道教。在欧洲，由于对相同的《圣经》作出不同的解释，其结果是

耶稣教与天主教决裂；然后耶稣教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行为伦理道德，即韦伯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此情形完全相同，日本的儒教开始时与中国的儒教信奉同样的准则，但是由于对这些准则所作的不同研究和解释，其结果是在日本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风行于中国的民族精神。在欧洲，由于各国之间领土相连（与日本和中国大陆以及朝鲜半岛之间的距离相比较，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岛国，与欧洲大陆也不过是被英吉利海峡所隔，实际上和与邻国相连差不多），而天主教又是首先被传播开的，因此，后来一切从天主教信仰的怀抱中脱离出去的行动都必然导致一场反叛或者革命。

但是，在一个地理位置与别国隔离的日本国中，中国的儒教要以一种未经改造的形式传播是 不 可能的。从一开始，日本国民就或多或少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接受儒教准则，并且对这些准则做出不同的解释，这是必然的。宗教革命很快（也许是不自觉地）就在来自中国和朝鲜的船上或是日本的海岸上开展起来。如果人们承认对同一个《圣经》的不同解释，能够在不同的民族中培育出相异的民族精神，并有助于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那么，应该说这种理论不仅应 用 于 西方时肯定正

确，在应用于东方时也肯定正确。

儒教把仁慈（仁）、正义（义）、礼仪（礼）、学识（智）、信义（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并且相信仁是人类本质的美德。儒教相信人性从根本上来讲是善良的，特别是认为家族内部亲戚之间的自然影响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根据孔子的说法，道德的实践既不在于人们履行天命，也不受任何出类拔萃之辈的控制。当家庭内部成员间的慈爱被毫无敌意地扩展到家庭之外，如扩展到非家庭成员和完全陌生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人性便达到了完美的地步，社会秩序也就被恰如其分地保持住了，那些具有这种完美的人类之爱的人被称作仁慈的人，或有道德的人（仁者）。

孔子认为，成为这样一种人应该是--切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可以认为，孝顺（孝）和履行作为弟弟的责任（悌）成了儒教最重要的美德。孝顺的内容包括尊敬父母，好好地照顾他们并按照他们的愿望行事；作为弟弟的顺从意味着要追随兄长的愿望。此外，和谐（和）是达到仁慈所必不可少的。和谐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一致并在社会内部保持一致；不过，“和”这个概念也包括这样一种和谐：提倡一个人盲目地追随他人，这基本上是有害

的。同样，勇敢（勇）也被经常认为是达到仁慈的一个先决条件，不过，一个勇敢的人倒不必一定是个仁慈的人；勇敢必须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孔子憎恶那些没有礼貌的人，即使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忠诚（忠）和信义（信）是两个真诚方面的美德。忠诚指的是一种自我意识上的真诚，即一个人没有虚伪和私心；信义则意味着总是讲真话。因此，信义是忠诚的外在表现。忠诚是存在于自我关系中的一种美德，而信义则是存在于与他人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美德。但是，遵守一种从事非正义事情的诺言却是一个错误的行动，因此，忠诚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是完美的道德。忠诚只能够和正义，或正当（义）连在一起来履行。同样，仁慈（仁）这个最重要的美德也必须与正义揉和在一起，并由学识（智）来增强；一种简单的、自发的仁慈是不够的。孔子是这样来描述一个真正的君子（或具有完美的德行的人）的：

>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
> （《论语》第十六篇）

孔子提倡他所谓的道德治理的原则，这意味着一种通过道德方式来提高人民的素质的治理方法，这种治理方法自然是有助于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而带来社会的秩序。他强烈地反对任何法治的观念，他的理由是：在立宪政体的原则下，秩序是由法律强加给社会的，那些破坏法律的人受到处罚，这就使得人们去考虑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逃避处罚。结果，社会就丧失了羞耻心。不过，即使是在一个德治原则统治下的社会里，某些与在法治社会中见到的法律相类似的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礼，或叫礼仪。他所说的礼指的是由习惯所建立起来的准则，而习惯显然不如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孔子的格言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如能这样，孔子认为，国民将“有耻且格”。孔子的信念是：社会地位高的人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依据“礼”的准则来行事。统治者与他的臣民打交道必须合乎习惯所规定的风尚；富人也必须用礼仪并根据礼仪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和言论。

然而，日本所理解和传播的儒教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一点，从1882年天皇给日本军人所下的命令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命令是按照儒教的观点写成的，但决不是一个给有限的社会集团，即军人规定

的特殊道德法规。明治政府建立以后，传统的等级制度即被废除，武士阶级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征兵制开始实行。结果，保卫国防的义务落到了全体居民身上，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士兵。天皇给陆海军士兵的命令是在这样一种考虑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同时也是天皇给全体人民的必须遵奉的国家命令。这个命令强调了儒教的五个美德（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但是却没有特别地考虑到仁慈——这个中国儒教的核心的美德。人们可能会说，在这个专门针对军人或潜在的士兵所下的命令中，忽略仁慈的美德是很自然的。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命令和那些可以被看作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或古代朝鲜的军人或武士精神的本质的东西作一个比较的话，日本儒教的某些特征就会显得分外清楚了。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军人精神的必要素质是学识、信义、仁慈、勇敢和严格；而在古代朝鲜的新罗朝代，根据“花郎道”（相当于日本的武士道）为士兵规定的品质是忠诚、孝顺、信义、仁慈和勇敢。只有信义和勇敢才是所有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美德；仁慈是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共同美德，而日本则根本就没有提到它。忠诚是日本和朝鲜两国的共同美德，可是却没有出现在中国所开列

的美德的清单中。

忽略仁慈而强调忠诚，只能被看作是日本的儒教所独具的特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仁慈在中国被认为是儒教的核心美德；而在日本，即便是在604年圣德太子发布的十七条宪法（它是在儒教的严重影响下写成的）中，也没有把主要的重点放在这上面。但如果说仁慈的美德在整个日本儒教历史中一直被完全忽略，那也是不真实的。然而，对仁慈的相对忽略绝非仅自明治时代始，它可以追溯到相当远的时期以前。在日本，是忠诚而不是仁慈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美德，当日本接近近代时期的时候，这一点就越发变成了事实。

此外，忠诚（忠）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也不相同。如前所述，在中国，忠诚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在日本，虽然它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但是它的准确的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这种献身可以达到为自己的领主而牺牲生命的程度。结果，孔子所说的“臣事君以忠”在中国被解释为“臣子必须以一种不违反自己良心的真诚去侍奉君主”，而日本则相应地解释为“家臣必须为自己的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这样，在日本，忠诚、孝顺和对年长者的义务一起

塑造了一个价值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在社会内部调节着以权威、血缘纽带和各自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在日本，忠诚和信义的概念无疑被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在中国那样。

从德川时代以来，这种关于忠诚的观念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德川时代末年，它变得格外清楚，并在日本人民中间传播开来。对忠诚的这种看法并非始自最近，早在《万叶集》（一本七世纪下半叶汇编的诗选）时代，诗歌就表达了对天皇的忠诚。公元749年，诗人大伴家持写道：

> 在海洋里，我的躯体在水中沐浴，
> 在陆地上，我的躯体与丛生的青草为伴，
> 让我死在我的君主身旁！
> 我永远不会感到遗憾。

公元753年，一位戍边的战士写道：

> 父母啊，我将不再把家回，
> 我要成为陛下忠顺的盾牌。

人们时常能够发现，这种为自己的君主尽心效

图书馆

力的忠诚与对自己的良心真诚的那种忠诚是相互冲突的。不过，在日本这种矛盾并不严重。日本在1945年以前，类似出于良心的和平主义运动的方式基本是不允许的（1945年以来，日本宪法在名义上排除了战斗部队的存在），因此，在日本早期，君主的命令被认为比个人的良心重要得多。迄今为止的整个日本历史上，个人主义从未昌盛过。结果，实际上也就无人强烈地、认真地提倡过自由主义。日本人一直被要求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在社会中按照多数派的意见行事，没有留下什么余地来解决良心的问题。

这样一种对忠诚的解释也是与孝顺（孝）与和谐（和）相矛盾的。这是因为统治者的命令很可能与父母的愿望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舆论相矛盾。正如我们将要在后面所见到的那样，日本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圣德太子（573—612）禁止天皇专政，以使他的命令不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舆论相矛盾。即便如此，天皇发布的命令仍然可能与父母的愿望相冲突。平重盛（1138—1179）恰好就遇到了一个像这样的自相矛盾的情况。对此，他哀叹道："如果我想要证实我的忠诚，我必然被认为是不孝；如果我试图表明我的孝顺，我将会不忠。"不

过，重盛死后很久，日本人也许已经撇下了孝顺而选择了忠诚，即使在天皇的命令没有反映大多数人的感情的时候也是如此。当天皇发布了一个不合理的和专制的命令的时候，那些战胜了自己的良心而服从主子的命令的人就成了忠诚的臣民；那些按照自己的良心和社会上多数人的舆论的支配而拒绝服从的人就成了不忠的臣民。日本人并不指责这样一种缺乏良心的人，当他处于一种没有能力遵循自己良心支配的悲惨境地时，他只会赢得人们的同情。中国的儒教是这样一种儒教：仁慈在其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而日本的儒教则是以忠诚为中心的儒教。在第一章和随后的章节中，儒教这个词的使用是指这类的日本儒教。

2

我们所清楚知道的日本史的最早阶段大约是公元四世纪的历史。从圣德太子公元604年发布十七条宪法以前的三个世纪直至今天，其间有1,650年。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皇室一直是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家室，不过，在这整个阶段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里，天皇才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统治者。在其余的时间中，实际控制权旁落在摄政者、主要顾问（关白）、退位天皇、幕府将军（军事领袖）和其他人手中，天皇不过是傀儡。有时，太政大臣代理退位天皇，摄政者代理幕府将军，这样，使得退位天皇或幕府将军也成了傀儡。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时候，任命主要顾问、退位天皇、幕府首领等的权力也在天皇本人。因此，在名义上，他仍然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他一直继续掌握着自己的行政机构，即保留着皇家朝廷。这意味着日本历史上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内都有二个、有时是三个政府。除了古代和明治维新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存在过天皇直接管理下的单一政府外，两个政府时期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时间中，真正的政治权力被幕府将军或首要大臣，或军事力量所支持的顾问所控制。在中国的影响下，一种官僚主义的制度很早就被介绍进了日本最初的天皇政府，并使与之平行的军事政府最后也高度地官僚化了；但是并未形成平民控制军队的传统。

相反，中国有着一个纯粹的平民官僚主义制度。中国大陆如此辽阔（至少用近代以前的通讯方式的标准衡量是如此），使得单一的中央政府行使

控制权非常困难；但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全部领土（在不同的时期领土面积各异）确实是由一个统一的帝国政权来控制的。当然，在中国也有骚乱的时期，也有几个王朝分地割据、相互并存的时期，孔子在世的时期（公元前551—479年）就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周王朝丧失了自己的权威，几个诸侯国相互征战，周王朝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周朝之后，秦始皇把全部地区统一在他的控制之下，建立了单一的大帝国；从此时起，到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其间约有2,100年。这当中，有大约500年的时间中国是处于几个地方性的王朝的割据之中；另外的1,600年，它是统一在不同的全国性的王朝控制之下，这些全国性的王朝中，例如汉、唐、明、清，都持续了200年以上；其余的朝代不超过30—40年（原文如此——译注）。因此，任何一个王朝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不得不是如何延长它自身的存在；不论在何种形势下，平民官僚制度都被几乎所有的统一的王朝作为传统而采纳。

孔子的最大成就也许在于对广大人民开放了文化和教育，这在以前是被贵族所垄断的。孔子死后，门徒星散，其中一些人开始在封建国家中服

务，卷入政治，成为官僚，由于孔子本人倡导德治的原则，而反对法治，他的门徒也绝非履行法律、实施行政之辈；他们或是政治家，或是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推荐给统治者的政治顾问。对下一代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是教师。这样，在孔子死后的一个阶段中（当时中国分裂成了几个小国），便出现了被完全由儒教原则训练出来的官员所统治的平民的封建小国，而这些小国成了后来中国绝大多数统一王朝的样板。

然而，孔子死后统一个统一的王朝秦王朝（公元前246—207年），是反对儒教的，也不遵循“德治”的原则。秦始皇禁止拥有关于儒教及其他学识的书，命令把这类书烧掉，并屠杀了大批的儒生。然后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竭力推行法治，最终建立了一个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为基础的绝对专制君主制国家。秦始皇致力于修筑万里长城、巨大的皇宫和行宫，还不断地对外国用兵。结果他死后，在遭到残酷剥削的农民中间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这个大帝国（他希望自己已经在其中建立起了使其成为强国的法律和军事基础）最终成了短命鬼，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崩溃了。

接着秦王朝之后的汉王朝（前汉，公元前206年

一公元8年；后汉，公元25—220年）很自然地从前朝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汉王朝复活了儒教。不仅如此，它实际上承认儒教做为国家的正统观念。儒生及儒术受到尊重；知识分子被允许进入政府，那些与王朝有关的人和富人反倒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同时，汉王朝采纳了自己所认为的秦朝的长处，制定了一部法典，同时配备了一套官僚制度。此外，规定地方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在先秦时代，地方省份一直是分封给皇室亲戚的，帝国的中心和地方省份由皇室的血缘纽带联系在一起。秦朝已经废除了这种中国的封建制，而建立了一种“郡县制”。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汉朝初年，也把地方省份分配给皇室成员，但这些任地方长官的皇室成员被强迫住在首都。他们的领土权完全成了名义上的，从而使郡县制得到完整的执行。政府能够从社会的每一个阶级中吸收有才华的人参政，任何人只要接受了充分的儒学方面的训练，他就不仅能够成为一名普通官员，而且能够升为宰相或者是地方行政长官。此外，以这种方法选拔的平民官员掌管了军队。逐渐地，一种通过全国性的考试以踏入仕途的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制度到了唐朝（公元618—907年）前期已经多少臻于完

备了。

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每年要把来自首都和各省的学校毕业生召集在一起。他们一起参加考试，成功者被任命为官僚。贵族阶层的孩子在这种考试中占有优势，因为考试是这样一些内容，例如：一个人掌握儒教经典的程度如何，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如何，他的文章是否能够写得好，他的推理能力如何。不过，中等阶级或小地主的儿子以及其他出身低微的人也确有获得成功的机会。这样，中华帝国的原型，包括它的在儒教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它的郡县制度，它的通过考试任命官员的官僚制度以及它的平民控制军队的制度，到十六世纪末期实际上已经完备了。当日本开始与中国接触时，中国已经达到了上述的发展阶段。

推翻这类王朝的力量来自农民、宦官和那些居住在中国北部边疆的民族。有时，是这些力量因素中的某一个推翻了某个王朝。但是，经常是其中的两个或所有三个因素共同推翻了当时的政权。一个王朝的覆灭可能循着下列的典型形式。皇帝由于某种原因在年轻时便死去了（由于中国皇帝有一种醉心于放荡生活方式的倾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年轻时就死去了）。由于把皇位传给兄弟已不再是中国

的习惯，因此皇位将由太子继承，他可能还是个孩子。真正的政治权力将会旁落到皇后（皇太后）或者她的双亲、兄弟手中。当皇后本人秉政时，宦官掌管事务的发言权通常是最大的〔除了正式册封的皇后（这只有一个），中国皇帝拥有一百多个妃嫔，她们的等级森严，皇帝还拥有成千的宫娥。宫中的事务由宦官掌管，宦官人数有几千，有时还超过一万〕。此外，当皇太后的双亲行使权力时，宦官的影响经常想方设法超越这种皇太后双亲的影响。在宦官所控制的地方，没有他们的同意，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为了办事，贿赂就成为必须的了。官员们向农民课征重税来贿赂宦官。结果，农民起义和骚乱就会爆发。在接下去所发生的混乱中，少数民族就会乘机越过长城，入侵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即中原——译者注）。军队被派去抗击敌人，反过来，这又会使征收更为沉重的赋税以应付战争支出成为必要。于是，农民变得更为不满。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中，如果政权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国家的力量立刻就会开始衰落，王朝的覆灭便不可避免。

所有的朝代都是经历了与上述过程非常类似的一系列事件而垮台的，虽然各朝代都有一些变化。

一个朝代是否能够持久完全取决于它的农业政策，然而恰如其分的政策却很少采用。在古代中国，存在一种所谓的井田制。按照这种制度，任何一块一定规模的土地都被划分为九等份，它们被分配给八个家庭耕种，中间部份（这种划分是按三乘三的形式进行的）由八家共同耕种，收获物作为税款交纳政府。如果不考虑地方性因素的话，这种制度似乎已经完备了。隋、唐两朝都曾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土地分配办法，但所有这些意见都被中唐时期的规定所最终废弃。于是，农业政策的虚弱在农民中间激起了骚乱，最终酿成了唐朝的覆灭。很具典型的是，当后来的王朝建立时，儒生又占据了政府的所有部门，权力又控制在官僚知识分子手中，有关农民的政策又像以前那样受到忽视，皇帝本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被激怒了的农民还要起来暴动，这个王朝最终又将覆灭。

如果把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的这种王朝统治相比较的话，我们将会发现某些主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皇室的统治未被打破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总的来看是一个王朝国家。不过，除了有数的几年外，从1192年到1867年的整个历史阶段中，这个国家都有着两个政府，即天皇的政府（朝廷）和幕府

将军的政府（幕府）并存。朝廷是平民官员所控制的平民政府，而幕府则是由军人控制的军事行政机构。由于朝廷早在幕府之前即已建立（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并且采用了中国的模式，因此它是一个有着一部法典的政府，是一种平民官僚制度；而德川幕府（1603—1867年，在所有的幕府机构中它是组织得最好的武士政府）则是一个建立在世袭制度上的军事官僚政府。在日本，皇室和幕府将军都从未拥有过像中国皇帝那么多的妻妾，与中国的朝廷相比，日本皇室和将军家室都过着无可指责的节俭生活。此外，在日本设有宦官。皇室信奉的宗教是日本神道教，但是天皇行政机构的官僚们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却是儒教，而德川幕府的官员们也信奉儒教。如果把德川时期的日本和中国做一个比较，人们势必会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平民的儒教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军事儒教国家。中国的儒教由于把“仁”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因此它很好地适应了存在于中国的那种统治结构。日本的儒教，从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领主牺牲全部生命这个意义上看，是把忠诚视为核心的美德，它是与日本的武士统治相一致的。因此，这两个国家形成了与各自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统治结构。

德川时期的武士按照下述的逻辑把他们道德上的义务（忠于天皇）和两个政府并存的实际情况调和起来。他们熟知在家族关系中的忠诚。普通武士与平民忠于他们的直接领主——大名（日本中世纪时期的大封建庄园主——译注）每一个大名都忠于幕府将军，而将军则忠于天皇。从这个忠诚的等级模式来看，全体人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忠于天皇。只要这种忠诚的等级制度存在，无论是两个政府还是封建制度就都不会导致任何伦理道德上的冲突。每个人只需考虑自己对这个等级制度中的顶头上司的忠诚即可以了。不过，有时某个大名没有履行其对将军的忠诚，或者将军无视天皇。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怀疑这种对日本儒教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忠诚，并且开始对哪些人应该获得忠诚表示疑问。当人们认定应该忠于天皇，号召“尊皇”、“倒幕”的运动就会兴起，这时幕府就会发现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事实上，在德川时期的末年，日本处于西方国家要求开港的巨大压力之下，幕府对如何处理这种危机不知所措。有时，它无视天皇（朝廷），有时，它又错误地将责任推卸给朝廷。由于它这样做，人们开始认识到，幕府并非是按照日本的意识形态来行事

的。

中国的儒教无论怎样说都是人道主义的，而日本的儒教显然是民族主义的。这种差异可以很好地从下述事实反映出来：中国总有一种“中央王国”的观念（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在那里，文明如盛开的鲜花一样），而日本则产生一种自卑情绪。日本总感到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力之下，结果也许已经变得过份谨慎防范了。它本能地觉察到，要想在东亚这个角落里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节俭和勇敢。由于日中两国文化上的不同在五、六世纪时最为悬殊，当时日本最初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它本身仍处在野蛮阶段，为了生存，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很早以来就是日本儒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十六世纪，当日本与西方国家开始接触时，它再次被迫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

自卑感最终导致德川幕府采取了一项锁国政策。德川时期末年，当任何进一步的锁国变得显然不可能的时候，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浪潮。日本国民完全改变了行动的方向，开始全力以赴去获取西方的技术。中国的官僚机构是由那些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和擅长诗文的人组成的，而日本的武士官僚则对武器感兴趣，因而也就对科学技术感兴

趣。两国也许都是孔子的门徒。但是，中国的官僚呆头呆脑地反对西方的科学，而日本的政府，从德川幕府直到明治维新以后的帝国政府，却显示出对获取这种科学的热情渴望。西方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个人对自由的追求，而在日本，正是为了消除日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军事与科学技术上的差距，才开始了一场急行军。在这场急行军中，要求每个人不仅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必要的话，还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他的所谓“忠”——伦理道德上的支柱。

当我们以这种观点来考察日本的发展时，日本史上有两个特殊的阶段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个阶段是从六世纪末到七世纪中，当时日本被迫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华帝国对它的压力。第二个阶段是德川幕府末年，当时日本被迫屈从于西方强国的先进技术。在这两个阶段中，日本分别完成了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成功地应付了当时所面临的难题。在下一章中，我考察了大化革新，在第二章中，考察了明治维新。这两章可以被看作是第三至五章的序曲，在三至五章中，将讨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第三章讨论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这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在明治政府强有力的指导下，日本经济看来取得了稳定而显著的发展。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儒教的世俗化和日本的骑士气概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儒教的世俗化在德川将军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已开始，明治政府通过强制教育的方式来传播儒教，又使得这个过程加快了（在德川时代，儒教在普通民众中尚未流传开）。按照明治时代的儒教的解释，武士的精髓存在于他所受的教育之中。因此，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是一个工人，如果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武士”。事实上，在德川时期末年，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或商人与一个武士的女儿结婚，已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事情了。由于明治时代教育普及了，武士阶级支持儒教广泛传播，于是，儒教变成了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而并非仅是政府和上层人物的意识形态了。

一个儒教风行的社会是一种“文凭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是以他受教育的程度来分类的。一个做工的人，只要他受过教育，就会像一个受过同等教育的武士一样得到别人的尊重，他们都被人们看作是知识分子阶级的成员。尽管在日本存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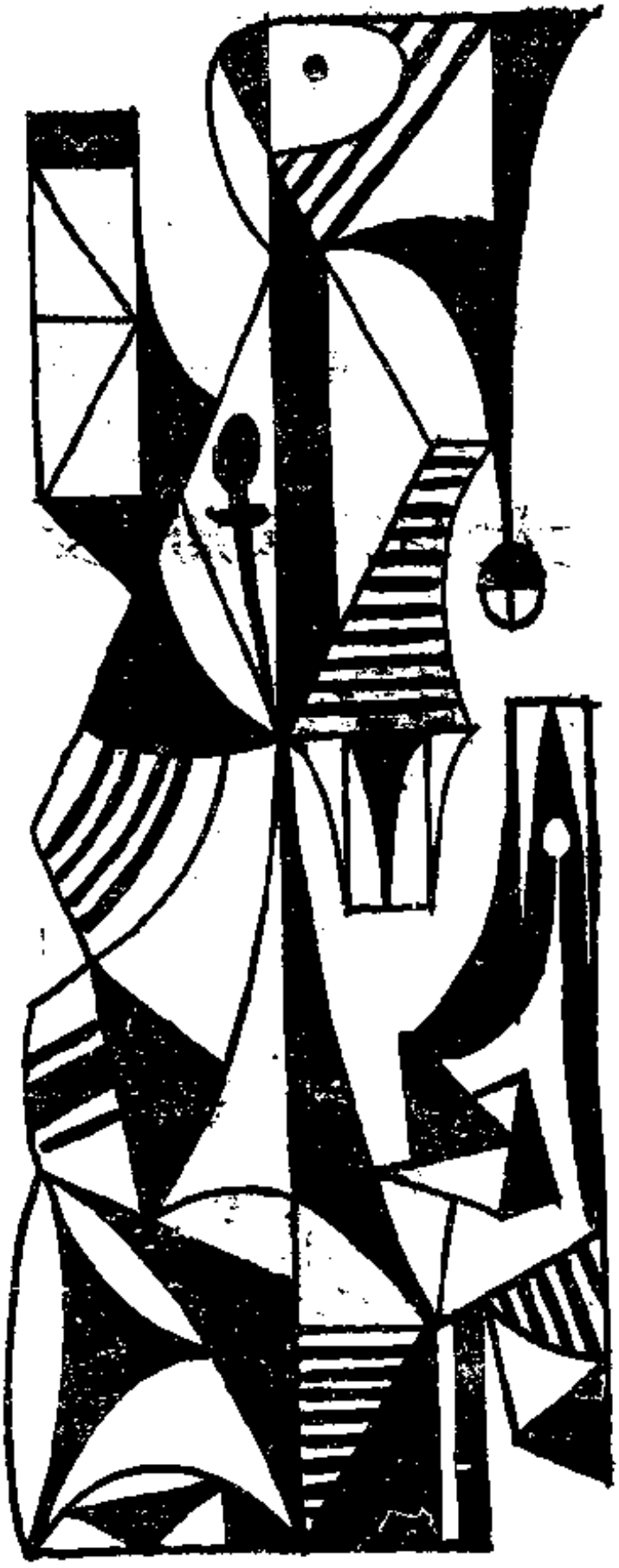
等级制度，并且在此之前已存在了280年之久，但武士和受过教育的农民、商人之间的社会流动性从德川时代末年以来仍然是相当大的。因此，即使是明治时代资本主义形成以后，日本人也没有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经济，没有把他们的社会看成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阶级社会。此外，明治政府在废除等级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先是创立了近代的教育制度，后又雇用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到政府部门工作而不问其家庭背景如何。近代日本在一个值得赞扬的有效的君主立宪的官僚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一场奇迹般的经济与军事上的扩张。

第四章讨论了战时阶段，第五章则讨论了1945年以后的时期。在战时阶段中，右翼和军部占了支配地位，这导致了对珍珠港自杀性的进攻。1936年，年轻的军官策划的政变失败以后，事物发展的趋势是：一种基本无法阻止的力量立即开始形成。结果，战后日本被置于美国统治制度下。不过，意识形态的类型却像迄今为止的一样，完整地保留下了政府作为正统观念而加以支持的儒教（即日本式的儒教）。佛教和神道教这两种主要的异端则为人民所信奉，也得到了法庭的尊重。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排列很类似于中国的情况。不过在中国，儒教是以它的原始形式存在的，而道教则代替了神道教。中国的道教提倡一种有点似是而非的哲学。这种哲学一方面强调尘世的幸福与长寿；另一方面又大谈安静、隐居的生活。在日本，正像我们将在第一章里要看到的，这种道教转变为激励爱国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的神道教。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以及儒教向日本民族形式的转变，才使得近代日本能够追寻一条与同时代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面对着世界大国，儒教和神道教结合起来了，前者的教义非常适合于一个以近代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权；而后者则很容易成为促进民族主义生长的催生剂。因此，当我们看到日本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家族式的和反个人主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在现代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甚至发展了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经济。这种经济不顾人民的福利而强调建立军事力量。尽管战后阶段日本经济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勃兴和成熟的前景在日本依然是极其遥远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没有出现任何有

意义的宗教改革，这一点似乎很明显。日本人是通过改变异族宗教（或者伦理道德的学说）的相应重点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他们在民族危机的时候强调神道教的原则，在他们的政权经历了激烈的变化之后又强调儒教的教义。通过这样做，他们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推动力来解决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三种伦理道德体系的灵活结合，而并非一种单一的宗教，使得日本的文化和经济获得了发展。



第一章

大化革新及其后

1

从历史上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处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文化的刺激和促进因素或是直接来自中国，或是通过朝鲜间接传入。由于使这种进口的文化适应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本国的条件，日本才可能获得自己独特的发展。然而，两国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使日本不得不经常地重复进口、消化、修改中国文化的过程，以便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和文明水准。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明治维新以后，一个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当时日本通过进口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经济。

大约六世纪时，佛教、儒教和道教几乎同时从中国经朝鲜传到日本。在那个时代，除了天皇的氏族以外，还存在着两个氏族：其首领分别叫做"连"

和“臣”。连氏是世代效忠天皇的氏族。它为天皇在宗教事务、教会和礼仪物品的生产和防务方面尽责。臣氏原先并非天皇的臣属。在很早以前，臣氏独立于天皇、拥有自己的领土，不过，后来臣服了天皇。这两大氏族的首领称为“大连”和“大臣”；到四世纪时，天皇的氏族已经统治了这两个氏族。

人们绝不能把当时的日本想象成今天这种样子。当时，不论是在地位高的人中间还是在普通人中间，夫妻都是分居的，丈夫要去探望妻子，而不是相反。当然，丈夫是公开地去轮流探望他的好几个妻子，而妻子则秘密地轮流接待几个丈夫。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性生活是一种乱伦。孩子由他们各自的母亲抚养大，因此，各个母亲的孩子相互之间与陌生人无异。他们很容易相爱。并且能够互相结婚而不感到是犯罪，同时他们也很容易相互残杀。因此，一个有影响的强有力的氏族首领能够很快地与皇室建立起牢固的血缘关系。例如，他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子，然后再把女儿与皇子所生的女儿嫁给皇子与他的别的女儿所生的小皇子。此外，当时日本并不存在后来才有的长子继承权，皇储经常是从天皇的兄弟中遴选。这就导致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斗争，也经常互相残杀。到所谓

大家时代① 结束的时候，日本人才开始试图改进自己的文化。

六世纪时，大贵族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增加了。在他们之中，苏我氏和物部氏是最强大的两个。苏我氏属臣氏族，尊重新的文化，特别是当时从朝鲜传入的佛教；而物部氏属连氏族，是反佛教的。这两个氏族都是通过剥削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而发财致富。在皇位的继承权问题上，他们经常发生争论，许多可能继承皇位的候选人都遭到残杀。最后，两个氏族之间终于爆发了内战，造成物部氏的决定性的失败。

这以后，便由苏我氏从天皇的氏族中挑选皇子（或公主）来继承皇位，天皇氏族被削弱了，皇位变得极不稳固。最后，苏我马子在592年杀死了崇峻天皇，让推古公主继承了皇位。崇峻是苏我马子妹妹的儿子，推古是他另一个妹妹的女儿。二人都是敏达天皇的妻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皇家的皇子和公主甚至都不能信任他们的异母兄弟、姐妹。中国的许多王朝由于外戚权力的增长而灭亡，而此时日本的皇室也处于外戚苏我氏的压力之下。

① 亦称古坟文化时期，始自三、四世纪，终至七世纪，因其时贵族陵墓规模宏大而得名——译注。

所幸的是，经常在中国朝廷上横行霸道的宦官无论是此时还是此后，都未被日本所采用（不存在宦官制也许是使日本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皇族谱系的重要背景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现在物部氏被消灭了，新的文化在苏我氏的统治下繁荣起来。

当时，由于国内外的政治原因，对日本来说，把皇室的统治权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并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是绝对必要的。自大约公元370年以来，日本人就占据了朝鲜半岛的南端。这块日本人的土地，即所谓的任那，与百济和新罗毗邻，而百济与新罗又与高句丽接壤。大约从此时起，日本已经在百济和新罗具有广泛影响，这两个国家都向日本进贡。后来，任那人逐渐与朝鲜人混血，也没有作任何努力来继续进攻百济和新罗，而这两国则不断劫掠任那，这就预示了任那的崩溃。虽然后来的几代天皇都试图恢复这块殖民地，但未获什么成功。必须记住，日本在朝鲜半岛遭受挫折的同时，在日本本土天皇的氏族也正在失去对各氏族首领的控制，这些氏族首领变得越来越独立于中央政府，正在索取大片的土地及其居民以作为自己的领地和部民。由此可见，强化政府是有国内外的原因的，是必须的。

圣德太子——推古天皇的法定继承人和摄政

者，想要加强皇权，但又不得不与当时强大的苏我氏妥协，特别是因为他本人还是苏我马子的外甥（用明天皇）和外甥女（穴穗部间人公主）的儿子。他着手引进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以使天皇政府适合当时的需要，当时中国的制度比日本土生土长的制度远为先进。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二阶冠位制”。604年又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十二阶冠位制”把大臣和其他官员们分成为十二等级，用不同式样和颜色的帽子来表示冠位的大小，这种制度宣布，官员们被任命到相应的职位上不是由于他们的血统，而是根据他们的能力。“十七条宪法”可以被看作是与新的冠位制相一致的公职法规。不过，圣德太子认识到，中国那套制度所依据的政治哲学是与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相矛盾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在君主世袭制基础上的强大国家。而在中国，人们认为神授权力是不能由一个没有德行的君主来行使的；如果人们发现一个皇帝缺乏能力，不能令人满意地管理国家，那么，神就不会支持他，就会用另外一个王朝来代替这个王朝。因此，圣德太子认为，除非抛弃或者修改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有效的政治实践，否则，就不可能在未来可能的改革中保护日本皇室，

因为，事实上过去已经有过残忍而凶恶的天皇，在中国的制度下，这样的天皇是不能被容忍的。

“和魂洋才”（日本的民族精神加西方的科技能力）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流行的一个口号，当时，日本正在进口西方技术。同样，圣德太子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区别界限，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精神是否适合日本。如果发现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成分不适合或不称心，那就完全抛弃或加以大大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国的水准，但他并非想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

然而，在日本，民族精神尚未清楚而牢固地形成。在这块油画布上，还有许多空白要由圣德太子用自己的颜料来填补。事实上，通过做这件事情，他成为了日本第一个思想哲学家。虽然缺乏证据，但历史学家还是认为正是圣德太子为日本的皇帝创造了“天皇”这个名字。在此之前，皇帝的称呼一直叫“大王”。这个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它表示天皇不再是一个国王，而是一个人格化了的神，是与神等同的。因此，神与天皇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矛盾的，改革也就是不可接受的了。这样，皇位就被

赋予了神圣的权力，并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圣德太子给日本人提供了与中国不同的政治原则：只有具有血统渊源的人，才能问鼎皇位。

无疑，圣德太子关于天皇的观点是与他面对强大的中华帝国所产生的自卑感密不可分的；确定天皇与神的一致性恰恰表达了他担心皇室未来的一种危机感。在日本历史上，圣德太子在促进保守主义和效忠方面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人格化了的神"的思想由于每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时总能够起到鼓舞狂热的保守主义分子的作用，因此总是被反复地强调。不过，圣德太子造成了一系列在性质上是进步的巨大的变化，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十七条宪法中，他宣布在日本除了天皇，没有任何国王或主人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他也想建立一套新型的中国式的官僚制度。按照这种制度，任命政府官员不是按照他们的血统，而是根据他们的品格和能力。由于官职不再能够承袭，贵族门第的权力也就相应地被削弱了。此外，圣德宣称不允许人剥削人；这样，大贵族和氏族首领拥有自己的臣民和领土的优势地位便失去了法律地位。等级和旧的家族制度由此而被消灭就有了希望。

圣德宪法在第一条中规定，日本社会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是“和”，即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不允许任何人在社会内部建立集团来反对其他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以求得一个从全社会的观点来看都是合理的与如意的结论。宪法第十和第十七条中还宣布，不允许独断专行；各级官员在重大事情上都应与公众协商，以便民主地做出结论。第二条提出，应该宣传佛教，以便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圣德太子认为，除非这部伦理道德法典在全国被坚定不移地遵奉，否则，天皇政权便不能维持。

根据圣德的模式，日本社会是由天皇、文职人员和人民所组成的。宪法第十二条强调，地方长官不再是氏族首领，而是作为治理各自地区的政府官员。因此他们不能为了私自的目的去向人民征收赋税和摊派劳役。宪法的其余条款规定了公务人员应遵守的规则。内容分别是：公务人员必须服从天皇的敕令（第三条）；他们应该认识到，礼仪是法律和命令的基础（第四条）；他们应该执行政治上的法律，否则将无法做到对天皇的忠诚和对百姓的仁慈（第六条）。此外，还强调公务人员应注重诚意，这是正直之母（第九条），他们不应根据私利

来行动，而应该为公众利益执行公务（第十五条）。其他条款提出了详细的规定来指导公务人员的行动，如：不接受贿赂（第五条）；任用适当的人到适当的职位上去（第七条）；尽可能早地上班，并要加班加点地工作（第八条）；遵守和履行“工作，你就会获得报酬”的原则（第十一条）；履行公务要稳妥，办事要快（第十三条）；不要嫉妒同行的好运气（第十四条）；避免在农忙时节把农民安排到非农业的工作上去（第十六条）。

虽然这部宪法在第二条中明确地敦促百姓去信奉佛教，但总的看来，它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宪法。和谐、礼仪、忠诚、仁慈、真诚、正直，这些在宪法中极力提倡的美德都是儒教的美德，而并非佛教的美德。它也强调，政治决定必须民主做出，百姓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天皇的命令。这种民主做出决定与天皇命令的绝对权力之间的明显矛盾只有由下述的逻辑才能解决，即天皇总是正确的，因为他发布给人民的也就都是被民主决定了的命令。从圣德太子的观点来看，天皇很像是一个近代的立宪君主，由于这种性质，他既是社会上的神，也是皇帝（即所谓天皇）。在宪法第十条中，圣德太子宣布：“人皆有心，人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

彼非。我心非圣，彼心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谁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无端。是以彼人虽嗔，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

这样，天皇只有在放弃了一切独裁的欲望的条件下才能够成其为天皇。圣德太子认为天皇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他通过作出这样的让步来保护天皇制度，使其免受一切改革的危害。当时天皇的氏族所处的那种极其险峻的环境圣德太子是铭记在心的。因此，应该认为这种让步并非圣德太子的本意，而是一种被迫的妥协，是一种对当时统治阶级中非皇室成员的权力迅速增长的反映。不过，人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某些政治思想是多么的近代化，多么的进步。早在604年他就提出了（1）类似于近代立宪君主制的天皇制度；（2）民主；（3）官僚制。

这些从逻辑上看将导致废除大贵族所享受的特权的措施显然是不能为象苏我马子这样出身高贵的人们所接受的。为了避免叛乱，圣德太子不得不安抚他们。按照新的宪法，天皇对国家的绝对统治不仅受到限制，而且还必须与大臣和高级官吏商讨他所管理的几乎每一件国家大事。虽然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说（也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天皇的立宪君主

的地位能够得到尊重。但对圣德太子来说，这毕竟是对苏我氏的一次投降，至少是一次严重的妥协。避免与苏我氏冲突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政府和宫廷中的许多重要职位已被苏我氏所占据。因此，没有他们的同意，天皇什么也做不成。正如前面所说，推古天皇是敏达天皇和从苏我家族中娶来的皇后所生的女儿。更有甚者，她是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以后把她送上皇位的。圣德太子本人不仅是苏我马子的外甥和外甥女的儿子，而且也是苏我马子的女婿。显然，苏我氏已经非常强大，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篡夺皇位。十七条宪法就其阻止天皇个人独裁这一点来说，不过是承认并复述了这一现实而已。根据这部宪法，天皇的氏族获得了作为天神的特殊地位，获得了永恒的神圣与不可侵犯的地位；而苏我氏（作为皇室的外戚）获得了高于其他一切氏族首领的真正的政治优势。尽管有了这部宪法，苏我马子的地位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他仍然是推古政府的首席大臣。

为了处理日本面临的内外问题，圣德太子制定了许多明确的规定来补充“冠位制”和十七条宪法。由于面对着更为先进的中国文化，在六世纪末叶，日本人分成为两派。一派人坚持日本对中国的开

放，以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即便这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有来无往的交流）；另一派人则坚持锁国，以便从佛教的“污染”中拯救日本。这种情况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人对于强大的西方科学技术出现的反应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对于圣德太子来说，要促进他的文化交流政策并不困难，因为主要的反佛教的氏族物部氏已经被亲佛教的苏我氏打败。圣德太子的目标是日本的复兴，他四次派遣使团和留学生赴中国，这不仅因为他是佛教信徒，而且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制度是日本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他在难波（今大阪）建筑了一座巨大的佛寺和行宫，而难波是到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附近的舸去的主要口岸。他开始编纂关于皇家、大贵族（如臣、连等）和普通百姓的官方历史记录。他也计划对威胁着任那安全的新罗发动一次进攻，然而，为了保住这块殖民地所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圣德太子于公元621年去世后，日本最终被迫放弃了它。

2

尽管杰出的天才和贤哲圣德太子提出了这些新

的政治思想，但实际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与其说圣德太子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太软弱了，以致无法使他的划时代的计划得以贯彻，因此他才向苏我马子做了许多妥协。在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是苏我马子而不是圣德太子本人拥有真正的权力，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家族变得更为强大和暴虐。改革派必须要完成圣德太子的计划。

圣德太子死后20多年，苏我家族终于被推翻。当时，被圣德太子派往中国的留学生正好回国，他们在中国看到了一个新的帝国——唐王朝正在繁荣发展，因此很自然地成了复兴政策的支持者。他们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制定法典和道德规范，以便建立一个像唐朝那样的组织得很好的行政机构。公元645年，改革派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镰足）终于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了苏我入鹿（当时苏我氏族的首领）。接着他们建立了一套似类于唐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就是大化革新（公元645—649年），它是一场在圣德太子的政治原则基础上的贵族改革运动。

大化革新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氏族首领与他们的土地分离开。显然，在七世纪日本这样的一个农业国

家中，如果耕地被国家平均分配给人民的话，就没有任何人能够享有支配别人的特权了。在新政权的统治下，国家的耕地被分成为许多等份，每一等份又完全按照中国土地占有制的模式再分成为相等的九小块。每一份地由八个人耕种，每个人种一小块地作为给自己提供食物所用，八个人共同耕种剩余的那小块土地作为给国家尽义务。氏族首领被限制耕种一块与普通百姓同样大小的土地，假使他是政府官员，他同时接受与其官职相应的薪俸。氏族首领失去了自己的私有土地，被任命为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或地方长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伴随着一种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个全国性的郡县制度建立起来了。

人民在法律面前成了平等的，此外，由于土地国有化的长处，人们在经济上也成了平等的，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天皇仅仅是作为现世的神和国家的首脑而占据某种特殊地位，其他人的机会则是均等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新政府是开明的，它的官职对天才者敞开了大门。作为一种理想，这种制度当然不是新的，它不过是圣德太子所阐明了的那种制度，中大兄皇子只是在一种更为不妥协和更为纯粹的形式中实现了圣德太子所设想的这种制

度，当他最后清算了苏我马子的孙子——苏我入鹿的时候，皇室变得真正强大起来。①

十七条宪法颁布后，大约花费了4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这样的宪制和官僚政府。这个政府在各方面都与唐王朝的政府相似，并且采用儒教作为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应该承认，这是哲学家圣德太子和改革家中大兄皇子共同取得的成就，改革不可能简单地由漂亮的哲学来完成。

尽管这两个伟人气质不同，但他们在某些方面却很相似。首先，他们对朝鲜都采取一种鹰派态度。圣德太子计划进攻新罗以保住任那；而中大兄，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百济曾绝望地吁请他帮助抵抗唐朝和新罗的联合进攻，于是他把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派到了朝鲜。从日本的观点看，这是一次不必要的战争，因为日本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自己在朝鲜的殖民地。日本军队遭到惨痛失败，被迫撤回日本。国家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直到1592—

① 明治维新以后，等级制废除了，所有人都成了平等的。然而，正如以前一样，前封建主和前武士在新社会中获得高位方面是占优势地位的。同样，在大化革新中，势力强大的家族的首领和他们的子孙在新政府中为官远比普通百姓要容易。在日本，改革、维新和政变从来都不彻底，都是相当温和的。尽管如此，人们却无法否认，大化革新对日本来说是一次最重要的改革。

1598年丰臣秀吉远征朝鲜以前，日本政府再也没有试图进攻过朝鲜。中大兄的错误可与东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日本惨败的错误相比较。不过，正像东条的错误从战后文化繁荣的意义来看令人啼笑皆非地带来了一笔额外津贴一样，在朝鲜的战事失败后，许多朝鲜人，包括政治家、学者、和尚和艺术家等，从任那来到了日本，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占领部队所做的那样。

第二，这两位有能力的皇太子都不想成为天皇。乍一看，这似乎令人惊讶，因为他们二人都为给天皇制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付出了全部精力，能够很容易地担任这个角色。而事实上，圣德太子从未登基，中大兄皇子也不过当了四年的天皇，却当了23年的皇太子。然而，只要人们认识到了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是无权的（虽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两位对天皇的新地位有深刻认识的政治家对此不感兴趣了。

大化革新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氏族首领、宫廷贵族或者幕府将军试图成为天皇（道镜僧人除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改革，使天皇的地位稳固了。然而，此后不久，中大

兄本人的一个严重错误导致了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紧张斗争。中大兄作为孝德天皇和皇极天皇两朝的皇太子，希望在天皇死后依然保留太子的地位，因此在后来的六年半时间里，天皇的皇位空缺。最后，中大兄于668年登基，但是仅仅四年后就死去了。临死前，他躺在病床上召见皇太子大海人（中大兄之弟），告诉后者他希望由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来继承皇位。当时，皇位由儿子继承并不普遍，相反，皇位的继承转入旁系，如转由天皇的兄弟继承倒是更为正常些。然而，大海人却同意了。并把皇位交给了大友皇子。但是中大兄死后，大海人杀了大友，继承了皇位，称为天武天皇。

自此之后的98年间，所有天皇都是天武天皇的后裔，只有持统天皇和元明天皇是例外。这两个天皇都是中大兄（天智天皇）的女儿，不过都与天武天皇世系关系极为密切。持统天皇是天武天皇的皇后，而元明天皇则是天武天皇的儿媳。天武天皇世系的最后一个天皇是称德天皇，她没有在天武的后裔中找到皇位继承人，最后只得推荐他的情夫道镜僧人为皇位继承人。道镜本人是否真的希望成为天皇，这是值得怀疑的。称德天皇死后，他对自己被放逐不加任何抵抗。从此天智天皇的孙子继承了皇

位，称为光仁天皇。天武天皇的世系完全结束了，天智天皇的世系终于恢复。

此后，除了有后醍醐天皇（1288—1339）想要恢复古代的政权机构，由天皇作为“大王”直接管理国家，而不是作为“天皇”统治国家这个显著的例外，绝大多数天皇都是立宪君主，都被一个强有力的摄政、皇子、上皇、宫廷显贵或幕府将军所操纵。在日本历史上，皇室处于权力斗争中心的时代是百年时代（671—770年，天智和天武的世系相互争斗）；以及以后醍醐天皇开始的南北朝对抗的时代。甚至在这样的时候，也没有人想要成为天皇。那些有着政治野心的人目标在于有着实权的职位，如幕府将军的职位；而不在于徒有虚名的最高职位。从这方面来看，大化革新的一个结果是使天皇的地位变得神圣了，然而与此同时，天皇已经不得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事实，意味着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实际已经不重要了。对于那些政治上有野心的贵族、武士、僧侣和其他人来说，为摘取皇冠而惹来麻烦是不值得的。一个人如果夺占了皇冠，他就要冒作为叛逆者而遭毁誉的风险。他们宁可盼望为天皇服务（或者至少不背叛他），以便成为他手下的权力的真正行使者。在这方面，除了一些例外

的时代，天皇都是处于政治权力斗争的舞台之外的。无疑，正是由于这种形式，大化革新才作出了使天皇地位长期稳固的主要贡献。

尽管存在着天智和天武世系间的政治斗争，大化革新后文化却发展得很迅速。综合性的与详细的伦理规范和法典产生了，日本变成了一个法治的国家。公元701年，大宝律令编纂完毕，包括有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等法律，事实上，这部律令直到1885年近代内阁法生效之前，它都继续正式有效。按照中国的作法，建立了国学和大学察来教育未来的政府官员，同时也引进了中国的那种全国性的资格考试制度。儒教极大地促进了法律，道德和教育制度的发展，并且在整个后来的日本历史中，成为人们品行的主要道德准则。

大宝律令颁布后，政府出版了几种重要的书籍，其中有：《日本书纪》（702年），这是一本以中国的编年史为样本的历史编年史；《古事记》。（712年出版），这是一本日本古代史；《风土记》（713），写的是日本各个地区的自然和文化特点。还出版了《万叶集》，这是一本由最古的时代到公元760年间的大约4,500首诗组成的诗选，其中的许多首诗至今在日本语言课程中仍被视为杰

作。所有这些努力无论你怎样赞扬都不过份，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儒教和道教于公元六世纪到来之前根本就没有书写系统。他们不得不以日本化了的中国字作为开始，后来，他们创造了一种日本的字母系统。这是一个极端困难、又极其冒险的计划，因为中国语和日语是两种截然不同又毫无关系的语言。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日本人并没有对中国文化采取囫囵吞枣的态度，而是改造它，使它适用于自己。日本皇室的神圣血统和绝对权力在《古事记》中以神话的形式加以强调，在《日本书纪》中则以历史的形式加以强调。在《万叶集》中，人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对效忠天皇表示赞扬的诗。日本人把天皇视作现世的神而相信他的半神圣性质。这种信念和哲学部分地源于日本人传统的固有迷信，尽管有外国的政治哲学传入。注意到这点非常重要的，即这些信念仅仅是在新的思想被吸收之后、中国的文化和汉字日本化之后才被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这样，天皇制就可以被解释成一种与中国的革命理论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柱，这就为日本皇室提供了一种永久而稳固的基础，使它能够永远得到保护，不受一切可能发生的革命之害。简而言之，这种情况也可以看成是日本面对强大的中国而产生的

自卑感的表现，随着把他们的天皇提高到神的地位，他们自己也就觉得获得了更大的民族威望。

事实上，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圣德太子给中国的皇帝写了一封傲慢的信，称“东方天皇敬白西方皇帝”。不过圣德太子称日本皇帝为天皇一事在中国未见记载。但在一部中国的史书记载着，当时的中国皇帝被圣德太子给他的一封信所激怒。这信写道：“日出国的皇帝敬白日落国的皇帝”。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明显的：面对一个庞大、强盛和文化上占有优势的帝国，一种强烈的消极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本增长。无疑，天皇的概念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土壤，并对人民的信念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它导致了皇室内部的大量争斗，及由于天皇的支持而引起的氏族首领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征战。从大化革新到明治维新的一千多年间，天皇是被关白（天皇的主要顾问官）、幕府将军（镇压蛮族的派遣军总司令）、上皇（根据神的意旨退位的皇帝）所控制。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天皇在政治上的权力不过是名义上的。现世的神的观念使得这个时期君主的世系未被打断。在民族危机的时候，如蒙古人入侵(1274年和1281年)、德川幕府末年西方列强舰队叩关，以及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人民都广泛地支持这种观念，并且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而愿意为国捐躯。

日本历史与中国历史极为不同。在中国，政治变化频繁发生，一个朝代代替了另一个朝代。在日本，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了的日本国民仍然对天皇保持着忠诚，并且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盟军相信，如果废除天皇制，日本人就会进行坚定、可怕而持久的抵抗，这将使盟军遭受极大的牺牲。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604）和现行的战后宪法（1946），在有关天皇的政治角色和地位方面，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虽然现在天皇的神圣性被否认了，但他仍旧是国家的象征，是日本国民一致性的象征。在上述两个宪法下，他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中国的许多朝代，甚至包括一些建立了统治全部中国大陆的大帝国的朝代，也没有持续200年的时间*。与中国历史相比较，日本由于在政治上使天皇的地位中立，并使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它就保持了“一个永久不被打断的天皇世系”。

* 原文如此——编者。

3

儒教和道教据说是由孔子和老子分别创建的；他们二人都是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两种思想流派的早期发展中，它们都给知识界提供了或多或少相似的哲学和生活准则。事实上，“道”这个词就意味着社会（或宇宙）运动的永恒秩序和道路，因此，它是一个正统的儒教概念。但是，在中国，当儒教把自己塑造成为政府的哲学，并在官僚和统治阶级那里获得了尊敬和支持以后，道教却变得越来越反对政府，并且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保持着一种异端的地位。儒教在城市中盛行；而许多道士却居住在偏僻的乡村。儒教是理智的，因为它和灵魂、精神保持着一个所谓“恭敬”的距离；道教是虚幻的、骗人的，它相信并依赖于魔术，它的主要支持者是乡村中的农民和城镇中的文盲。

在日本，政府采纳了儒教的意识形态。例如，正像我已经指出的，十七条宪法和后来的天皇诏书都是按照儒教的观点写的。有成就的政府鼓励人们去修习儒教的美德，如挚诚、正直、忠诚、礼仪、

智慧和信念等。但在另一方面，道教在日本列岛上却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而是由神道教代替了它。实际上，道教在日本是以神道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把神道教看作是道教的一种经过伪装了的翻版。日本土生的宗教信念和来自国外的道教思想在大约六世纪时溶合起来，现今我们已无法把它们区别开来。

神道教通常被认为是真正地在日本土生土长的。但是要找到它的纯粹的和初始的形式却极端困难。因为在中国字传入日本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录。历史学家能够利用的一切文字记录都已经受到中国的某些影响。事实上，正如道教强调它的中国血统一样，神道教也声称自己起源于日本，其实这种断言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道教的。人们可以把神道教看作是道教的日本翻版，也可以把它看成是道教和原始神道教的结合；不过，原始神道教很可能对这种结合物的贡献微不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二种看法实际上与第一种是一样的。

看到某些道教的神在神道教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再现，这是很有意思的，道教的许多仪式和典礼已经结合到皇家的神道教典礼和乡村的节日和典礼中去了。神道教也包括了这样一些道教的魔术因

素、诸如算命、占星术、泥土占卜等等。“荡涤灵魂的罪恶和启示人们灵魂深处的善心”是这两种宗教所共同尊重的美德之一。此外，我们可以在日本的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发现许多道教的观念。确实，道教通过它对原始神道教的影响而深刻地影响了大多数的日本人。例如，在建造一所房屋的过程中，他们举行各种典礼来标志出诸如破土、起架等每一个阶段，而这些活动都是由神道教道士来指导的。在神道教的圣地，访问者付钱就可以抽圣签，还可买历书来看自己的星相。所有这些活动完全是道教的。

《古事记》中汇编的日本神话显示出他们的写作受到道教的相当大的影响。这本书写道，日本列岛形成之前，宇宙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之中。这个观点与道教对于宇宙原始状态的看法相类似。虽然在其他宗教中，如基督教古希腊宗教等，也能发现类似的看法。据说在日本的神话时代，政治决定是按照黄老学说的思想作出的，而不是根据儒教的礼治原则作出的。虽然大多数神话中的皇帝与儒教理想中的君主相去甚远，但是《古事记》的编者在序言中写道：天武天皇以其能力而博得的尊敬和热爱超过了黄帝（道教理想中的皇帝）和周文王（儒教理

想中的皇帝），而元明女皇也比中国传说中的另一个皇帝——禹更为有名。这清楚地说明编者在面对更为先进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它的道教和儒教）时产生的自卑感，说明编者正受到道教和儒教的影响。

为了消除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文化水平和政治权力方面的差距，日本的朝廷和政府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改革。同时，一种提高皇室权威的意识形态也不得不建立起来。《古事记》通篇都在致力于追寻皇室的血统并记录它的历史，都在致力于建立天皇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基于天皇谱系不可打断的概念）。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后嗣的人，才能够宣称自己有权继承皇位。

皇位是不可侵犯的，因为在天皇的血脉中有着天照大神的血液。然而，这种理论却不能消除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事实上，在古代日本，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杀死一个兄弟或一个亲戚在天皇氏族的成员中间并非绝无仅有。因此，尽管政权很稳固，尽管天皇的世系不可打断，有用的改良和革新仍可能实行。想要实现一个新的政治主张的人只需从天皇氏族中找到一个支持这项计划的皇子就可以了。日本的政变和改革的典型例子大化革新，就是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斩杀了苏我氏，皇

极女王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兄弟孝德天皇而完成的。这样一来，尽管有时某位天皇被杀或被迫退位，但由于改革都是仰仗天皇氏族而进行的，天皇世系就不会被打断了。

公元七世纪时，日本根据儒教的思想重新组建了政府机构；在道教的强烈影响下，同时也为了在人民的思想中灌输一种支持皇室的意识形态，因而编撰了许多神话。由于儒教远比道教合乎理性，这样做，可以说是对中国的两种哲学的合适的使用。虽然宫廷的宗教仪式是道教的，但人民却把它理解为神道教的；所以就相信皇室是尊重日本统治的。与此同时，政府则是儒教的和进步的。为了应付来自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压力，日本建立起了一个有效而强大的政府，同时也在人民中间激起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神道教，即事实上的道教，促进了民族精神；特别是在德川时代末年，起源于《古事记》研究的国学，狂热地倡导古代神道信念，为促成反对西方列强和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运动出了很大气力。

这种激起了民族主义精神、促进了传统政策保留的意识形态是非理性的、魔术般的、巫术般的。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个悲剧。在每一次民族危机的时

候，天皇都要向他的祖先天照大神祈祷，以求得她的帮助。幸运的是，在两次蒙古人的入侵中，台风都袭击了他们的舰队，使绝大多数舰只沉没。因此它被称为“神风”。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还到神道教圣地去祈祷，希望再次出现神风。战略战术没有用冷静的批判眼光去重新认真地审查，生命的自我牺牲却得到狂热的支持。

在日本，神道教开始时是一种皇室的宗教，后来它通过各种事件和庆典，如乡村节日、丰收节日、婚礼、犁地和升火仪式等渗透到普通民众中间。于是，正如中国那样，日本采用了儒教作为上流社会官方生活的伦理道德制度，道教（或者它的日本翻版神道教）作为皇室和百姓的宗教。（请注意，在中国，道教获得了皇室“后宫”以及普通百姓的支持。）然而必须强调，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教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后者把宗教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日本人的忠诚和爱国主义感情，而前者在中国则提倡人们应从公务中退休，并隐居起来，宁静而清苦地生活，以便在追求尘世间的幸福之中获得长生不老。

这样，日本人就把道教改造成了它的相反的东西。天皇和神国这些名副其实的道教概念，已经被

一种真正日本人的和非常反道教的方式重新解释，以便激起民族主义。此外，神道教徒珍重为天皇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而不重视追求长生不老。他们认为国家是永存的。没有必要去延长哪怕是最重要的人物的生命；而道教则强调个人。因此，看到这两个把神道教和道教作为各自主要的异教的国家（尽管儒教是它们共同的正统宗教），正在已经沿着完全不相同的历史发展路线走下去时，也就不必大惊小怪的了。

佛教也传入了日本，但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而是经由中国传入的。它已经过中国人的改造，因而包含了许多与儒教和道教一样的因素。日本人在中国人那里学到了佛教。然而，与为君主和他的臣属提供政治哲学的儒教相比，佛教主要是关心帮助那些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处于贫困境地的人们。儒教强调忠诚和自我牺牲等美德；佛教则把怜悯众生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在佛教徒活跃的时期里，他们关心各类形式的社会工作，如救济流浪汉、开办医院、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建筑和灌溉工作等等。他们对政府施加影响，使其承担起许多福利事业；他们下到城镇和乡村中去，在民众中宣传自己的宗教。

日本第一个组织完备的政府——圣德太子的政府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二条就宣称：人们应该尊重佛祖、佛教和僧侣。后来，特别是在奈良时期（710—794）佛教受到政府的特别保护。为了佛教的发展，也为了提高国家的声望，它在许多地方修建了巨大的寺庙和高耸的宝塔。佛教僧侣集团的领袖侵蚀了政府和宫廷，并从事控制政治的活动。当佛教在政府中的势力变得强大了的时候，人们用佛教的观点对道教（此时已为神道教）进行了重新解释。神道教的众神被解释为佛祖和他杰出的门徒们的化身，神道教本身索性被解释为佛教的一个分支。

然而，与此同时，佛教也正在被人们以神道教的观点重新塑造。我已经提到，在日本，道教被转变为神道教，以使它把天皇的概念作为国家的活神来接受，而这是完全反道教的。佛教在渗透进政府以后也被日本化了。它承认了“神授土地”的原则，这个原则声称日本是由现世的神统治的“神授土地”的国家，因此应该如天地一样永存。在诸如蒙古人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民族危机中，佛教寺庙与神道教圣地一样，举行了虔诚的仪式来祈求敌人投降。

除非承认这个日本的首要的原则，否则任何佛教宗派都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较典型的一个日本化了的佛教宗派是日莲宗（即法华宗——译注），它是在十三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虽然它声称自己是佛教宗派，但实际上是萨满教（后来又是道教）宗派，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宗派。（天主教曾获得织田信长的热情支持，后来于1587年又得到丰臣秀吉的支持，最后于1635年被德川家光所禁止。如果天主教传教士们能够接受“神授土地”的教义，那么天主教在日本将会有不同的历史。不过，这也会使天主教发生重大变异。）此外，下述情况是不应被忘记的：当一种先进的外国文化传入一个文化不发达和贫穷的国家时，接下去的接受过程的问题通常就会冒出来。传入国的统治阶级对这种新思想感兴趣，而下层人民却没有什么机会与这种新思想直接接触。由于广大群众对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只能通过上流人士的眼睛来看它。由于这些思想都要逐渐地通过统治阶级的漏斗，因此它们经常要发生质变。日本的佛教也不例外，到十六世纪后半叶，当织田信长成为国家的独裁者时，至少对他来说，这种宗教似乎是变成了败坏道德的，并且失去了它最初的精神。

织田信长只统治了几年，但他却对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在战争中他发明了许多的战术和策略，如使用枪的战斗队列、饥饿战术、淹没战术、海军特遣部队行动、封锁港口，以及用炮舰攻击等。他也发展了许多新的政治观念。织田信长撤除了大批的检查站，使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他也废除了贵族和佛教寺庙拥有的庄园，并用一种更为先进的封建主义形式代替了自大化革新起建立的大约一百年的等级君主制（详见后面第四部份）。在这种制度下，织田信长便能够命令大名及其武士从一块封地迁往另一块封地，这种方式很像近代官僚的调迁一样。这样一种“近代封建主义”是以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职业武士阶级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武士随着自己的封君到达新的封地，而农民则被束缚在土地上，进行纯粹的生产活动。这样，武士就成了完全脱离生产的统治阶级的成员。织田信长把武器和耕耘分离开的这种改革由他的后继者丰臣秀吉（1536—1598）和德川家康（1542—1616）加以发展并完善，这种制度持续了大约三百年之久，直到明治维新。

理性主义者信长既不信神也不信佛，他也不相信“神授土地”的神话。他尊重天皇并在财政上帮

助皇室，这倒是真的；不过，他心底里却认为神道教徒和儒教信徒是软弱无用的。他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罕见的日本人。他甚至喜欢那些理解他的西方传教士。他称赞他们是来自遥远的海外的勇敢的人。此外，他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关于世界形势以及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信息。信长极其注意他们带来的稀有而珍贵的商品以及新式武器。总之，他发现天主教传教士是有用的。

另一方面，信长把佛教徒看作是敌人，认为他们一直是各届政府身上的寄生虫。他认为当时的佛教思想充满了反动的保守主义，甚至没有一点进步的因素。他烧毁了整个延历寺（该寺自788年修建以来一直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屠杀了该寺所有的僧侣、妇女以及一切与该寺有瓜葛的人，包括儿童和僧兵。他镇压了一向宗的佛教徒发起的一场内战，并以摧毁建筑、屠杀僧侣以及追随者的方式惩治了历来受到尊敬的寺院，如兴福寺等。

织田信长晚年几乎成了精神病患者，他傲慢、自负、残忍、固执、反复无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性格变得越来越糟。日本的佛教徒被他的暴行、特别是在延历寺的屠杀吓坏了。从那以后，他们完全从政治和慈善事业中撤出来，再也没有返回过这

些领域。寺庙也衰落为丧葬仪式的执行机构。现在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无神论者和不信教者，这可能要归结于这个恐怖而激进的无神论理性主义的专制主义者在日本早期历史上的出现。然而，佛教现今仍是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宗教，虽然现代日本人是否感到佛教是拯救他们的宗教，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

考察一下全部的日本佛教史，我们将会看到，佛教最兴盛的时期是奈良时期（710—794）和镰仓时期（1192—1333）。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是统治阶级把佛教介绍到日本来的，因此，佛教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在奈良时期，佛教尤其如此。与此相反，在镰仓时期，由于武士的兴起，由于他们经常要面对死亡，如果他们想要活下来的话，就不得不杀死敌手，于是，这些武士强烈地感兴趣于佛教就是非常自然的了。镰仓时期最不平凡的一个人是亲鸾，他建立了一种与魔术完全割断了联系的宗教秩序，允许信徒结婚，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世俗的。这就使得亲鸾所建立的宗派（净土真宗或称一向宗）成功地在人民当中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僧侣统治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它越来越变成了一个贵族集团，最终成了大封建势力中的一股。乍一看，作为佛教世俗化的形式的净土真

宗就像天主教内出现的新教一样，但是，它既没有改革社会的想法，也没有反对恶魔的激烈义愤，更缺乏拯救众生的愿望。为了获得在尘世间的影响，佛教不断地进行斗争，结果，僧侣的职位变成了一种封建权力，而它的领袖也得以利用信徒们的供奉而沉醉于奢华的贵族生活。于是，一向宗被织田信长打败了。

4

公元七世纪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在日本一直存在至今。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甚至在经历了欧化的冲击之后，儒教仍然盛行于政府，神道教仍盛行于皇室，而佛教则仍盛行于民众之中。不过，大化革新所建立的强大的法治国家制度却未能长久，它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组织逐渐地销声匿迹了。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日本政府蒙受了中大兄皇子的部队在朝鲜的决定性失败。被削弱了的政府不得不与那些势力正在增长的主要家族作斗争。而事实上，也被迫作了重大妥协。那些出身于显赫家族的人在官职的升迁方面获得了显然要比出身于普通

家庭的人更为优越的待遇。于是，贵族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职位。这个改革的政府不得不确实地从它原先的进步立场上退缩下来。

在这个软弱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地方长官变得越来越独立于总理大臣（当时称太政大臣——译注）。他们的所作所为，尤如地方上的皇帝，而不象中央政府派驻各地的代表。他们开始把自己为国家进行监督管理的土地看作是个人的领土。此外，荒地、山脉、森林一直不属于国家所有，甚至大化革新后也是如此。公元723年，政府与贵族妥协，承认所有这种被垦殖的非国家所有的土地，均可为居住在这上面的垦殖者所私有。公元743年，这种终身所有权转变为永久所有权。于是，贵族们由于受到这种政策的强烈诱惑，都去当地方长官。他们通过毁林开荒而增加了自己的土地，变成了大地主。在这些新的私有地上劳作的人被看作是这些地主的家臣。于是，圣德太子所创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制度到八世纪时便开始崩溃，并且被前封建等级庄园制所代替，而这种前封建等级庄园制又被持续到十六世纪织田信长时代的庄园封建制所代替。虽然大化时代所建立的道德和法律典章仍然存在，但它们实际上已经失效，基本上只

起装饰作用了。

历史学家认为，庄园封建制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就开始了。1185年，平氏被灭，在此之前，它一直在宫廷中握有绝对的权力并为所欲为。他们是被源氏灭亡的。平氏和源氏都是皇室的分枝。从九世纪起，由于藤原氏控制了政府，他们出京师到外省成了地方长官。任满后他们也没有返回京都，而是就地安居，成了势力强大的地方家族。平氏首先起而夺权，灭了藤原氏，随后本身又被源氏所灭。除了源氏和平氏以外，日本还有许多势力强大的地方家族，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地及其控制下的公地不被中央政府和其他势力染指，这些家族不断聚集军事力量，建立武士团。每一个家族的头头都成了领主，他的亲戚进入统治顾问班子，他控制下的农民则成为士兵。开始时，这些大贵族是利用武士团来保护自己的人和财产，但是后来却适得其反，这些被保护的对象都被武士们所控制。

灭亡平氏时，源氏的首领是源赖朝（1147—1199），他真正的势力范围是关东地区。但是，在灭亡了平氏以后，他兼并了平氏以前所控制的领地，势力范围伸展到全国。赖朝的政府最初是一个控制这些领地的纯粹的私人行政机构，他的政治活动范

围只限于源氏家族内的事务。整个国家仍像以前那样，受大化革新以来一直流行的那种制度的支配。平氏灭藤原氏后，便留在京都，垄断了中央政府所有的重要职位，但是源赖朝却没有离开关东他自己领地上的镰仓，于是，在京都有一个中央政府，而在镰仓，则有一个管理赖朝自己家族事务的机构。但是到了1192年，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他的政府（幕府）开始具有一种官方性质，他的私人军队也开始被人们看作是国家的军队。由于有了私人军队和私人政府，他被看作是一个君主，而这种情况与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二条直接冲突，这条宪法规定：“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然而，由于赖朝最终保持了天皇直接控制下的一支军队的最高司令的这样一种职务形式，在京都也保留了天皇控制下的以总理大臣为首而组成的官僚政府，因此，这就不一定意味着对现存事物状态的破坏。运用这样的方式，镰仓幕府既未摧毁旧的制度，同时又通过承认它，并被它所承认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提供了保证。然而，实际上天皇和政府都不能控制幕府（军事），而幕府的作用也绝非限于纯粹的军事方面；军事政府和宫廷政府相互合作来履行职责。于是，在赖朝时代，日本开始了一个双重政府的时代。随

着时间的推移，幕府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政府，而宫廷政府（朝廷）则退居幕后，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府。

武士为自己的主人尽义务的概念基本上是一切武士社会的道德法则。在中国，儒教“忠”的美德是指对自己的良心，而在日本，这种美德则被解释为对统治者的忠诚。在导言中我已经解释了作为一种重要美德的“忠”的信念是如何在大伴家持的著作以及《万叶集》的诗歌中出现的。然而，正是在镰仓时期的武士社会中，这种“日本化”了的“忠”的概念得以迅速发展。大化政权是一个建立在土地公有、官僚制度与“和为贵”这三个支撑点基础上的法制政权（日本式的民主制），镰仓政权则是一个以土地私有、世袭制和“庇护及封俸原则”（实际上是主从关系）为基础的军事政权。到此时为止，庄园里的农民为庄园主或地方豪强耕作都是自由的，如果他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者交一定的税给庄园主以代替劳务，他们就可以不受任何妨碍地为自己在土地上耕作。农民能够以这种方式生活，这要归因于领主；而领主能够以接受劳务和租税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又要归因于赖朝对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的确认。从领主的观点来看，赖朝将军不亚于

一位在土地公有制度内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保护者。只要主人认为必要，庄园里的农民要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报答主人的恩惠。领主与将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将军不得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广泛地扩大自己的恩惠，把更多的私有土地分封给为自己尽了最大义务的仆从。正是在这样的方式中，日本的封建制度开始兴起；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镰仓政权与大化政权完全不同，并明显地相互冲突。日本的双重政府时期并不仅仅是指两个政府并存的时期，它也意味着在这样的时期中，国家是处在按照十分不同的原则行事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府的双重统治之下。

这个国家现在进入了一个显然是有两个统治者的时代，也开始了一个以“忠”为最高美德的时代，当忠于天皇被证明是与忠于将军不相容的时候，应该怎样行事就很自然地成了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十三世纪初所写的《平家物语》的中心议题之一。为了消除忠于天皇和忠于幕府二者的矛盾，人们不必非要把二者截然分开；从本质上讲，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植根于一个共同的基础上的。作为结果，幕府将军被天皇授与“征夷大将军”的称号，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手续。幕府将军也不必显示出

对于儒教这个皇家政府的基本意识形态的任何敌意。首先，将军必须是正义的保卫者，他的任务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武士的首领给自己的领地内带来正义，以达到在正义基础上的公正；作为一个天皇把治理整个国家的军政大权委托其身的皇家官员，他有义务为全日本带来正义。勇敢、忠诚、豪侠、自尊和谦虚都被认为是武士的美德，在镰仓时期，理想的武士的形像是信奉儒教的，是明治时期天皇给士兵和水兵的命令中理想士兵形像的原型。

在这种早期的武士社会中，耕战不分家，士兵和农民之间的区别也并不明显。因此，农民也被要求忠于领主。然而在战国时代（1467—1567）这种传统的军队被织田信长的训练有素的专职的军队打得大败，使得此后每一个封建家族内部的耕、战都开始分工。在这个由武士和农民组成的两大阶级的社会中，生产活动后来被分摊在三个阶级，即农民、工匠和商人的身上，这反映了安土桃山时代（1568—98）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可以说，信长开始了摧毁庄园封建制的事业，而完成这一事业的人则是丰臣秀吉，他建立了一种世袭的等级制度（1591年）。在这种制度下，禁止各阶级地位之间的变动转移。

这种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的划分持续了整个德川时代（或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提倡儒教，当时的日本社会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儒教的封建制度。不过，它的社会阶级划分却不同于最初中国儒教的那种阶级结构。在中国，阶级结构是由皇帝、大臣、高级官吏、士绅和百姓组成。在早期的德川时期，日本的儒教信徒解释说，武士阶级相当于中国的统治阶级（由皇帝、大臣、高级官吏和士绅构成），而从事生产的阶级则相当于中国的百姓。由于孔子一直对启发“小人”（平民）和女子这样的文盲不感兴趣，而只限谈论知识界（皇帝、大臣、高官和士绅），因此，儒教的指导原则被认为不适用于德川时代早期日本的农民、工匠和商人，只有武士需要用像中国的士绅所采取的同样方式来遵从这种指导原则。

那时，武士被期望具有忠诚、正直和合乎礼仪的美德。由于他们在德行上的这种训练，使他们获得了如统治阶级一样的荣誉。然而，他们的物质生活却很贫困，有时甚至很悲惨，特别是那些下级武士。另一方面，百姓由于不需要实践儒教的伦理道德而受到蔑视。正如天主教社会分为僧俗两类人，每一类人都有自己的指导原则一样，德川社会的道

德负担也不是平均地分摊在受过教育的武士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的身上的。在武士身上流行着儒教的优越感，而在大众身上，则洋溢着寻欢作乐、兴致勃勃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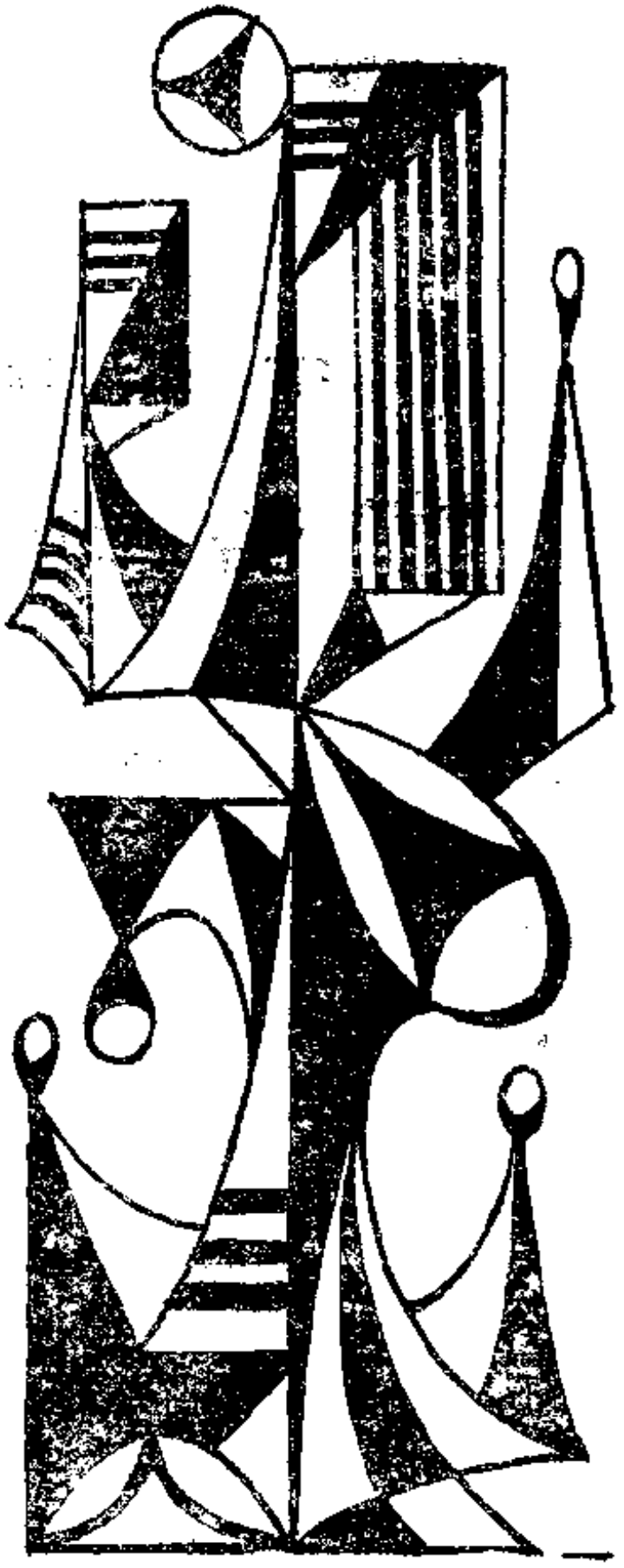
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为一方，品格高尚然而生活贫困的武士为另一方。这种相互之间的独立仅仅能够暂时维持。武士需要比较富有的集团的财政支持，而富裕的农民和商人则把闲暇的时间花在阅读和看戏上面，他们开始对西方的知识和儒教发生兴趣。儒教的伦理道德逐渐不再是武士阶级的垄断物。农民和商人也被要求忠于自己的主人、取信于朋友和顾客。应该指出，在德川时代中期，大地主和大商店出现了，另有许多人成了租佃农、店员和雇工。很快，他们就被教导说应该像武士对待君主那样，他们也应该献身于自己的主人。“武士道”的“世俗化”由此开始。

这场运动对作为德川政权主要基础之一的等级制度具有严重影响。人们开始像尊重武士一样尊重富商。他们也博得了工头、店员和女仆的忠诚。当然，在正式场合他们的地位仍然低于武士，但实际上他们已被看作是“准武士”；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人已被允许像武士那样使用姓氏和佩带刀剑。

大地主也同样发达起来。于是，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的这种传统阶级划分便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而代之以把居民划分为知识界和文盲的这种真正的儒教的划法。武士和富裕的受过教育的农民、商人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开始发展起来。但是日本的资产阶级既不像欧洲资产阶级那样进步，也不像它们那样有进取心。它从来也不必被迫去向政府作斗争以获得作生意的自由，因此在明治维新中，这个阶级并没有带头；事实上，一些大商人甚至扮演了反动的角色。然而，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遵循与武士同样指导原则的强大的集团终于在生产者集团内部兴起了。

由于神道教和儒教的影响，日本人非常珍惜崇拜祖先，为主人的利益自我牺牲，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和睦相处的美德。因此，在德川时代，社会和技术改良并未受到热情欢迎。在商人家族中，个人很少为了晋升而竞争，生意上的经济竞争也不严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商人追求利润不一定就是罪恶。大众道德的鼓吹者提倡节俭、禁欲主义和正直。不过他们强调对利润的追求和对利润的贪婪之间的区别，以此来强调公平交易。个别商人在生意中进行了改革，因而致富。然而就整个社会而言，

在德川时代它仍是保守的、家长式的和反个性的。德川时代末年，日本人发现他们的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这时他们才认识到需要变化，并且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建立起一种能与西方相匹敌的国民经济。这样看来，正是在与外国的交往中，日本人才开始考虑经济竞争，有效的管理和近代政府的问题。在面对着绝对优势的中国文化时，圣德太子承认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的必要性。与此极为相似的是，在德川时期末年，面对着强大的西方世界，日本的爱国者们开始争辩他们究竟应该支持两个政府中的哪一个更好些。



第二章

明治维新

1

本章将讨论明治维新或明治中兴（1867—1868），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日本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我对明治维新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大多数日本的历史学家所持有的意见不相同的，而与西方史学对此的解释基本一致，尽管我们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在日本，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多少有关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不过我的看法如下：日本近代史太独特了，以致无法被这一理论充分解释。

在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有着自己特殊的中心主题，而明治维新的主题在于“打下按西方模式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基础”。建立这样的国家一直是日本国民热切的愿望，不过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以至在遥远的将来他们还会继续经历着由此而引起的难题。

日本人已经解释说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的主题是指在设备上、物质上而言，并非指精神上、感情上而说。尽管在科学、技术、教育、经济、军队和政治结构方面，日本在外表和形式上都迅速西方化了，但精神上的变化却远远地落在后面。更确切地说，正如“和魂洋才”这个口号所表明的那样，日本人一直是强烈地拒绝西方的精神观念的。日本人强烈地希望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下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自己的家庭结构，而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具有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力量的近代国家。这种愿望在明治维新前就已持续了整整一个多世纪。后来无论在明治末年的日俄战争时，还是在把纳粹德国作为典范的军国主义时期。无论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国家处于崩溃的时期，还是今天当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巨人的时候，这种愿望都没有改变。

当然，努力建设一个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强国并不一定错；表面西方化而内里非西方化的这样一个国家的事实本身也没有招致批评。但是，如果用狂热的“神国主义”的思想（字义为“神赐土地”的原则和天皇（其祖先为创造宇宙的神）所统治的日本应该优越于其他国家的信念）来填补西方精

神造成的真空。其结果，必然是这个“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强大国家”对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德川时代后半期在日本有一个关于是继续“锁国”还是应该“开国”的大辩论，我们可以暂且不管那些弄错了时代的孤立主义的“攘夷”派的倡导者，然而即使是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开国政策的支持者，其大多数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力促开国，不过是把它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们这部分人也相信西方是“夷地”。他们虽然感到当时必须开国，但又认为，日本最终将会成为各国的领袖。在日本的领导下，世界将走向统一。

这种狂热的沙文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在明治维新后衰落下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又很快地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而全部复活了。这种理论提倡东亚所有民族都应在日本人的领导下相互协作、共同繁荣。由于战败，这种思想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日本再次被迫采取了国际主义，而这却使日本变为一个能与西方相匹敌的大国。不过，我们并不能说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问题已经完全被解决了，因为许多日本人仍然赞成“和魂洋

才”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并没有能够祛除作为“日本精神”核心的“神授土地”原则的含义。这种原则是中国的“中华思想”的一种反映，是一种认为自己具有类似命令西方的权力的意识形态。

今天，大多数日本人并未全盘接受传统的“神授土地”的原则，但他们也没有发现一个可以代替这种原则的其他的东西。这就在“日本的精神加西方的技能”的体系中留下了一个使人心神不宁的真空。除非找到填补这个真空的方法，否则，未来向不祥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

当日本在十九世纪开始与西方面面相视的时候，它承认了双方之间存在的技术上的差距。与此同时，它也由于自己炽热的民族主义感情而不幸地受到“日本的精神加西方的技能”的思想的折磨。但是，正如下面所要看到的，从一种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不过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已，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思维方式。

日本人首先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差距，明治维新以前，他们并未在自己与西方的这种差距面前猛醒。很早以前他们就知道强大的西方；早在1543年，日本人就从一艘葡萄牙的商船上得到了一枝火枪。当时，日本正处于战乱之中，足利幕府（封建

军事政府）的控制正在衰落，各省的战国大名正在互相攻伐。在这种战争时期，要想获得胜利，有效的武器装备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战国大名中的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了解到西方的科学技术极为先进，但是，通过纯粹进口的经济方式来获得西方的产品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为困难的。这样天主教传教士就成了他们获得武器的重要途径。从这时开始，西方的技术与西方的精神（天主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介绍给了日本人，许多战国大名因此而成了天主教徒。征服整个日本的织田信长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却偏袒天主教，而且很巧妙地利用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武器。正如第一章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使用火器的战略赢得了陆战的优势，并且建立了一支高速度、机动性强的海军。此外，他的战略中也包括在大阪湾使用配备了火炮的带帆战船从海上封锁大阪城。

在第一章我们也谈到织田信长成功地镇压了佛教。他认为，由于墨守传统的权力形式，佛教已经完全腐败了，并且也没有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技术；相反，他对天主教采取支持和保护的措施。比睿山延历寺统治日本佛教世界达八百年之久，慑于这样一种宗教和世俗的权威，以前没有任何一个战国大名

敢于攻击它。但是，当织田信长的反对者朝仓和朝井在比睿山寻求避难时，信长包围了这座山。双方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但第二年当朝井调集他的军队时，信长就毫不犹豫地下令进攻延历寺，放火烧毁了整座山寺，并屠杀了许多男女僧人。同样，在他镇压一向宗的反抗时，杀死了全部两万名信徒。这样，织田信长一方面赞同天主教，视西方技术为最可尊敬之物，并极其渴望吸收它；另一方面，他蹂躏和屠杀反对他的佛教僧众，从而使佛教信仰丧失了生命力。

尽管有这些残酷的行为，织田信长仍然应该被做为日本的第一个近代政治家而予以高度评价。信长具有洞悉未来的目光，如果他统治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日本历史也许会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了。但是主要是由于他的个性和他在历史上"过早地"出现，1582年他被自己的一个家臣明智光秀暗杀。而明智光秀又很快被另一个家臣丰臣秀吉（1536—98）所杀，这样，丰臣秀吉就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全国的最高权力。

丰臣秀吉从织田信长的低级家臣的地位升到了他的继任者的地位。与织田信长相比，丰臣秀吉是一个胆小而保守的统治者，尽管人们认为他在信长

统一日本的战争中表现勇敢并屡建奇功。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再次统一了日本并掌握了权力。此后，他发动了对朝鲜的进攻，建立了雄伟而豪华的大阪城堡，过着奢侈的生活。与此同时，丰臣秀吉还实施各种旨在抵制日本人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政策。

首先，由于他是从农民中爬上来的，因此他担心农民中会出现第二个秀吉。于是，在他成为关白后，发布了《刀狩令》，没收了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一切武器。他还禁止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四个阶级之间的转移，以防止自己这样的好运在别人身上重现。这样，武士就成了有权垄断武器的统治阶级。与此同时，丰臣秀吉把有功的家臣提拔为大名，把他们安插到被征服的郡、国中那些历史悠久的封建大名的领地上去。这些新的封建大名与其臣民的关系不同于旧的大名与其臣民的那种传统的由家族关系和领地关系维系的关系。这是基于一种新型主仆关系的封建统治的开端。当封建大名由于调换或降级被迁往另一个郡、国去的时候，只有他和他的家臣迁移，而农民却原地不动。这样，在这些领地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很像近代封建国家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后来的

德川时期，封建主义具有了更多的官僚制的特征，而丰臣秀吉坚定地承认了由织田信长所发端的这一趋向。

其次，丰臣秀吉坚定地对中国（明朝）、朝鲜和台湾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姿态，然而却不欢迎与西方接触。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丰臣秀吉不像织田信长那样看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相反，精确地说，正是由于他高度地重视它们，因此才对西方人侵东方（西班牙已经征服了菲律宾）将会扩大到日本的这一前景感到非常惊恐。所以他于1587年禁止宣传天主教，并于1594年镇压了长崎的天主教徒，虽然这次镇压并非由于宗教原因，而是有着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背景。换句话说，由于当时的天主教与西方的技术密不可分，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防止西方技术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他才决定禁止这种宗教信仰的。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于1603年开始统治日本。德川家族在日本的统治者中是最谨慎、最保守的，他们完善了丰臣秀吉创立的保守政策。首先，德川幕府有意地将谱代大名（忠于德川家族的世袭大名）安插在外样大名（那些在关原之战家康胜利后才承认他的统治的大名）之中，以便让前者严密

地监视后者。同时，他们实行了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据此而建立起一种中央集权的封建结构。

其次，由于德川氏已统一了全国，对他们来说，西方的科学技术便成为危险的东西。他们推测，如果日本继续她与西方的关系，除了可能遭受西方的直接进攻外，还有一种可能，即地方的封建大名从西方得到强有力的武器来打击德川家族。因此，德川氏必须在武器进口的竞争中保持永久的领先地位以维持自己的统治。然而，考虑到当时的运输状况，德川氏的首都江户（今东京）很难被认为具有优势。事实上，正是那些边界地区，如日本主要岛屿的西端（长洲）九洲的西岸和南岸（长崎和萨摩），或四国的南岸（土佐），占有地理上的优势。因此，德川氏认为，禁止与西方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是明智的。此外，他们害怕大名在效忠幕府之前先效忠一种外来的学说。于是，他们加紧镇压天主教，限制贸易，最后于1639年禁止了一切西方人（荷兰商人除外）入境，开始了一项所谓的"锁国"政策。后来，对外贸易完全被幕府在长崎所控制。这种闭关自守的统治的仅有的例外是，荷兰由于信奉新教而不是天主教，被允许在长崎的一个叫做出岛的小岛上，在幕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贸易。

2

这种孤立状况持续了220年，直到1859年德川幕府对俄国、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等国开放了神奈川、长崎和函馆三个港口。在锁国时期，幕府开始巩固等级制度，并且牢固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结构。为了加强对地方封建大名的控制，德川幕府于1635年开始实行“参觐交代制”，根据这种制度，大名必须每年有几个月或者年年交替地居住在德川幕府所占据的首府之中，时间的长短决定于封地距江户的远近，以及是谱代大名还是外样大名这样一些因素。当这些大名返回自己的封地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作为幕府的人质。一方面，这种制度对封建大名有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聚集起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密谋和策划脱离中央而独立；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公路网的形成，并且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明治维新后立即建成一个近代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因为在孤立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国内交通和交换已经使得全日本作

为一个单一实体出现的必要基础工作接近完成。所谓全日本成为单一的实体是指有统一的语言，各地区人民接受同样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准则和习惯上的相似性，等等。

此外，日本的资本主义虽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见到的那样，具有独特的形式，但是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是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而运行的。这是因为在德川封建制度下，各地方的中心城镇发展起来了；由于参觐交代制度，沿公路的市场和以驿站为基础的社会团体也活动起来。在德川时代的最后20年(1850—1868)，江户的规模已经像伦敦一样大，拥有一百多万人口。大阪和京都分别有30万和20万人，名古屋和金泽各有10万人，广岛、川内、和歌山、鹿儿岛、堺和长崎等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城市社会团体。我们如果把这些情况与下述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对英国都市化状况的描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日本在德川时代是处在一种相当先进的发展阶段上。马克思说："在十九世纪初，除了伦敦，英国还没有一个拥有十万居民的城市。超过五万人的，也只有五个。现在，有五万以上居民的城

市，已有二十八个。”①

孤立也具有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日本的农业和工业与西方国家比较的结果清楚地显示，日本当时在煤炭和农业方面是相当先进的。它专门发展煤炭和农业，并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外国的工业品，这要比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更有利。因此，如果日本和西方国家可以自由贸易，那么日本的手工制造业可能已被消灭。这种孤立政策妨碍了德川时期的经济去发展即便是原始水平上的初级工业，而只允许它保持手工制造业。明治政府能够比较顺利地使日本工业化，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德川末年幕府拥有制造黑色火药的工场、造船厂和其他西方式的工厂；而这些西方式的工厂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又是由于在整个德川时代，手工技术得以保存的结果。为了保护日本的手工制造业免受西方出口的侵害、防止日本变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必须实行相宜的保护贸易的政策；德川幕府在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之后，又相当不自觉地实行了一项很好的贸易保护政策。因此，正是由于德川时代的闭关政策，明治政府才得以在掌权后不久实行它的富国强兵的政策。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27页。——译者注

虽然德川幕府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但它却提倡有关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儒教的研究，以此作为一种镇压和禁止西方思想传播的方法。这种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教育政策至少具有三种积极的效果。

第一，由于儒教作为一种哲学而不是作为一种宗教，从未在日本与神道教和佛教发生过激烈冲突。因此，神道教徒、佛教徒、甚至天主教徒都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整个日本在闭关的这二百多年时间里都被训练成儒教的思维方式，这个事实不容低估。事实上，由于日本人从本质上看是非宗教的(尽管他们讲伦理道德)，因此我们立即就能明白这个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那个时期，日本人已经被儒教的教育逐渐地改造和培养成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当德川末年开国时，日本人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已经成了一种具有特殊性格的人，这就是说，他们都成了具有武士风格的绅士。

第二，儒教是理智的和理性主义的，这对日本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它排除了神秘主义、妖术、魔术以及鬼魂幽灵。然而，在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却是缓慢的。伽利略和哥白尼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仅仅是在后来，科学才最终被广泛接受。近代物理学之父牛顿爵士除了进行科学研究之外，还研

究了炼金术。而在日本，完全是由于儒教的理性主义才使得西方科学能够迅速而深深地扎根，并且日本的那些勇敢的科学家们也没有蒙受苦难。

第三，在二百多年官僚主义统治的背景下，儒教教育在德川末年培养出了能够胜任官僚职务的武士，使他们具备了成为近代军队的士兵或工厂的工人所需要的纪律，从而有利于近代军事组织和工厂制度的创立。没有这些训练有素的武士，日本既不可能在明治维新后如此快地建立起一个近代的政府，也不可能如此快地贯彻“富国强兵”的政策。我们绝不能低估德川时期对近代日本兴起所起的作用。

作为镇压和禁止天主教的政策的一部分，德川幕府提倡的并非只是儒教，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的学问。由于等级制度的建立，农民、工匠和商人三个生产阶级有义务向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提供经济支持。德川初年，幕府相信儒教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说服他们承担起这些负担的目的。当时，政府把儒教作为一种封建主义的哲学而予以采用，而孔子本人虽然出生于封建主义时代，但他总是回顾古时候城邦政权的黄金时代，并且一直在考虑如何把当时分裂为战国的制度重新组织为一种更为先进的、

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制度。然而，在德川时代后期，由于政权的持续稳定，武士阶级不再时时准备战斗，因此他们已经转变为德川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官僚。同时，他们成了知识学问的传播者，并且与少数农民和市民一起，组成了知识界。在这些农民、市民和珍爱艺术和学问的低级武士中间，存在着一种无视阶级差异的地位互换情况。知识分子集团普遍地在相当的规模上兴起了。此外，“参觐交代制”也保证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存在太大的文化差异。

在拒绝天主教的同时，德川政府鼓励儒教以加强对本身制度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然而，这种文化政策不仅仅具有保护这种制度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使它受到不好影响的反作用。首先，儒教是与“中国是世界中心”这样一种学说紧密相联、难解难分的。这就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并且意外地导致了与这种学说相反的意识形态和学识的产生和兴起，这就是“国学”和“神国思想”。其次，当人们追寻“忠”的观念，这个日本儒教的最重要的美德时，他会发现这个观念并不一定就为德川时期的结构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德川时期许多右翼知识分子，如吉田松阴，就曾推论说，他们应该忠于自己

的封建大名，大名应该忠于将军，将军应该忠于天皇，这样看来，他们本身应该间接地忠于天皇；当天皇与将军之间的关系失和的时候，这一系列的“忠”的连贯性就被打断了，人们将不得不被迫选择是忠于天皇亦或是忠于将军。

此外，“神授土地”原则的发展相应地导致了强调天皇神圣性的增长。这样，一旦德川制度陷入政治危机，人们提倡向以天皇为中心的制度转变的气氛就很容易形成。即便德川末年没有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这样一个阶段也迟早会到来。不过，向日本海岸推进的西方战舰迫使日本人正视了这种技术上的差距。经过许多曲折之后，西方的技术和“神授土地”的原则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起来。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开始相信“日本的精神加西方的能力”是日本应该遵循的道路。这样，在德川时代后期，日本的知识界开始右倾，而这正是德川文化政策的结果。这样的知识界大规模兴起，以致遍及整个日本。

除了这种知识界的兴起之外，德川时代的社会结构中还有其他的显著变化。由于长期的闭关，日本几乎完全断绝了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而由于持续的稳定和统一，日本的国内市场扩大并稳步地发展起来。结果，农业部门从自然的、自给自足的形式

转变为生产商品的形式，即商业农业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封建大名不得不筹集伴随着“参觐交代”制而来的大量开支，此外，还存在一个不从事生产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庞大程度与当时的生产能力很不相称。这意味着农民必须负担过多的赋税。结果，较贫困的农民被迫与自己的土地分离，变得更加贫困；而那些已经获得了一些财富的农民通过农业的商业化，能够吞并这些土地，在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从事自己的农业，从而变得更加富裕。当农民加强了他们对土地的拥有权的时候，封建大名对领地的领有权就被削弱了，于是，封建主义组织的基础就被动摇了。同样，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卷入高利贷的资本数量增加了，商人阶级也分成为少数富裕商人和多数小本商人两部份。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也分裂了，贫穷的武士不仅不能够维持与他们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身份相适合的生活水准，而且需要从事某些第二职业以求生。

在这个分裂了的阶级中间，既不是富裕阶级（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也不是没有财产的人（租佃农和仆人），而是以低级武士为核心的知识界成了明治维新的推动力量。明治时期的资产阶级并不像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它既缺乏战斗性，也不具革命

性。事实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是站在幕府一边的。虽然贫苦的农民和租佃农确实举行了起义来反抗幕府，但这些起义并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他们既没有愿望也不具备能力去推翻幕府、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在富商家中工作的仆人和城市中的贫民同样没有被组织起来，也不具备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的能力。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能力，并且通过战国时期的经历而完全意识到了：如果幕府之外的任何人进口了这种西方的产品，幕府的统治立刻就会受到威胁。因此，绝对控制西方技术的进口就成了维持幕府政权的生命攸关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被动的，但它却是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控制进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察它的话，这种闭关政策并不是表现对西方文化和技术的无视，而是表现了对西方文化技术的恐惧和钦佩。

当英国、俄国和美国的商船和战舰在德川时期末年开始到达日本，并要求日本开国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明显了：如果继续闭关自守，整个国家就有可能遭到西方国家的围攻。统治阶级和知识界认识

到：为了维护德川幕府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这个国内目标而设计出来的闭关政策，要作为一项对外政策是不可行的。相反，这项政策有可能导致日本的毁灭。这样一个矛盾的出现并非由于日本经济和生产力的自发演变（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明治维新的原因），而是由于西方和日本之间的技术差距所产生的外部压力。因此，正是知识界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最敏感的反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了解西方的热切愿望。

在如何对待这种技术差距的问题上，全国的舆论分成为两个阵营，这丝毫也不奇怪。第一个阵营是攘夷派，他们的论点宣称，应该[illegible]，像以前一样继续闭关。第[illegible]他们坚持认为，这样[illegible]技术上的鸿沟实应该[illegible]所面临的危险揭[illegible]第[illegible]种观点[illegible]观都[illegible]

继续进展。最初，幕府和知识界的许多人很自然地支持保守的“攘夷”论调。后来，当幕府（它有义务处理此事）转向更为现实的“开国”观点，并最终实行了这种政策的时候，幕府和排外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在下级武士）之间的对抗便加剧了。

很自然，“攘夷”论有许多变种。从一个极端上看，有狂热的和过分简单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他们把西方人都看成是外国的野蛮人。从另一个极端上看，也有像吉田松阴（1820—59）这样的人，他们承认西方的能力，并对开国的必要性予以充分考虑，然而却坚持“攘夷”论，因为他们不赞成西方要求开国的那种黩武和压迫的方式（因此，他们仅仅是在为了维护国家尊严的时候才同意日本“攘夷”；在此之后，他们认为日本应该自愿开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在“攘夷”论的支持者中，即便是最富有思想的人，也没有一个关于“如在‘驱夷’中为西方人所败应该怎么办”的详尽计划。因此，这个理论本身是鲁莽的和极端危险的。

当人们在考虑抵御西方国家的国防问题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类型的政治制度会使日本更强大？许多知识分子，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

都在深思这个问题。结果，他们都相信，即便是当时的幕府制度保留下来，也不可能不修改。那么需要修改什么呢？如果再多的修改也不可能带来较大改进的话，幕府结构是否应该被完全抛弃？如果被抛弃，应该用什么样的新制度来代替它？对这些问题，知识界既没有一个清醒明晰的答案，也不具备平心静气分析这种形势的能力。

这种无知是对闭关的长时期中压制西方学术的惩罚，知识界在社会科学思想方面缺乏训练。在德川幕府统治的稳定时期，儒教填补了这个真空。这个制度开始动摇时，儒教的劣质产品，诸如“国学”和“水户历史学派”（即竭力效法“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原则的“神授土地”的原则和“天皇的土地”的概念）又变成了决定对外政策的准则。例如，吉田松阴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日本和西方之间的技术差距；然而由于他的民族主义的感情，他仍然是“驱逐外夷”思想的支持者。在他被杀前几天，他完全转变成为在“水户历史学派”影响下的“天皇的土地”原则的狂热鼓吹者。由于自认为唯一正确并掌握着忠诚标准的狂热的“天皇的土地”的意识形态与“驱逐外夷”的论点相结合，结果就确实具有威胁性了。许多在国学和

水户历史学派影响下的“驱逐外夷”的鼓吹者并不坚持任何特别的政治学说，他们只是模糊地意识到现存制度应该由一种天皇集权制来代替。他们不可能以一种不带偏见的、分析的眼光来观察对外关系和国防等问题。相反，一切事物都要由“伟大的责任”和“公正的理由”这些主观看法来评判。因此，这种右翼的意识形态把国家引入歧途的可能性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样大的。

此外，就持反对立场的开国论来讲，它不过是反“攘夷论”之道而行之的理论罢了，根本就不具有逻辑基础。正如在“攘夷论”的支持者中，有强硬路线与温和路线之分一样，在“开国论”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攘夷论”中的“外夷”派相对应，在开国论中存在着“投降”派。这一派认为，西方人无疑是野蛮的。但考虑到他们的军事力量，日本除了“开国”没有其他选择。与“先驱夷、后开国”派相对，开国论中存在有“先开国，后驱夷”派，他们认为，由于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开国是不可避免的；开国后，日本应该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一旦力量充足了，就应该驱逐外夷，恢复到闭关自守的美好时代去。可以看出，在两种论点中都有着数不清的派别，它们相互间观点上

的区别很模糊而且“攘夷”论和“开国”论本身之间的界限也不完全清楚。此外，在捍卫某派别的辩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一种合乎逻辑的理由，他们能够做的仅仅是诉诸感情。

于是，一个人的论点不断地在变化，在感情上他坚持“攘夷”论，但在实际政策中却维护“开国”论。由于这种依赖个人观点的状况，在藩、幕府和宫廷这些机构的观点方面就出现了更大的变幻，它们的看法如何，完全依赖于谁是它们的发言人。例如一个藩派出两名代表去出席大约同时举行的两个会议，结果这个藩在两个会议上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因此，在关于“攘夷”还是“开国”问题上，建立怎样的国家的观点是完全模糊的。由于受到各类机会的影响，这些观点在形成过程中仍呈现出不规则运动的曲线。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开国”政策的鼓吹者井伊直弼成了幕府的大老（首席部长），他不仅在没有天皇敕令批准的情况下缔结了通商条约，而且软禁了反对他的作法的封建藩主，并在安政大狱中镇压了亲天皇的知识界发动的反幕府运动。这就把知识界逼到了一个更为坚定的反幕立场上。结果，在1860年的“樱田门之变”中井伊被刺死。此后，幕

府采取了一条安抚路线，长州和萨摩两藩提出了“宫廷和幕府联合”的理论。这个理论宣称，为了创造国家的统一，幕府应与在京都的宫廷联合起来。关于在联合体中究竟是幕府还是天皇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派别，但是两派都把联合的理论看作是保留幕府机构的一种方法。如果事情果真这样解决，那么，那些提倡“尊王攘夷”理论的反幕府派知识分子就成了失败者。

甚至还在上层人士讨论“宫廷和幕府联合”的问题时“攘夷”运动中的下层人士便加强了他们的暴力行动，出现了许多针对外国人和幕府卫士的恐怖行动。这种战术最终获得了成功，1863年，天皇发布了“驱夷敕令”。长州藩炮击了美国商船和法国、荷兰军舰，并遭到了美国和法国军舰的反击。萨摩藩也由于“生麦事件”中的对英国商人理查森被杀的赔偿问题，遭到了英国军舰的炮击。第二年，长州藩又遭到英、法、美、荷联合舰队的进攻。结果，这些提倡“攘夷”论的抵抗者承认了自己理论行不通，并且开始与诸如英国外交官拉瑟福德·阿尔科克爵士（即阿礼国——译注）和哈里·帕克斯爵士（即巴夏礼——译注，他们分别为第一和第二任驻日公使），特别是欧内斯特·M·萨托

（公使的译员，后来被封为爵士）友好相处。从这时开始，他们的首要目标转变为推翻幕府。

3

在驱夷敕令得到天皇批准后不久，萨摩藩和会津藩的人在京都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攘夷派的贵族。当时两藩都主张宫廷与幕府联合，不过会津藩所想像的联合体是以幕府为核心，而萨摩藩所想像的联合体则是以它操纵的宫廷为焦点。随着事态的发展，两藩的目标很难完全一致，但他们对长州藩反幕府的活动都怀有敌意。这一年政变之后，长州藩武士在京都皇宫的一个宫门——蛤御门挑起了一场激烈战斗，企图恢复他们的影响。在这场战斗中，长州藩又失败了。

幕府立即对长州藩进行了一次惩罚性的征讨，并打败了它，但是，作为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幕府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开国”令与“攘夷”政策之间的争论和知识界对幕府的反抗了。问题变成了以藩为基地的内战。长州藩失败的结果是它的大名公开声言效忠幕府，但是第二年，它的志愿军队的

领袖高杉晋作又在长州藩内发动了内战，该藩大名（藩主）再次回到幕府反对派的队伍中去。这激起了幕府第二次对长州藩的征讨，然而这一次征讨以幕府失败而告终，攘夷派中的反幕倾向突然强烈起来。

在幕府发起的两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之间，萨摩藩所采取的立场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萨摩藩开始时承认“宫廷与幕府联合”的计划，想控制宫廷，使幕府和各藩服从它。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藩从一开始就是反幕派，不过没有达到企图完全去除幕府机构的程度而已。开始时，它的态度不明朗，但到了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藩战争失败之后，它表明了自己的反幕立场，并且（根据第二次征长战争之前萨、长两藩缔结的盟约）拒绝了幕府关于让其派军队参加征讨的命令。这当然引起了萨、长两藩关系的极大改善，这又坚定了他们推翻幕府的共同目标。以前提倡“开国”政策的萨摩和坚持“攘夷”论的长州两藩之间的联盟表明了一个事实：“攘夷”派的知识分子最终承认，解决日本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差距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不在于与西方开战，而在于打败幕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

此时，幕府自己在国外派驻有使节、派遣了留学生，拥有西方式的陆军和海军，实行了根据才能任命政府官员的制度，建筑了造船厂、炼铁厂、一个加农炮工厂等等，并且在进行全面的努力以使幕府机构近代化。“攘夷”派也希望与外国进行商业贸易，并企图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国还是“攘夷”的问题不仅在反幕派与其他各藩之间，而且在幕府与“攘夷”各藩之间都不再是争论的焦点，这个焦点已经转变为是保留幕府机构（在一个近代化了的形式上），还是建立一个真正近代的、新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对于“尊王攘夷”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攘夷”的概念除了作为一个口号之外，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尊王”这个词也已经降低到仅仅是他们运动的一个口号的地位。明治维新从来没有一个精确的行动计划，革新派是通过不断地重复试验和犯错误的过程而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并一步步地接近了正确的途径的。他们认识到，“攘夷”论与填补技术差距是毫不相干的。答案在于建立一个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于是他们便在推翻幕府的道路上联合起来。但是，当他们开始仔细地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近

代国家时，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明确的看法。他们只有一种极其模棱两可的、过分简单化的、危险的感情，即认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日本的政治制度应是日本人理想的典型。

上层武士支持“宫廷与幕府联合”的理论（就像孝明天皇（1831—66）已经积极地从事的那样的联合）。根据这种理论，天皇将恢复在日本政治中的中心地位；而德川幕府也将保留，尽管要改变形式。对于下级武士和知识分子来说，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就意味着罪恶和冲突的根源并没有去除；但是由于天皇本人是这个联合计划的积极鼓吹者，“尊王”派的革新者便与天皇发生了冲突，1866年9月，22个反幕派的宫廷贵族，包括岩仓具视在内，发起了一次意在阻止宫廷和幕府联合的运动；天皇坚决地惩罚了他们。一个半月之后，36岁的天皇突然死去（立即有谣传说他是被忠臣们所杀），16岁的明治天皇继位。

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在天皇和“尊王”派革新者之间是不幸的，但是它却表明，对于某些忠臣来说，“尊王”不过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口号而已。即是说，他们并非是根据天皇的意愿行事、执行他的命令的忠诚卫士，而是有着自己独自的行动计划的

一些人（虽然他们自己对该计划的细节模糊不清），这也暴露了他们本身就是天皇政治上的反对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失败的革新事件（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中，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天皇和“尊王”派的关系又重现在天皇和那些最初企图革新宫廷的年轻右翼军官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在1936年“二·二六”暴乱中，天皇被强烈地激怒了，命令“必须火速镇压叛乱的士兵”。然而，从军队利用军队来清洗内部冲突的反对派这个角度来讲，它并没有能够使自己得到真正的清洗，并且最终发生了一场天皇实际上被右翼军官扣作人质的“宫廷革命”。能量逐步地积累起来，日本最终陷入了太平洋战争。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如此，萨摩和长州两藩接到天皇倒幕的敕令之前，他们不得不面临来自宫廷内部的抵抗，这种状况随着孝明天皇的去世而结束。

在宫廷的革新之后，还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完成明治维新。虽然将军的正在削弱的统治权于1867年底交还给了天皇，但幕府与萨、长两藩联军的战争仍在继续。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战役之后，江户城很快就投降了，东北地区残存的幕府势力的堡垒会津城也陷落了。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

扬最后于1869年在北海道投降。明治维新开始于本州西端、九州的东南岸和四国的南岸这些与西方接触机会最多的地区，而结束于与西方接触机会最少的日本东北地区；它的胜利者是用西方的武器很好地装备起来的萨摩、长州两藩的军队。这些事实非常恰当地表现了这场维新的性质。维新过程中的这种地理格局也许还说明了在政治权力的天平上幕府将军是怎样越变越轻的。

在明治维新的两年中间，新政府一直在探索新的政治结构。在如何对待已经把政权奉还天皇的幕府将军的问题上，革新派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到底是把德川家族降低到封建大名（藩主）的地位，建立一个藩主议事会来代替幕府，并建立一个宫廷和幕府的联合政府；还是根除幕府制度，用一个天皇直接统治下的近代机构来代替它（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此外，在新的制度中，天皇应该占据什么样的政治地位，他应该是一个绝对君主还是一个立宪君主？革新派在困惑中谨慎从事，随着维新的进展而不断修改着自己的计划，这样，他们一直是处在最糟糕的状况中，仅仅是在一种特定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新政府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决定以便

执行。不过，正如新政府的主要成员护孝允、大久保利通、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之间的通信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并非满怀信心，而是总有一种新政府不知哪一天会崩溃的危机感。新政府极为活跃，做出了无数的决定，其中许多决定推翻了以前的决定，招致公众对这些决定的不稳定提出了批评。

不过，人们不应该过分地非难这些紊乱的措施。一定不要忘记，新政府是由那些最初把“攘夷”论作为抵御西方的一项政策来倡导的人们建立的。虽然随着事情的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最终懂得了唯一正确的防御政策是日本的近代化。这样看来，他们对如何实现近代化的问题还考虑得不透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把日本明治维新与俄国十月革命作一个比较。在俄国，社会科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革命是在革命者对俄国发展的前途进行了理智的讨论之后才进行的。必须承认，与这些俄国革命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治时期的维新派完全是愚昧的。因此，明治政府不可避免地犯了许多错误，而且从事后的观点来看，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反动的政府。例如，这个新政府继承了幕府取缔外国宗教的

政策，发布了一个禁止基督教的公告，因而引起了外国的抗议。此外，五条誓文的第一条写道："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然而，这并不能保证近代议会政治的建立，却较能保证封建大名议事会或类似东西的建立。

尽管有这些缺欠，但考虑到它们所发生的时代，那么，作为开创近代帝国国家制度的明治制度必须被看作是一次成功。人们不应忽视英国，这个在与日本交往的国家中扮演主角的国家在最后确定明治维新的形式上是具有影响的。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即幕府最后时期的经历也使得明治政府希望建立一个有限制的、而不是绝对的天皇制度。法国援助幕府以对抗英国对倒幕派的支持，不过，两派都不允许在政权更迭的年代里把国内冲突发展为两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代理人的战争。相反，他们在短时期内毁灭了长期存在的宫廷与幕府对峙的封建政治结构。那些卷入此事的人物们值得赞扬，当然英、法也不希望日本国内的冲突旷日持久。

某些人把上面所说的明治维新称作一场贵族革命。从表面上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因为维新的主要力量确实是低级武士组成，尽管他们的级别低，也还是属于德川封建制度中的统治阶级。此外，某

些藩主和贵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明治维新被称作贵族革命，或说是来自上面的革命的话，它就妨碍了对后来发生的事件的解释。

首先，革新派没有做什么事情来使本阶级获利。相反，他们努力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权：1869年，他们简化了德川时期复杂的等级制度，保证了职业和婚姻方面普遍的选择自由；1871年，他们收回了藩主统治的权力，废除了藩的领地。由于采取了这后一个措施，武士过去从藩主那里领取的奉禄如今改由中央政府支付，从1873年开始，这些奉禄被逐步废除，到1876年便完全取消了。奉禄取消后，政府发给武士们公债；许多武士用这种公债作为资本开始从事实业活动，在他们的努力失败后便最终沦为无产者。

武士们的封建经济特权就这样被废除了。除此之外，1873年还颁布了征兵令，这意味着武士从此不再垄断保卫国家的义务和荣耀。明治政府采用以普遍征兵为其主要内容的近代军事制度无异于宣布明治结构不是以旧的统治阶级为基础。由此，可以愈发清楚地看到：明治政府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德川幕府的意识形态。这样看来，武士阶级即贵族是受到维新影响最严重的人，而他们自己也完全

清楚这一点。心怀不满的武士甚至在维新之后仍不断地叛乱，这种叛乱以1877年的萨摩战争达其顶点。这样的维新不能称作“贵族革命”。如果德川庆喜进行的进步的改革获得成功，按照“宫廷和幕府联合”的路线建立起了新的结构，那么，把它称作是“贵族革命”倒是适宜的；但把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明治维新称作“贵族革命”却不合适。

其次，另一种理论声称，忠于皇室的人的目标在于通过明治维新来恢复天皇的统治。确实，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尊王”论的倡导者，在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尊奉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的学派的狂热复古主义者，以及水户历史学派影响下的右翼分子。甚至他们中间最现实主义的和最进步的吉田松阴也在被处死之前的几年变成一个固执的右翼狂热分子。显然，这些思想对于近代化没有任何贡献；不仅如此，它们甚至具有破坏作用。因此，维新之后，这些思想的倡导者受到了远非合意的方式的对待。维新之后不久，新政府的确把宗教事务大臣（神祇官）置于首席大臣之上，并且宣布了“神道教作为国家信仰”的原则，许多国学学者和神道教徒都在新政府中任职。但是，“废藩置县”之后，神祇官便被置于首席大臣之下。此外，神道教的保

守性质与新政府的性质不协调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神道教作为国家的信仰”这一原则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那些曾经在维新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现在对此心怀不满的右翼知识分子在新政府中没有获得足够重要的职位。他们与受到维新侵害的武士联合起来，发动了佐贺叛乱、神风连暴乱和萨摩战争。从此那些残余的极右翼思想转入地下，并且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在60年后起爆，最终把国家引向了毁灭。没有更认真、更彻底地实行反右翼思想的措施，这显然是明治政府的一个错误。但是，明治政府通过排除那些以前曾与它志同道合的狂热的右翼分子而使自身成为一个近代政府，这个事实从维新的进程来看，必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明治维新是由德川制度下聚集起来的经济矛盾的最后爆发所引起的。他们举出德川时代后期农民不断起义的例子作为支持这种论点的论据。当德川政权接近它的末日时，农民以及城镇居民各阶层之间贫富的两极分化加剧了。然而，我认为这样一种矛盾的积累可能成为一场改革的部分背景，但却不是它的原因，也不是它

的动力。自大约1750年以来，农民起义和暴动不断发生，到1837年大盐平八郎起义达到顶点。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这类起义的数量：天保时期（1830—43年）每年平均为11次；万延—文久时期（1860—63年）为8.5次；元治—庆应时期（1864—67年）为15次。可是到了维新之后，这类起义几乎无法控制，1868—70年每年平均为30次，1871—73年每年平均25次。这些数字说明，明治政府不仅对武士阶级不够温和，而且对农民也不够温和。

此外，总的来看农民当时的意识并未充分地发展到要求、计划和施行打倒封建结构，建立一个统一政府的程度。确实，到德川时代末期，一个民族国家创立的各种先决条件（如各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语言的统一、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已经形成。但这仅仅是与日本以前的情况以及某些不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实际上，群众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先进，对此不能做太高评价。“参觐交代制”带来了语言的统一化，尽管如此，许多藩（如萨摩藩）仍努力保存他们自己独特的方言。此外，作为这种制度的结果，仅仅是武士阶级的成员相互融合、接触了，而普通人，特别是农民依然被固着在土地上。我认为，德川时代后期大众的民族意识水

平足以接受一个民族国家，却不足以为了民族统一的目的而仔细谋划和实行一场维新。

确实，在高杉晋作组织的志愿部队中，有农民和城镇居民，他们在各地打败了幕府的军队。如果没有这些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这种活动，明治政府能否实行征兵制还很难说。由于这个原因，某些人把维新中的重要因素放在人民大众的作用上，但是人们也必须考虑到问题的另一面。例如，在1867年进攻江户城的战役中，包括萨摩、长州在内的20多个藩参加了战斗，而在东北和北陆地区的战役中，则有30多个藩站在幕府一边作战。在交战双方的各藩中，萨摩，长州和会津藩作战勇猛，而其余各藩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战斗精神。萨、长两藩比其他藩勇猛，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用西方武器很好地装备起来的；另外也因为其他各藩士气低落。此外，正如我前面所说，正是由于卷入的成员的态度，明治维新才没有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或西方大国之间代理人的战争。然而这样一种发展是由于除了萨、长两藩外，其他各藩相对来讲对维新不关心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假定许多藩如萨、长两藩那样清醒，又有许多藩像会津藩那样猛烈地反对维新，那么，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普通大众认识水平很低，这已被参加炮击下关的外国军舰上的水手的记录和当时在场的欧内斯特·萨托爵士所证实。德川时期末年，等级制已开始解体，各地方间的文化交流已顺利进行。然而，等级和藩的意识依然普遍存在。长州藩的大多数农民和城镇居民就把与外国舰队的交火看作是长州武士与外国舰队之间的一场地方性战斗。下关海峡对面的丰前藩的人民也把它看作是长州藩和外国人之间的战斗。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看法的典型代表。因此，不能把明治维新看作是为了人民、由人民发动的，而应该把它视为上层人士的一场维新运动。新政府建立后，立即放宽了等级制度的限制，后来又废除了它，组织了教育机构，使国家制度近代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国家长期发展的措施。他们的短期经济政策却不一定成功，这就使人们认为这场维新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上层人士的，是由上层人士所发动的。因此，在维新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心怀不满的人不断地举行叛乱，但是明治政府镇压了他们，并继续从事国家的长期建设任务。这样，日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闭关之后，日本开始了近代化和西方化的基本目标迈进的新篇章。公元一八五三年，外国势力所唤醒的知识分子走到了先锋的地位。

上面已经强调指出，明治维新没有一个清楚而明确的计划；它是在经历了许多曲折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偶然机遇的很大影响。我以为，如果在维新过程中吉田松阴或者孝明天皇没有死得那么早，维新的进程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例如，吉田松阴极为勤奋而且思想敏锐，对于事务的发展具有较得体的反应，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天皇的土地”论的狂热鼓吹者。由于他的学说是支撑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如果他活着的话，很有希望担任新政府中的最高官员。如果他继续支持狂热的“天皇土地”论，人们可以想像，明治结构将会变成一个比实际上所表现的更为右倾的制度。

再如，孝明天皇是“宫廷与幕府联合”论的热心支持者，虽然他以前曾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由于德川庆喜将军是进步的，如果孝明作为天皇的统治和庆喜作为将军的管理能够继续（事实上，他们正式合作的日期只有四个月），那么，他们将会打破僵局，使宫廷和幕府联合成强有力的统治结构的思想得以实现。如果一个更为右倾的绝对专制制度或者一个宫廷与幕府联合的封建结构建立起来，那么日本迟早可能需要第二次维新。特别是就上面提到的

吉田的例子来说，它将意味着把早期明治时代与早期昭和时代的极端民族主义年代直接联系起来，日本可能已经自我毁灭而不会在西方得到任何好名声。把日本历史进程看作是受惠于这两位杰出人物在近代化维新过程中的悲剧性的死亡，并且认为人们应因此而感谢这两人，恐怕不能算作把自己的理解过份地强加于历史吧？

4

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讨论的日本历史的诸方面与英国历史作个比较（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的比较只能在相当简单的基础上进行），这里显然存在着很有趣的相同与不同点。首先，亨利七世也许是英国历史可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相比较的人物。1485年他打败了约克王室的最后一个国王理查德三世，成为都铎王朝的第一个国王。同时，他命令解散封建贵族的封臣团。在这以前，贵族保留着实际上的私人军队——封臣团，他们身著各自的制服，佩戴各自的纹饰；但是亨利七世禁止他的一切臣民保留封臣团，不论其阶级、等级和地位如何。通过

这种作法，他亲自垄断一切权力，开创了绝对君主制。亨利七世采取的这种措施相当于丰臣秀吉1588年发布的《刀狩令》。丰臣秀吉统一了国家，并使大名们多少得服从于他的意愿，所以，他可以被认为是使具有绝对君主制性质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得以建立的人物。然而在英国，由于绝对君权的建立，国家的封建性质被削弱了；而在日本，从丰臣秀吉时代开始，并且在整个德川时代，政府一直都是处于具有类似于绝对君主那种权力的关白或将军为首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支配之下。这意味着英国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时期比日本要早几百年。

英国绝对君主制走向终结是英国内战（1642—60年）的结果。在日本，中央集权封建制时期的结束则是由于明治维新。同时，这个国家也进入了一个近代政治结构的阶段。因此，日本近代政府的建立比英国晚二百年左右。同样，从都铎君主制时代起，新海路和新大陆开始被发现。1445年，非洲佛得角被发现，1486年，好望角被发现。其他的发现包括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之路，1500年卡布拉尔发现巴西，1519至1522年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些新大陆的发现大部份是由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兰人完成

的，英国当时落在后面。但是从十六世纪后半期起，在损害这些新大陆方面，英国人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例如，1583年，汉弗莱·吉尔伯特在纽芬兰建立了一个殖民地。1584年，沃尔特·雷利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开始更积极地活动；无数的贸易公司建立起来。贸易垄断权自然落到了那些与王室勾结在一起的贵族和商人手中。这种趋势由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溃败而进一步加强了。1600年，东印度公司建立。

相反，日本在丰臣秀吉和德川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开始之前，而且是在日本成为一个对外完全封闭的社会之前很久，就与西欧（主要是葡萄牙）有过很频繁的接触。后来，直到大约十八世纪末，闭关政策一直在全面执行。但从那以后，与西欧的接触又恢复了。尽管英、日两国早期对外接触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当与世界的普遍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时，不论是英国的绝对主义制度还是日本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结构都开始崩溃了。

然而，在日本和英国，这种崩溃的环境却是完全不相同的。在日本，德川政权是由可归因于技术差距的这种国外压力所打倒的；而在英国，打倒它

的压力则来自国内。1642年英国内战开始时，近代科学只处于初始阶段。哥白尼在一百年前提出了日心说（1543年），而伽利略在60年前发现了摆锤的等时性定律（1583年），但是，微积分尚未被人们发明，万有引力定律也未被发现。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战舰，但它们都是些利用帆获取动力的船只。威胁日本的汽船的发明还是165年以后的事情。英国不像日本，后者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外国压力的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开始进行一场打倒绝对主义制度的革命的；前者绝对主义结构的崩溃是由于它本身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上面已提到，大约从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对抗的时代开始，英国就积极地卷入了对外贸易，结果，那些与绝对君主制紧密相连、并握有贸易特许证的贸易垄断者便与普通的工业资本家（羊毛品制造商）、小商人和自由民发生了冲突。而这些人控制着议会（下院）。因此，在垄断集团和议会集团之间就存在着政治斗争。此外，许多小商人、资本家和自由民是清教徒。因此，这种斗争就变成了清教和英国国教之间的斗争。这样，信奉清教、提倡自由和民权的议会集团便开始了一场反对由国教支持的、倾向于垄断和专制主义的保皇派的革命。经过长期斗

争，完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绝对君主制，创立了一种有限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坚定地建立起了议会政治。从这个方面看，英国革命是一场由一个新阶级的兴起而导致的革命，而不是一场像明治维新那样的旨在保卫国家，使其免受外国威胁的革命。

这种革命的结果是近代资本主义在英国发端。不过，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建立，社会上就必然会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即一方面是热衷于积累资本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不停劳动的工人。即使有了工人和资本家，如果工人没有工作的愿望，而资本家只要不用鞭子或枪威胁他们，资本家是没有任何办法生产出任何剩余产品的。另一方面，即使工人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如果资本家挥霍了所有的剩余产品，资本的积累也不可能发生。为了建立近代资本主义（这里是从建立一种进步的经济制度这个意义而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资本得到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年复一年地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进行），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都必须节俭。

幸运的是，基督教是主张节俭的。然而在天主教中，教堂的生活与世俗的生活是分离的，对节俭的追求是教堂中的教士所从事的事情。这样，在天

主教的世界中，节俭就成了世俗世界之外的教士的行为，对普通人则不要求节俭。在总体世界中，当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也不需要节俭，甚至极端纵欲也得到宽恕。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天主教的统治下也并不兴旺，因为它的主要依靠是节俭的行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一场宗教改革就成为必要的了。这就是说，节俭行为要从教堂中解放出来，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差异要消除，图利的生活要与节俭的生活在总体世界中溶合起来。

清教恰恰是达到了这样一种解放，结果出现了一种局面：工人“至少在工作时间没有频繁地算计怎样以最大的安逸和最小的努力来挣得通常的工资。相反，工人必须努力工作，好像这本身就是绝对目标，是神的感召一样。”① 企业家们也开始把追求利润的活动看成是执行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此外，清教的世俗的节俭意味着反对享乐和消费；奢华的消费受到特别的排斥。这样，通过节俭形成了资本，而新的资本又被用于生产，成为利润的新的源泉。于是，清教引起的宗教改革创造了近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拥有最诚挚的信念、控制着巨大的财

① M·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76年伦敦英文版，第61页。

富，却满足于极简朴的生活、努力积累资本的一种新型的人。

由于近代资本主义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也就造就出来了。这时，一场宗教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甚至把宗教称作是鸦片，并加以严厉谴责的马克思也承认这个事实（虽然他显然不赞成它的宗教基础），他说："积累啊！积累啊！那是摩西和预言家们的教训！"①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这句话用韦伯的方式说出来，那就变成了："节俭啊！节俭啊！那是加尔文和预言家们的教训！"这话意味着如果没有节欲精神，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建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1642年，是路德死后大约一个世纪，加尔文死后大约80年，《五月花》号航行到北美后的大约20年。此外，这一年也是伽利略去世和牛顿出生的年代。按照历史的顺序，先有宗教改革，然后为建立近代资本主义的革命才发生，最后近代科学被建立起来。此后，各种动力机械发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了。人们可以看到，1780年到1800年的英国，生产力飞跃发展，在英国革命结束的一个多世纪以后，英国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52页。（——译者注）

本主义才真正地起飞了。创造这种起飞的条件大约用了一百年的时间。

这样看来，新教（清教）的传播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是英国近代资本主义建立的先决条件。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在这些同样的先决条件具备了之后才发生的。首先，日本当然不是一个新教的国家；其次，德川统治末年，资产阶级虽从一定程度上看是兴起了，但还不那样强，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具有战斗性。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德川的专制主义的政权。事实上，在十八世纪，像石田梅岩（1685—1744）这样的一些人已经出现，他们阐述了一种商业道德学说。他们声称，赚钱活动与目的在于积累资本的通过节俭来攒钱的活动从道德上来讲，绝不是卑鄙的。他们主张保护旨在追求利润的努力，鼓励商人。然而，在闭关的环境下，德川时期的商业尽管发展了，但一直是一种国内的商业活动；这个事实意味着商人既没有勇气，也没有通常可以在外国商人身上发现的那种冒险精神。对德川政府来说日本商人一般都很顺良，并且支持现存秩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了使国内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繁荣起来，必须维持国内现状。甚至在德川政权行将灭亡之日，日本商人依然没有看到对外贸易

的可能性。

这就是当日本面对源于近代科学的令人惊讶的技术时的情况。对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日本，保持日本的独立，使之免遭此类技术之害。通过使用这类技术来使个人获得利润尚未成为首要关心的事情。问题在于如果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想要掌握近代技术，想要成为一个像西欧国家那样强大的国家，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改革日本的政治结构。于是，下层武士和具有一些民族感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明治维新；而除了从国内贸易中获取个人利润之外就很少关心其他事情的日本资产阶级在这样一场维新中被远远抛在后面是非常自然的。结果，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后，作为资本主义驱动力的资产阶级在日本也一直很软弱。

英国政府和议会制度是王权和资产阶级之间妥协的产物。英国资产阶级具有一种活力，这种活力给它的发展带来了内在动力；而日本的资产阶级不仅人数少，而且也不具备这种活力。因此，明治政府自己被迫用通过税收从农民那里得到的钱或者通过印刷纸币得到的资金去建设近代的工厂。然而，不久以后，政府不再能够妥善地管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这就引起了通货膨胀，接着出现了破

产的状况。政府被迫以很便宜的价格把它的近代工厂卖了出去，但这个相当令人绝望的政策却产生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一种充满希望的繁荣局面出现了。这就是说，那些以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购得了这些近代工厂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资本家。这就使资本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强大的资本家的存在，在日本具备了。不过，他们并非那种反对政府的意志坚强的资本家；由于明治时期的许多资本家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政府的恩惠，因此，他们继续寻求政府的保护，继续对政府保持着忠诚并与之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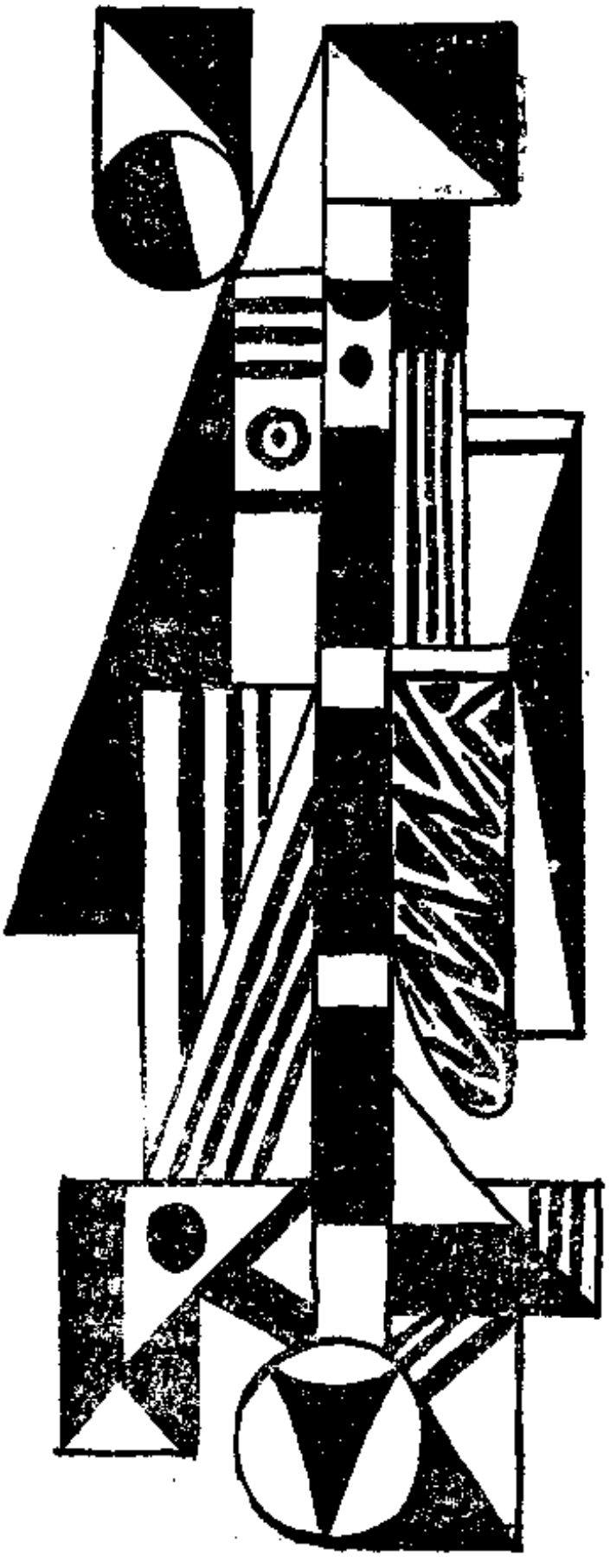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日本人没有把节俭作为自己的信念（这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近代资本主义也肯定不会在日本取得成功。在当时的日本，佛教和神道教这两种传统的宗教对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德川幕府文化政策的一个结果是使儒教在日本人民中间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儒教在日本被理解为一种伦理道德制度，而不是一种宗教，它直接地（或者通过武士道和绅士风度间接地）教导日本人民，节俭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因此，在明治维新末期，日本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的

第二个先决条件；不过，由于新教和儒教所提倡的节俭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在日本和在英国很自然地也不一样。

日本的儒教强调：（1）忠于国家（或主人）；（2）孝敬父母；（3）取信朋友；（4）尊敬师长。根据孔子的这种思想，一种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种资历制度和终身雇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是非常自然的。（此外，明治时期的许多资本家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政府的恩惠，并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与政府合作。）儒教总是关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很少考虑如何根据诸如“上帝”这样的绝对尺度来评价个人的品行，因此，在儒教世界中，个人主义是受到窒息的。然而，由于儒教崇尚理智和理性，它又与近代科学是一致的。因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立即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地吸收和汲取了西欧的科学，在1878年至1900年这个时期，明治政府使日本经济成功地达到了“起飞”的地步。于是，一种以完全不同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来管理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种把日本的精神和西方的技术结合起来的经济在日本建立起来了。

最后应该指出，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那些在社会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人是官僚，他们都是通过

竞争而严格地选拔出来的。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深刻影响，德川封建时代就是一个官僚统治的时代。当时，一个武士既是一个民政长官，也是一个军事长官。明治政府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先进的近代官僚制政府，日本的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种由官僚来指导和推动的经济，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第三章

日本帝国（之一）

1

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着手于一个“近代国家”的建设，为了寻求近代国家的模型，明治政府派出许多代表团前往欧洲和美国。其实，甚至早在维新之前，幕府和一些强藩已经秘密派遣代表团到先进国家去过。

这些人带回了新的知识财富以及有关近代国家的信息。明治政府比较并检验了所有这些信息以判明哪个国家在某个领域最杰出、最先进。例如，哪个国家在教育制度方面最优秀；哪个国家的海军最好；哪个国家的陆军最强。他们调查了各个国家的治安、工业以及财政状况。在获得了代表团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的基础上，政府作出了关于哪个领域应以哪个国家为样板的决定。例如，1872年颁布的教育制度就是以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为样板的；日

本帝国海军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复制品，而陆军则受到法国陆军的巨大影响；电报和铁路是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的，大学则是效法了美国的样板；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原型。

这样，明治国家就成了英、美、法、德等国的大杂烩。无疑，由于当时日本人认为英国在许多领域中都很杰出，因此，英国的影响是突出的。但是在日本也能看到德国类型的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思想、"富国强兵"的概念、法国类型的立法制度以及按照美国和英国的方向经营的商业的综合物。不可能指望这样一种综合物会和谐、没有矛盾，也不可能指望法国式的陆军和英国式的海军会愉快地共处。在国内各个不同的领域中间存在着对抗和争吵。当时日本似乎成了先进国家的一块文化殖民地。然而，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却认为在每一个领域中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尽可能地集各国之大成。

外来的制度和文化是否适合于在日本建立和发展？它们是否就比过去所接受的土生土长的制度和文化更适合于日本人？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由于这个原因，一定程度的让步和妥协就不可避免，至少某些日本化或者沿着日本的路线进行修正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明治维新

刚结束后的日本的环境显然不同于十七世纪英国内战刚结束后的英国。因此，对日本来说，进行一场工业革命，经过与英国同样的历史进程来使自己变成为一个强国简直是不可能的。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这种不同是与明治维新的基本性质紧密相联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进行的维新，而是一场由下级武士和知识分子发起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维新。他们认为，封建制度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障碍；新政府把在此之前由大名控制的土地和居民归还天皇；他们实行了"废藩置县"；等级制度也被废除。然而，实业家、那些不得不承担起新时代重担的人却没有从农民、工匠、商人阶级中间出现。这些人没有提出什么自由经商的要求，也缺乏进行改革的勇气。英国内战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反抗而引起的，因此在内战之后，英国政府无须承担创造实业家的任务；然而在日本，培养实业家的任务却是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由于私人实业家很软弱，政府自己不得不来扮演实业家的角色。如果明治维新进行得稍微晚了一点的话，那么日本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当时，社会主义还

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计划。在一场国家之间的竞赛中，日本一开始就站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起跑线上。

明治政府建立了国家经营的工业企业，从建设国家的观点来看，它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由于明治政府是由那些对新时代有着清醒认识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以前的武士）所组成的，因此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也就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由于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属于儒教，因此实业家的意识形态也是儒教的。这些企业都是些大型工厂，要求大批工人有组织、有纪律地工作。当时的农民、工匠和商人阶级没有关于这种纪律方面的气质，因此，最初的工人很自然地主要要从武士阶级当中来选拔（例如，在缫丝厂中，第一批工人便是来自武士阶级家庭的女儿们）。这种政府开办的工厂在当时的日本是最先进的模范工厂，这就是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一开始是以按照儒教的意识形态来管理的模范工厂为核心的。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口号下，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前进的，日本注定要沿着一条完全不同于英国的道路发展。

仁慈、正义、感恩、智慧、信用、忠诚、孝顺，这些都出自中国儒教所强调的各种美德，而日本的儒教，从圣德太子以来，几乎一直不重视仁慈和

正义，而强调忠诚、孝顺和智慧。（在日本，“仁义”一词被用来表示风行于黑社会的一种特定的道德准则。）结果，日本人根本就不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也不喜欢自由主义。特别是在明治时代以及后来，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日本人格外崇拜“法律和秩序”，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作是实现“法律和秩序”的障碍。当国家资本主义繁荣的时候，成功的企业家被看作是为国家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而当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削弱、自由制度繁荣起来的时候，成功的企业家则被看作是在魔鬼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赚了钱的幸运恶棍。在美国，赚钱是获得社会尊敬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而在日本，赚钱绝非取得社会尊敬的一个足够的条件。不仅如此，赚钱甚至经常成为遭到社会非难的一个条件。在日本，人们很清楚如何权衡赚钱与社会尊敬之间的关系。因此，企业家知道除了赚钱以外，他们必须为社会和国家做“某些事情”。他们要考虑，为了做好这“某些事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赚钱的行动。

这种从明治阶段一开始就弥漫于国家资本主义之中的精神，与德川时期商人所持的获取财富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德川时代初期，这些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根本不承担任何特别的伦理道德上

的责任，因此，他们在获取利润的过程中是否行为狠毒并未受到重视。但是在德川时代中期和晚期，商人的家族发展得更加庞大了。在家族内部产生了正式的主仆关系，商人本身也开始受到儒教伦理道德的约束，他们不再把获取财富和本人物质上的幸福看作是生活的最终目标。仅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成了“卑鄙”的行为，甚至对一个商人来说，为了自己的城镇和自己的领主而牺牲生命也成了重要的。忠于家族事务，通过家族事务来为世人服务、为领主服务、为自己的村镇服务，所有这些也开始对商人强调起来。

明治政府并没有把工业交给这类德川时期的商人去管理。这些传统的商人肯定不是高利贷者，他们具有一种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但是他们想像的社会并不是那种能够容纳一个近代国家的大社会。他们不想献身于任何比一个相当小的社会稍大一些的社会，而只想献身于自己的封建领主、城镇以及自己的家族。他们不具备一种通过在日本建立铁路、电报、造船和钢铁制造业的途径使日本成为一个近代国家的义务感；而他们能够筹集到的资本也太少，以至无法用于建设这类大企业。于是国家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建立这类企业。明治时代以

后，虽然国家已经完全开放了，但这仅仅适用于贸易领域，日本政府尚未赞同把国家开放到吸收外资的程度。结果，政府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这些企业创造资本。当时，政府收入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土地税，因此，政府把土地税提得很高，用这种收入以及国内的储蓄款来创办各种企业。这样，从明治时代一开始，农民所承受的负担就与在封建时代的负担一样沉重。

工业资本的另一个源泉是来自封建薪俸的现金。废藩的时候，政府接管了以前由各藩支付的薪俸。1873年至1874年，政府支给了那些放弃了薪俸的封建大名和武士以价值相当于过去四至六年薪俸的现金和政府公债。这样，武士们发现自己有了钱，特别是那些以前的大名和高级武士，一下子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把这些钱投资在工业上。这些人投资的准则与那些商人大不一样，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们决定投资的尺度是国家的需要和民族的利益。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感，他们对什么是国家利益有着一种相当清楚的直觉，但是他们对私人工业的利益却毫无概念，这使得他们在短时期内特别受到尊重。这确实是一种带有外行味道的武士方式的实业。

中央政府内的重要职位主要被武士所占据，有能力的武士受到政府的优待。另一方面，政府根据明治国家不应是一个封建国家的指导原则废除了等级制度。由于这后一项措施，在武士阶级中间有许多心怀不满的人。特别是在低级武士中，即使他们接受了价值四年薪俸的现金或政府公债，它们的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不再能够夸耀自己的武士地位。除了薪俸，武士地位还给他们带来了各种附加的利益。但是如今，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切。这些心怀不满的武士经常发动叛乱，政府研究过用对外征战来转移这些心怀不满的武士的注意力的可能性，拒绝了西乡隆盛提出的进攻朝鲜的计划，然而却远征了台湾（1874年）。西乡的建议被拒绝之后，这个在明治维新中作出了最杰出贡献的人物便从政府中辞职了。那些不满的武士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他们于1877年最终举行了萨摩叛乱来反对政府。在最初的十年中间，软弱的明治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现金和政府公债来应付以前的武士；进行了一次对外征战；经历了一次大的内战，几次暴乱和多次农民起义。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期望不出现通货膨胀，到1880年，政府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崩溃了。

政府不得不卖掉国营企业，这是一系列紧缩措施中的一个。从明治政府成立起，商人就一直在政府的影响范围之内活动，他们就像是政府的食品征发官，并且一直追随着政府，希望得到让步和特权。在远征台湾和萨摩藩的叛乱中，这些商人掌管着政府的物资采办，赚取了巨大的利润。在政府出售煤矿和工厂（造船、水泥、玻璃、纺织厂等）的时候，它把这些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了这类“政治商人”，或者政府以前的高级官员。无疑，这些企业中的许多厂，利润都是很低的。因此，某些企业售价是如此之低，以至实际上等于奉送一样，这些事实也许并非像现在所经常议论的那样是什么恶意中伤。然而，当时国家企业付出的工资远比私人企业要高，但这些企业贡献出的利润却很低。当这些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以后，工资比率恢复了正常，它们又都变成了经济上健全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掌握着许多政府企业的“政治商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工业资本家。他们中间包括这样一些商号，如三井、三菱、古河、久原和浅野。政府不仅给他们提供官方的保护，而且还委派有能力的人去协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工业资本家的核心，而这些工业资本家已经被政府

争取过去，他们会聚精会神地聆听政府的意见。

例如，川崎正藏是日本邮轮公司副总裁，出身于萨摩藩武士家庭。1878年，他租用了政府的土地开办了川崎造船厂。1884年该企业濒于破产，但政府通过援助拯救了它。1886年，他竟能够以令人不能容忍的低价购买下政府经营的兵库造船厂，接管了设备和人员，获得了对这样一个大船厂的控制权。从那以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即使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也总能够使自己的船厂保持足够的海军定货单。

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部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人们所谓的“友善的工业资本家”。明治政府所培育的财阀一直是与政府合作的。在昭和时代（1926年至今），日本又开始进入一种双重政府时期。虽然这种新的双重性并不像德川时代那么明显。在德川时代，宫廷只是名义上的政府，而德川将军的军事政府才是实际上的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影响变弱了，军部开始在政治中行

使真正的权力。陆军与年轻的官僚集团（即所谓的革新官僚）勾结，妄图抑制天皇、老政治家、政党和保守官僚们的权力。昭和时代初期，军部变成了一等政府，而政府被迫退居为二等政府。

明治政府所培育的财阀从一开始就忠于政府，并且是在政府的保护下发展壮大的。当他们变得强大起来以后，这些财阀开始反过来通过政党来控制政府。军部恨这些与保守的政府变得一致起来的财阀。这些财阀受到了右翼和军部的批判；1932年，三井无限公司董事长团琢磨被右翼分子刺杀身亡。结果，使财阀对军部厌恶到极点。

军部要培育忠于自己的工业资本家——新财阀，这是必然的。它必须培育那些愿意与它在“满州”（指我国东北，下同—译注）的发展进行合作的强有力的企业家。此外，在化学、电子、军火这样的新的重工业领域中也需要这类企业家。于是，像日产、日本氮化、日本纯碱、昭和电器等公司在军部的保护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的资本是在公开资本市场上从公众那里筹集来的。这些企业通过与军部的密切接触，获得了各种特许权，因此，它们忠于军部。

由于有了新财阀的忠诚，军部坚持自己“富国

强兵”的政策，结果政府和老财阀不得不跟在后面认可。在这个阶段，新、老财阀不仅供应政府和军部所需的商品，而且不得不总是密切地注视着它们的行动，并做出保证：他们自己的企业要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否则，他们企业的名字也许就会从政府所惠顾的名单中被除去。这样，政府和军部的需求基本上被新、老财阀所满足。结果，不仅商品需求获得有了保证，而且财阀们也有事可干了。这些情况在每个工业部门都存在，因此，无论是哪一个工业部门都与政府有着某种联系。

此外，1868年至1945年的77年间，日本卷入了十次主要的战争（1874年远征台湾；1877年萨摩叛乱；1894—95年中日战争；1904—05年日俄战争；1914—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25年远征西伯利亚；1927—28年远征山东；1931—33年“满州”事变；1937—41年中国事变；1941—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总计长达30余年。在这77年间的开始阶段，日本实际上不具备军事能力，不过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它变成了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和第五大军事强国。此外，日本并不仅仅控制了朝鲜和“满洲”地区，在这77年的最后阶段，它成功地把亚洲的大部份地区控制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再有，在

这个阶段，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这种经济上的增长当然不是通过经济上的自由经营而达到的，它是政府或军部在他们忠诚的资本家追随者的尾随下，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操纵和影响经济的结果。在这个时期的最后阶段，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控制经济。由于私人企业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对政府的依赖性，因此，他们很容易（或者至少相对说来没有什么反抗）屈从于一种依赖政府行政指导的工业控制。

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企业家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政府指导的基础上，也许不可能取得这种长期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一种以儒教的伦理道德作为信念的经济中，人们的心目中总是有着国家，而主要的企业又是由忠于政府的武士型的企业家来管理，因此这种发展确实是可能的。在这种类型的经济中，价格结构并不起重要作用，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筹集资本来应付政府的需求，政府的需求如何传达给企业，应该传达给哪些企业，以及企业在接受了政府需求的好处后产生出来的需求的性质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相关的。接受了政府惠顾的企业发展得大了，便产生了垄断或控制市场的情况。这些企业并不进

行对经济效果有利的激烈竞争，虽然它们为了获得政府需求而以不同的方式从事一种非经济的竞争，市场机构运行得并不好，原料也未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分配。尽管如此，日本确实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垄断部门。与此相适应，财阀也就成了日本经济的核心。

这样看来，日本政府对为数有限的企业团体有着一种特殊的偏心，而对其他企业则显示出一种不公平的无情。不过，这种偏爱多少有些不可避免，它甚至确实是政府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合理的手段。从明治维新以来，有成就的政府的一贯目标就是要把日本建成一个有着头等军事能力和头等工业的强国，建成一个不会被欧洲先进国家和美国所打败的国家。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两种处方。一种处方是整个国家没有区别地、一致地走向近代化。另一种处方则是在日本工业界建立代表队，用特殊的训练把它们提高到第一流的水平，然后再扩大代表队的规模。采用第一种方式，要等到第一流企业在日本的出现，将花费大量的时间；而采用第二种方式，就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日本建立起一个达到世界水平的“近代部门”的小核心，然后，政府就能通过扩大这个核心而在全国加紧实现近代化。

日本政府采用第二种方式作为它的发展政策，是基于如下的判断：日本经济的某些部门与英国处于同等水平而其他部门仍像以前那样远远落后的状况，总比在所有经济部门中两国间的差距只缩短十分之一要好。结果，政府对它所要打交道的那些企业显示出比较偏心，而这种政策不仅获得了那些得到政府惠顾的企业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那些没有得到政府惠顾的企业的支持。这就是说，全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强大的企业代表队。正像被选拔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获得了很好的待遇，而那些未入选的人并不抱怨一样。那些未被选中的企业也没有发出任何抱怨的声音。这种全国的一致性的产生，在一个以儒教伦理道德为指导的社会中并不困难。那些未被选中的企业正如它可能的那样，“屈从于自己的命运”了。

接着，为了把特权待遇给予那些代表企业，对其他方面增加剥削的方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不用说，遭受更多的剥削的人是农民，而他们也服从于他们的角色了。在最后时刻，一部份农民抵抗、叛乱和暴动本来是可以指望的，但这不得不被认为是一种例外。然而，仅仅在无约束地剥削农业和无限制地牺牲农民的基础上，要想使国家发展是

不可能的；不久政府就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寻找可供选择的剥削的对象。由于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日本在“满洲”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它在那儿的特权地位不仅为列强所承认，也为中国本身所承认。此外，1910年日本兼并了朝鲜。这样，日本就变成了一个殖民帝国，获得了广大的可供剥削的新地区。朝鲜人民被迫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与日本合作，以便在日本建设一个能够对抗西方的“近代国家”的核心，并年复一年地使这个核心得以扩大。日本在朝鲜和台湾实行种族歧视很厉害，1910年到1925年期间，付给朝鲜或台湾本地人的工资只及付给各地区做同样工作的日本人的60%，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数字低于50%（见表1）。

表1　日本殖民地主要城市中本地工人与日本工人工资的比较（1922年）

（日本人工资为100）

	木工	泥水工	砖瓦工	锻工	搬运工	印刷工	画框工	人力车工
朝鲜人（汉城）	54.9	64.6	60.7	—	—	—	62.6	93.6
台湾人（台北）	51.4	50.0	44.4	52.0	71.4	—	—	—
中国人（大连）	38.2	39.0	41.2	42.2	—	31.3	—	—

资料来源：《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国家事务总览》，东京，1927年。

由于能够依赖这种工资上的不公平待遇，日本企业在这些殖民地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此外，日本人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调查活动，许多朝鲜人被剥夺了土地。朝鲜的大米被日本人很便宜地大量买进，然后全部用船运往日本。移居日本的朝鲜工人在工资和在社会生活等方面遭受着严重的歧视。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有谣言说朝鲜人正试图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于是，东京地区6,000名无辜的朝鲜人被捕，并被杀害。这些被杀害的人中间包括一些被怀疑为朝鲜人的日本人。明治政府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然而，由于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胜利，它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根据自己的种族被迫分成为等级。在这种新的可供剥削的地区的支撑下，明治政府逐步地认识到了它所谓的“国家利益”，至少到1920年以前，这种结构运转得很平稳。

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在“文明和开化”的名义下，经历了一场明显的西方化过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一度也鼓励一种在消费习惯和总的文化习惯方面极端西化的政策，但后来它认识到这种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使日本人的“精神”被消磨掉。于是，他便转而鼓励保存传统的日本

生活方式。与政府的政策相连的是，人民也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全盘西化，一些日本人开始倡导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双重方式的生活，即他们在诸如衣着、食品和房屋这些方面采取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同时又继续在一种传统的日本方式中生活。在传统的生活模式被保存的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被采纳。这种双重生活方式需要两套物品：西服与和服，西餐餐具和日本式餐具，西式家俱和日本式家俱，因此使得生活费用很高；但是日本人却选择了这种双重生活方式来代替了纯粹的西方或纯粹的日本式的生活方式。西方生活方式象征着进步，而日本的生活方式却证明着他们继续认识到自己是日本人。因此，假定政府的口号是“日本的精神加西方的知识”，那么，这种双重的生活方式便是日本人的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模式。

这种生活方式的双重性有助于解释在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双重性的某些成分。由于日本人尚未发展大规模生产日本传统生活方式所需商品的技术，这些商品都是由小企业来生产的，而生产力又极低。但是，即使是在那些对西方生活方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商品中间，也有一些是不必要地被限制在大工厂中进行生产。例如，火柴一开始就是由大企业来生

产的，其原因仅仅在于它是西方式的商品；不过，当人们认识到火柴生产应该是小规模的之后，这个大工厂就被分成为几个小厂。

现在，我们把生产传统商品的小企业称作A型企业，那些生产西式商品但由于经济原因而规模小的企业称作B型企业。一些人在A型企业中发现了应由大企业来生产的西式商品。可见，如果不是由于在日本人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存在着双重性，这类小企业未必能够存在。在生产能力不同的大、中、小型企业中同时生产同样的商品或同样用途的商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生产的双重性。在日本，可以看到消费的双重性加深了生产的双重性的程度。这样看来，产生的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日本的精神加西方的技术"这一政策的结果。

不过，日本还生长出了一种第三种类型的中小企业，我们可以把它称作C型企业。它是大制造工厂的转包者，存在于诸如机器制造、造船、机动车和电器这些领域之中。这些企业根据大企业的订货单来进行生产。在多数情况下，大企业是与政府有联系的，而这些转包者则是完全独立的公司，尽管它们接受母公司的技术指导和财政援助。通过自己的能力在创造发明方面获得成功的C型企业很少有

机会发展成大企业，它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扮演减缓繁荣和萧条时期不同的需求所造成的冲击的角色。如果大企业的生产规模适合了繁荣时期的需求水平，那么在萧条时期它将被迫大幅度裁减雇员，结果，管理部门使生产规模适应于萧条时期的需求水平，或者接近于这个水平。这将意味着存在着大企业不能满足的某种需求，正是这种需求被订货单转给那些转包企业。这种企业在繁荣时期情况很好，但是在萧条期，它却首当其冲进入衰退，并且处于破产的边缘。在合同中，大企业的业务保持在极其稳定与可靠的基础上。大企业不仅在技术和财政事务上，而且在人员的雇用上面也监督着转包企业。大企业的雇员被传入转包企业的经营部门就像是送到前线去的指挥官一样，战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如果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他也可能回到首脑机关去担任高级官员。

这三类小型和中型企业相互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商品出售得很便宜，利润额很小，工资很低，这是一个与财阀很不相同的世界。此外，在工业部门的背后存在着农业部门。工业部门通过把农业部门作为劳工供应来源而获得了发展。工业发展了，农业却收缩了，至少从相对的观点来看是如

此。1904年，日本64%的家庭都从事农业，但20年后（1925年），这个数字降低到49%。在农业部门内，自耕农的百分比下降了，租佃农和拥有租佃农的农民比例却随之上升了。处于自耕农边缘的人成了租佃农，而没有能力从事租佃耕种的人则移居到城市当了工人。这样，工业就在损害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大企业在工业中的相应比重越来越大。以这种结构创造出能与西方主要国家相匹敌的军事力量（在战前）和大公司（主要是在战后），一直是日本人的抱负和成就。他们的近代部门的产品，即使是非商品的“零式”战斗机或巨大的“大和”号战列舰，都使得日本人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意味着武装力量和大企业部门有能力与西方竞争，并且正是因为这样，群众才心甘情愿地受这两类部门的剥削，并赞助它们的发展。

3

在明治政府专心致力于建设一个近代国家的时候，它认识到有能力管理近代企业的企业家实在太少了，也认识到低级雇员和技术工人的数量也不

够。我们已经提到，废藩的结果是那些失业的武士变成了这种雇员。在需要女工的地方，主要是从下级武士家的女儿们中间雇佣。因此，明治早期的政府企业中，不仅资本由国家提供，雇员也大都是武士。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国家从事的生产。许多由国家经营的企业后来变成了某个财阀的母公司，或者接纳某个财阀的企业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那些渴望促进新日本的建设的人集合在财阀的阵营中；而另一个传统的阵营中则汇集了封建时代的农民、工匠和商人阶级。相对说来，以前的武士和他们的女儿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并且自恃甚高。

然而，守纪律、有技术的工人在当时是一种极其稀有的商品。近代企业的经理人员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他们的企业如何获得这种工人；（2）一旦他们找到了这种工人，如何使他们为自己的企业工作较长的时间而不失去他们。对于政府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生产大量的这类劳动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一开始政府就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建立一种教育制度的工作上。

由于1872年颁布了“学制令”（教育法），政府提供了一种近代学校制度。这个法令把国家大略

划分为五万个初等学校区，每个区六百人建立一个初级学校，以此来推行全国性的强制教育。此外，这些初级学校不论学生的地位、出身或性别如何，一律平等。1873年，总学龄人口中只有28%的人上了初等学校；但到了1882年，这个数字达到50%；1885年达到67%；到1904年，它已达到98%。这些数字显示了强迫教育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普及，说明人民强烈地支持政府关于建设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计划。然而，这种教育要想在极短时期内产生效果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明治时代，技术工人和受过教育的工人总的来看，数量很不充足。

直到明治中期以前，私人企业一直通过传统的方法来补充劳工。工头手中掌握着大量工人，数量达到几百。企业把全部工作以合同形式承包给工头，付给他一笔总的款子，工作的分派和工资的支付都委托给工头。为工头工作的工人是从农村的穷人家庭中招集来的，由于这些工人的技术水平很低，使得企业处于一种缺乏技术工人的困境。结果，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一个公司经常去"偷挖"别的公司的劳动力。因此，各企业都强调一种"忠于公司的精神"，以保证在长时期有"固定的雇员。"1882年和1890年，天皇分别颁布《军人

敕谕》和《教育敕语》，儒教的道德（首先是忠于国家）被政府强加给了人民。因此，“忠于公司的精神”就像与此相类似的东西一样，是很容易构想出来的。作为强制性教育的一个结果，不仅武士，而且包括全体居民都接受了儒教的教育。但即便如此，忠诚精神仍然很少见，为了促使这种精神出现，公司不得不付出一笔特别的款项。于是，资历工资的结构便被引入日本社会。

资历工资制开始于大公司的白领工人，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大公司具有一种能够要求公司雇员忠于自己的高贵外表，而白领工人则是新的武士。当然，日本具有很强的封建社会遗风，忠于企业主的精神也存在于中、小企业的雇员之中。但是，由于中、小企业主不具有收买忠诚精神的财力，因此，资历工资制和终身雇用制并未引入这类企业。在大企业中，公司通过资历工资制来购买忠诚。作为回报，它们要求雇员终身为公司工作。当一个雇员在没有获得雇主的完全同意的情况下离开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去，他将被看作是“在不和睦的背景下”离开公司的人，并会被打上“叛徒”的烙印。其他大公司也不愿给这类“叛徒”以工作，因为如果它们为这类人提供了工作而破坏了秩序，就会在

大公司之间引起一场相互竭力偷挖对方工人的全面战争。

因此，所谓的“叛徒”别无他择，只有到中、小企业中去寻求就业。对他们来说，在辉煌的大企业中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些企业生产着近代的商品，并与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争夺着优势，它们处在为国家而奋斗的日本工业的代表行列之中。在它们的身上，寄托着日本人民的全部希望。因此，出现“叛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大多数人一旦被大企业雇用，尽管有一些不满意的因素，但在有生之年也紧紧地抓住这个企业不放。中、小企业的劳动力市场永远是开放的，但是，进入大企业的机会在从学校或学院毕业以后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企业的雇员——日本工业界的精英，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选择就业的自由。就像他们的父辈过去为藩主（大名）工作一样，他们现在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新的藩主——企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欧洲各国把自己的精力耗费于相互屠杀之时，日本的经济侵入了中国和其他市场，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从这时起，如何保证技术工人的供应就成了大企业的主要问题。过去

仅适用于白领工人的终身雇佣制和资历工资制开始扩大到蓝领工人身上。然而，资历工资制是一种不经济的工资制度，高工资付给了年老的雇员，仅仅因为他年老；这使得用在工资上的开支很不必要地增大了。为了弥补这项支出，起点工资不得不被降低，但如果企业这样做，就会把年轻人驱赶到其他公司而失去他们。因此，在基础薪金上它们也不能作大幅度削减。但是，如果它们从一个很高的起点薪金开始，那么就必须在老年雇员对生产的贡献之外再付给他一份工资。

为了消除资历工资制的这种缺欠，企业被迫加强了在工厂中的培训，实行这种在职培训能够使得雇员的技艺和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儒教的社会中，人们认为老年人应该受到尊重，反过来人们也认为老年人有义务去获得值得人们尊重的品德。对于工人来说，基本的品德就是要通过在职培训来获得技术。此外，如果企业打算使用老年工人，那么，必须是在非体力劳动的范围之内使用他们。因此，在终身雇佣制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劳动定额是结束于非体力劳动和中、低级的管理之中的。在企业内部，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之间相互流动得很厉害。在

这种形势下，工人失去了任何更深的特定职业的意识，相反，成为一个特定公司的成员的意识却越来越强。

工人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耗费在一个公司中，工人的安排完全由公司的命令来决定，这种制度意味着工人把全部生命献给了公司，而不是把全部生命献给了他们的职业（工作）。由于工人们在世时不得不经历自己并未选择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因此，他们对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忠诚的感情，而对公司的忠诚的感情却要强烈得多。劳工运动很微弱。（甚至战后时期建立的工会中，大多数不是在行业基础上组织的工会，而是建立在公司基础上的雇员工会。）此外，经理部门在处理与老工人的关系时特别擅长，它们通过这种关系成功地增强了劳动大军的纪律。工人很少争吵，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的”、“家族的”、“同事的”气氛弥漫于公司之中。

由于雇员是根据公司的命令来变换工作的，因此，这种改变劳动力分派所必需的教育和训练主要是在公司内部施行的，而所有必要的开支自然就由公司来承担。一些大公司甚至开始拥有自己的学校，专门用它来培训自己的工人。从二十世纪初开

始，三菱造船公司和三井矿业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就建立了自己的职业学校，到大约1920年，一种大公司内部的教育和训练制度实际上形成了。

当然，在这些大公司之外，还存在着集中于职业教育的正规中学，如商业学校、工业学校和农业学校等等。但是，在1868年至1945年这个阶段中，毕业于这类学校的学生人数是很少的。大多数工人不得不在离开了小学之后，未经职业教育就立即开始在工厂工作。在中、小企业中，不存在这种制度化了的培训，那里的工人不得不通过学习老工人的榜样来获得技艺。然而，大企业即使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培训学校，也或多或少是在一种制度化的形式下进行着技术教育。结果，即使在使用同样技术的地方，大企业也比中、小企业掌握得更熟练，因而它的生产能力也就更高。这样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就出现了差距，反过来，这种差距又产生了工资上的级差。

为了勾画出这种运动的轮廓，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数字的证据。从表2A中，我们能够看到大、小企业间的工资级差1914年时比1909年时要大，不过，在这些年间，工资差距并不很大。事实上，如果我们所说的大企业是指拥有一千以上雇员的大厂，那

表2A　工资差别

（一千人以上的大厂工人平均工资为100）

工厂规模	1909年			1914年			英国1949年
（工人人数）	男工	女工	总共	男工	女工	总共	总共
5—9	80.0	75.7	99.6	72.7	72.3	91.8	—
10—29	85.8	78.6	96.7	77.1	75.2	85.9	84
30—49	88.9	85.5	92.1	78.8	81.0	80.2	83
50—99	91.9	93.2	94.1	82.6	87.4	81.9	84
100—199	94.1	94.4	96.6	85.4	89.7	83.1	86
500—999	92.2	103.2	98.6	87.6	100.9	91.2	89
10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农业和通产大臣书记处档案：1909年和1914年工厂统计表。英国的数字是来源于S.布罗德布里奇：《日本工业中的双重性》（1966年）第51页。

么，各种规模的企业中的工资水平则表现出“大企业”工资水平的百分比在1909年至1914年这个时期是很高的。这些年中的工资差别与1949年英国的工资相比，也并不很大。然而，表2B中显示出，到1932年时，工资差别已经相当可观了，虽然我们必须指出，表2A中的企业规模是以雇员人数多少来衡量的，而表2B中则是以资本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企业规模的，以便我们能够仔细地对这两个图表作比较。1932年，最小企业的工资数字没有超过最大企

业工资数字的26%。这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工资差别是从1920年前后开始的。截止到日本被强行拖入战争以前，这种差别越来越大。到混乱结束的战后阶段，这种大差别的工资又重新风行起来。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所要见到的那样，在1963年至

表2B　1932年的工资差别

（五百万日元以上的工厂工人平均工资为100）

		工资差别
工厂规模（资本数量单位：千日元）	0—1	25.9
	1—5	30.1
	5—10	33.2
	10—20	33.3
	20—50	45.3
	50—100	54.1
	100—500	67.5
	500—1000	78.1
	1000—5000	84.4
	5000—	100

资料来源：安岛编：《近代日本经济史概览》（东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19页。

1973年经济迅速增长、可得到的劳工不足时，中、小企业提供了高工资来吸引劳工。结果，工资差距被极大地缩小了。但是迄今为止，一个相当大的差距仍然存在着。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别在私人企业中以这样的方式扩大了，但是在此之前，一个相当大的工资差别已经存在于官营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1909年，一千雇员以上的私人企业中男工的工资仅达到所有私人企业中男工平均工资的1.13，而官营企业中男工的工资则达到这个同样的平均数的1.43。女工工资的这两个相应数字分别是1.10和1.22，这说明官营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对女工和男工来说是不一样大的。不过，这种差距当时正在迅速缩小，到1914年，官营企业中技工（不论男女）的工资，都低于有一千工人以上的大私人企业。在日本，官营企业本来就是以高工资开始的，但没有赚到任何利润，因此，政府就把它们卖掉了。在剩下来的官营企业中，工资仍就保持着过高的水平，但这种高工资没有带来相应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这些高工资是出于非经济考虑的结果，这些考虑包括许多技工是旧的武士阶级的成员这一事实，以及要显示政府尊严的

意图等等。这种工资差别消失后不久，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别又开始出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要求工人忠于自己，并支付高工资作为回报的首先是政府，然后才是私人企业。

大、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别发展为日本经济的一种慢性病。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想进入大企业，中、小企业不得不拣那些剩下来的人。这样大企业就能够招收到那些在进入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杰出的工人。这就使得已经存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扩大了。当工资比率的差距变得更大时，利润上的差距也增加了，因此大企业能够以比中、小企业更快的速度积累资本。大企业有足够的资本来采纳最好的技术，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的差距使得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增加了，从而也扩大了工资上的差距。这样，恶性循环便形成了，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工资上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表3显示了1929年至1942年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上的变化，企业的规模是以其雇员的数量来衡量的。由于三十年代的萧条首先袭击了小企业（1930年），后来才影响了大企业（1931年），并且是大企业首先复苏（1932年），因此，1929年至1932年间

表3　劳动生产率的差别

（千人以上的工厂中人均总产值为100）

工厂规模（工人人数）	5—9	10—29	30—49	50—99	100—499	500—999	1000—
1929	75	84	95	109	124	104	100
1930	63	71	82	91	95	100	100
1931	74	86	97	101	107	109	100
1932	65	75	87	95	102	105	100
1933	46	56	70	75	86	88	100
1934	42	51	62	66	81	82	100
1935	41	51	61	65	82	89	100
1936	43	48	62	70	85	91	100
1937	45	54	66	74	90	96	100
1938	49	59	63	80	90	91	100
1939	48	58	71	83	90	87	100
1940	60	69	85	92	98	96	100
1941	61	69	81	94	106	92	100
1942	69	79	91	99	102	114	100

资料来源：通产大臣书记处，研究和统计科：《五十年制造工厂统计史(1909—58)》1962年。

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有些变化的。1933年，这个差别增大了很多，只是在1940年准战时经济结构的年代当中，这个相当大的差别才缩小了。从1940年起，强迫企业联合的效果变得明显起来，人们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明显缩小；但是，由于这是

价格控制的时代，以官方价格来衡量的每个工人的生产水平是否真的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真实水平还很难说。

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不仅引起了相应的巨大的工资差别，它也造成了工人所享受的福利和保健待遇上的巨大差别。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些受雇于大企业的人成了工人贵族，成了劳动力当中的“武士”。大企业不仅在企业内部提供了技术训练，而且还把这种努力扩展到性格训练、文化教育和领导品质等方面。结果，文学俱乐部、体育运动俱乐部、茶道和插花俱乐部等其他类似的设施都在企业内建立起来，这种企业变成了类似学校的某种东西，在战后阶段尤其如此。此外，雇员能够把他们节余的钱存在企业中，并能获得比银行所支付的更高的利息。这不仅鼓励了工人们节俭，而且也给公司（大企业）提供了额外的资本来源。相互援助协会和合作协会也在公司中建立起来，并由公司指导。当公司庆祝自己成立周年的时候，还要举办运动会和旅游。所有这些事情都增强了工人与企业联合为一体的感情，并且有助于工人们支持终身雇佣制。

这种公司完全不同于英国类型的企业，在英国的企业中，公司和雇员的关系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技术为特征的，然后公司购买这种与其他生产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来生产产品，接着公司便出售这些产品。在英国，如果一个工人认为他把自己的技术出售给另一个公司更有利，他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公司；而公司对某个工人的技术不满意时，它就可以解雇这个工人。当一个工人认为获得其他的技术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收入并使他得到更大的工作上的满足时，他可以自己去学习，以获得其他的职业；一个工人也可以第二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买主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在日本，不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工人来说，雇佣就像结婚一样，是一种终身承担的义务。在估价一个人是否适宜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性格、忠诚感和从长远看他对公司可能作出的贡献的潜在能力，远比他当前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重要得多。就像收养一个养子一样，在雇佣某人成为公司雇员的时候，要仔细考虑他可能对公司

造成的损害和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出现有这样一些趋向，如：新的公司雇员被限制在那些有个人关系的人中间，或者仅仅是那些来自特殊领域的人被雇佣。

公司是家族式的，在雇员中间、在雇员与经理人员之间，流行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团结感情。事实上，公司成了一个大家庭。我们已经看到，公司把一个工人的继续雇佣看得要比他在短期内生产上的贡献重要得多。由于这种持续雇佣的观点，公司提供给雇员的报酬就随着服务年限的增长而增加。工人也不像过去那样把他们的努力浪费在短期的拼命上面，而是要保持旺盛的精力，以便尽最大努力在长时期内为公司作出贡献。打个比喻，在短跑中，运动员关心的是超过那些跑在他前面的人；而在长跑中，他关心的是不要落在别人的后面。帮助一个在短跑中步履蹒跚的运动员意味着自己掉队，但是在长跑中，一个参加竞争的运动员对另一个运动员伸出援助之手却很容易。在公司中，援助同事有助于提高对援助者的评价，因此也就增加了他的长期价值。在长期的竞争中，一个人的对手同时也就是他的战友，因此他有责任援助自己的战友。当一个公司整个被看作是一个队，并面对着其

他公司共同作为一个实体来竞争的时候，这一点变得特别清楚。

战前日本所持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那种集体斗争的地方。这种观点是德川时代日本武士已逐渐习惯了的看法。日本公司内部的经济竞争显然不很激烈，由于强调长期的合作，在个人之间很少有竞争。一旦进入公司的决定被批准，雇员就象是乘上了资历制的自动电梯。因此，人们可以把它称作是“单调乏味”的社会。不过，正如一个工程公司也许比一个建筑公司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一样，人们可能会说，日本的公司不是通过劳动力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通过雇员的相互合作、援助和鼓励而保持了极高的生产效率的。其实，受雇于一个日本的公司过去是，现在也许仍然是如此：与其说它像受雇于英国的公司，不如说它更像受雇于警察和军队。

当雇员认为自己对公司表示了特殊的忠诚的时候，他就感受到很大的工作上的满足。如果他超过正常工时仍在工作，他会得到更大的工作上的满足。由于在超时工作中经理人员经常不在，超时工作可以被看成是什么自愿的俱乐部的活动。同事

间完全不再是竞争对手，他们成了同学或战友。这种家庭式的商号在英国和美国也曾有过几个，但都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且从来也没有成为规范的东西。然而在日本，这种制度不仅要求工人按照规定劳作，而且还要求工人把他的全部工作时间贡献给公司。例如，假定公司计划在周末举行一个雇员的运动会，每一个人是否参加应该由他自由选择。在英国，许多雇员将不愿意在周末或平时被拴在公司里，他们就不会参加，这将使公司举办一次成功的运动会的企图受挫，也许干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在日本，一个工人参加这种运动会将证明自己是（同时也被公司看作是）关心公司的忠诚工人，因此，是否参加运动会就不再是每个雇员自由决定的事情了。这样，一个雇员的生活甚至在工作时间之外，也和公司连在一起了。

在一个儒教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努力证明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忠诚。他的忠诚的程度是以他准备为这个社会作出牺牲的程度来衡量的。因此，如果他参加了这个运动会，而放弃了已经筹划好了的与自己的家人共享周末的计划，那么这将被看作是他忠于公司的感情的一个确凿的证明。即使公司告诉雇员们，是否参加运动会要由每

个人自己决定，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表面上公司说这是由自己选择的事情，但实际上，任何忠诚的工人都会考虑到经理特别希望举办一个成功的运动会来显示公司的团结。一旦某个工人掌握了公司的真正意图，并且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一边而去参加运动会，那么他就是一个“有道德的”雇员。公司会高度评价他的忠诚的服务而忠诚的雇员在将来会得到好的职位，或者得到很高的奖金。在一个儒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献身于工作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利上讲都是最重要的美德。因此，当大多数人参加了运动会的时候，少数“自由行动者”就会被其他人看作是扰乱社会“和谐”的人而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自由经常被看作是背叛或是对社会、对多数人的挑战，任何敢于维护自己自由的人也许会成为彻底孤立的人。

因此，在这种社会中，不可能有什么西方观念中的劳工合同的概念。劳工不被看作是一种高级商品。忠诚的精神得到珍视。“忠诚”市场在每个人从学校或学院毕业后的一生中，只对他开放一次。正是在这个市场中，那些能够提供忠诚的人遇到了那些正在寻求忠诚的人，即他们的“主人”。明治维新以前，在哪个主人家中帮佣是由出身来决定的，

明治维新以来，一个人可以选择了。但是，自由进出这种忠诚感情的市场以及几易其主，都是与忠诚精神的任何定义完全矛盾的，除非这里面有特殊的原因。一个运气不佳而对自己的第一个主人不满意的“武士”必须作为一个无主人的武士到一种唯利是图的市场上寻找新的主人。这样，劳动并不仅仅被看作是劳动，而且被看作是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一种行动。在这种儒教的社会中，劳动力市场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了一种双重成分的市场。这就是说，忠诚市场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如果在这里决定的终身雇佣由于某种原因后来在灾难中结束，那么一个工人别无他择，只有到第二个市场，也就是唯利是图的市场上去寻找新的雇主。在第二个市场上所决定的工资相应来说要比在第一个市场上大企业中的工资低。

由于大企业在第一个市场上招收到的只是忠诚的工人，因此在它的正常的雇员中实际上不存在“唯利是图”的工人。（不过，临时工当然是唯利是图的。）相反，中、小企业则雇用了大量的“唯利是图”的工人。甚至它们在第一个市场上雇用的那些接受工资的雇员，也丝毫没有脱离纯粹图利的工资的范围，他们没有感到任何压力来要他们以特

别积极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们如果到以纯粹的唯利是图为基础的市场上去，他们能够找到以相同的工资雇用他们的另一个雇主。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工资差别造成了它们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也造成了道德和思想上的差距。

德川时期，存在着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四个阶级。武士阶级道德大不同于农民、工匠和商人阶级的道德。这也影响到他们对于忠诚服务的概念，忠诚服务是对武士的要求，而不是对其它三个阶级的要求。武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却不能为了自己的享乐而工作；农民、工匠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却被允许根据利润的支配去工作。实际上，这两个集团是由完全不同的两种道德标准来指导的。同样，大企业一直是由完全不同于中、小企业中的道德标准来指导的。如果一个大企业的雇员怀着仍然得到较高工资的希望想要到另一个大企业去，那么这说明他缺乏大企业的雇员所应有的忠诚服务的思想了。这是一种雇员签发自己的死亡批准书式的行动。但是，中、小企业的低工资则意味着工人可以自由地从一个企业移到另一个企业。集中在大企业里的杰出的工人被要求献身于自己公司

的利益；而小企业的工人，虽然工资低一些，却能够享受到个人的自由。

这样，一种类似于德川时代形成的那种双重结构，甚至在明治维新后，也仍然继续存在于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中，也存在于相应的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中。在德川时代，一个人属于统治集团还是被统治集团的问题，是由出身来决定的。明治维新以来，这个问题则改由公开的入厂考试来决定，这种考试对每一个从学校或学院毕业的人来说，一生只有一次。从这种意义上讲，明治后的日本变成了一个人人相互竞争的社会，但也仅仅是在这种时候，个人竞争才会出现。而当一个工人一旦进入了某家大企业，他就会通过资历工资制的级别升迁。这样，至少从表面看来，公司的雇员之间就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了。在中、小企业中，真才实学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毕竟是人们称之为“楼下”的企业，即使有人被证明是出类拔萃的，从“楼上”的企业的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大的成功。

这样，个人之间的竞争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不同公司的雇员集团之间的竞争却很激烈。作为一个领导，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能够把公司里的同事

团结在一起，领导他们去赢得公司之间的竞争，以提高他的公司在大企业当中的地位，或者使他的公司从“中、小企业”的地位晋升到“大企业”的地位。在西方社会里，竞争一直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为了进入某个公司，个人被迫去竞争，那些不合格的人将会被公司拒绝接纳。反过来，公司也必须为了获得合适的人而竞争，坏的公司的雇员们会遗弃它而到其他公司去。这种竞争在日本并未实行。在日本，一个公司的雇员们组成为一个队，它就象一个统一体那样行动，以便与另外一个公司所建立的队竞争。之后，获胜的公司把所得到的利润以奖金的形式（多少是根据资历制的原则）分配给这个队的所有成员。

这种以队为基础而进行的竞争可能会给某些不幸的人带来悲剧。有时某个人可能有能力，但由于不能胜任的同事而不幸失败，这样他别无其他选择，只能顺从于一种毫无前途的生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要转到一个较强的队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这种转移也会被看作是一种不忠的行动。除非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没有任何别的公司愿意接纳这样一个“叛徒”。

这种对自由转移的限制等于是对自由选择社团

的限制。任何自由社会必须保证某些自由，例如选择商品的自由；思维和表达的自由以及家教的自由。然而，在所有这些自由中最重要的是选择社团的自由。事实上，在没有选择社团的自由的地方很可能也就没有思维、表达和宗教的自由。在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内部，存在着各种集团（社团），一个人的生活模式就是由他对这些社团的选择所决定的。一个选择了公司A、业余俱乐部B和夜校C的人的生活，是不同于选择了公司A'、业余俱乐部B'和夜校C'的人的生活的。但是在日本，甚至在今天，一个人在一生中也只能选择一个公司（假定它是一个大公司），他所从属的业余俱乐部也将是由这个公司组织的，学校也同样如此。公司不仅是一个赢利的组织，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并且经常是所谓包揽一切的，以致公司雇员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能够在公司的组织内进行。由于公司如此之巨大，以致它可以吞下自己的雇员的全部生活；由于个人不能改变他的公司，他便没有了建筑自己生活的自由。因此，就像士兵一样，同一个公司的雇员都是同样类型的。

1932年，在纪念松下电器公司成立15周年的大会上，雇员代表在回答该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的

一个讲演时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比今天在这里出席公司成立周年纪念大会更感到高兴了。我认为我们雇员必须承认自己的耻辱：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胜任，使得我们今天不能报答我们的董事长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亲切教导。不过，今天他在讲演中赞扬了我们，这个讲演尤如从懒情中唤醒我们的警钟。我们保证把它的含义牢记在心，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公司——松下电器的使命，并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努力履行我们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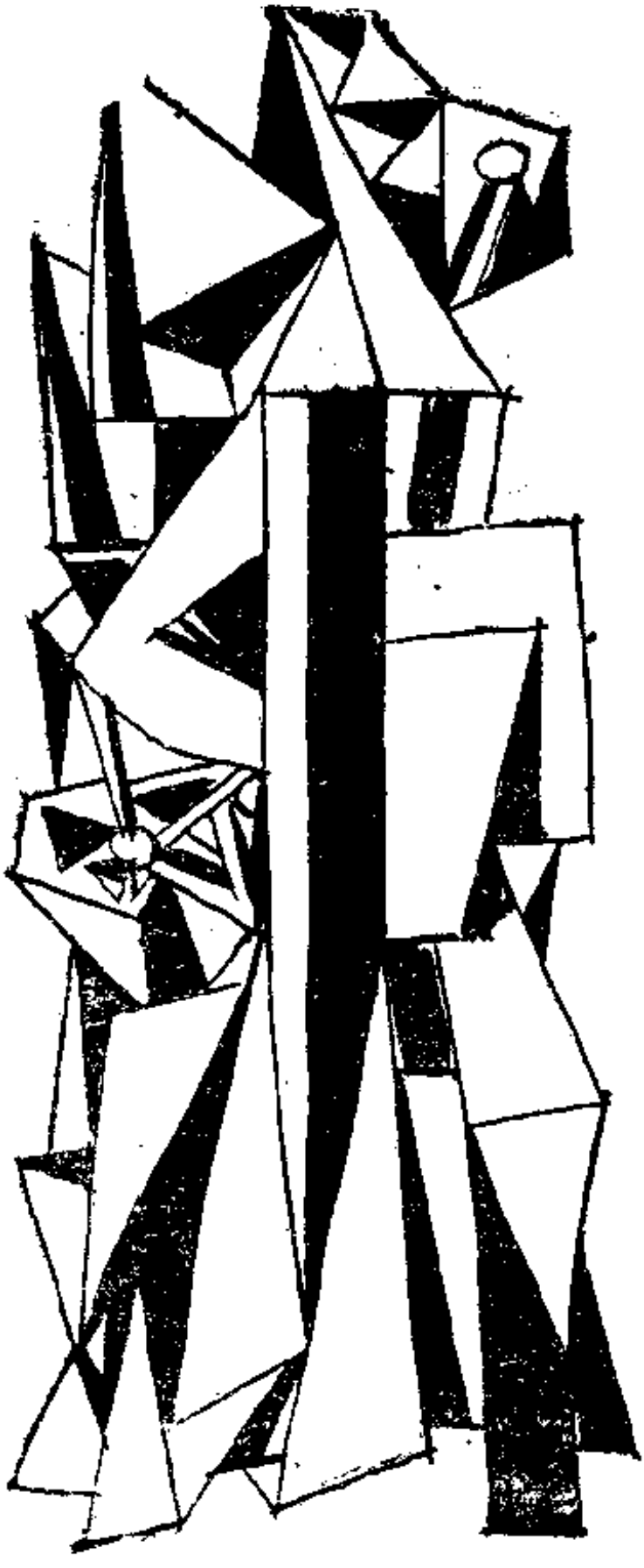
显然，这些雇员们所保证的是要在松下公司内生活和死亡。对他们来说，不存在维护自己的调换工作的自由的问题。雇员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及把公司看作是他们将要在那儿殉职的地方的精神状态，甚至在战后时期仍然流行于日本的各大公司，尽管没有达到战前松下公司那样极端的水平。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在日本建立的儒教并不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把仁慈作为最高美德，它把主要的基点建立在忠诚与和谐的概念之上。圣德太子统治时，重点放在和谐上；而明治天皇统治时，则强调忠诚和孝顺。在当时的所有天皇敕令中，1882年的《军人敕谕》和1890年的《教育敕语》是最有影响

的。由于后者在学校中就像圣经一样被反复诵读，它可以被看作是日本流传最广的儒教圣典。这个敕令命令它的读者去“追求学问、修习艺术，由此而发展知识才能、完善道德力量”，但是，培养这种知识才能的目的是要人们在回家遇到意外事件时出力。它写道：“如遇危急，要敢于挺身为国，以此保卫和维护我们与天地同在的皇权的昌盛。”这种对忠诚的强调意味着从公司内部来看，忠于公司的首脑是完全适宜的。尽管公司相互间可能竞争，但公司本身却被要求声明效忠于国家。结果，这使得在竞争的名义下绝对追求利润成为不可能，说到底，它们不得不限制对利润的追求，以便把对利润和国家的考虑统一起来。

大公司作为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国家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能与西方竞争的强国），意味着它们必须要比任何其他的公司更多地考虑这种国家的目标，更多地把政府的观点牢记在心，并且永远支持政府。根据这个条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大约50年的时间里，一直努力作为统一的国家去建立近代国家。日本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当然更不必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中作为世界五强之一的那种并非梦想的成功，使得日本人欣喜

若狂。从这些成功中人们所产生的自负引起了一种不和谐的形势，也带来了一部分排外派的复兴。这些人曾说过："现在我们被迫开国，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自己的国家建设到强大得足以驱逐外夷的程度。"为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日本政府于1917年公布了它的强有力的国防新计划草案，"关于建立25个师团和8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的海军舰队的建议"，但由于1922年华盛顿海军协定的缔结，它们不得不放弃了"8—8舰队"的计划。日本人把这看作是美、英为了抑制他们而采取的行动。在全体日本人之中，产生了一种向右摆的趋势，人们增加了对美、英的仇恨。与此同时，工业界和财政界也被迫使自己遵守国家的新要求，去适应公众舆论的新趋势。



第四章

日本帝国（之二）

1

在小说《心》中，夏目漱石写道，“当时，明治天皇在盛夏里去世了。我仿佛感到，明治时代的精神开始于这位天皇，也结束于这位天皇。我心中充满了这样的感情：我和其他出生于明治时代的人如今存活下来完全是一种时代的错误。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我的夫人，她听后哈哈大笑，很不以为然。接着她以诙谐的口吻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理解的话：‘那么，你应该把自己作为祭品，跟随天皇一起走入他的坟墓’。”在紧接着明治时代的大正时代（1912年至1926年）前半期，明治时代的某些势头还保留着，但在大正时代后半期，贫富之间的鸿沟加深了。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右翼分子则认为，这是由于天皇被那些狡诈而邪恶的政治家包围了的结果。他们想要进行

一场宫廷革命，然后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天皇统治着国家，所有国民在他的面前一律平等（“一君万民”的概念）。另一方面，军国主义分子的专制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在德川时代，任何一个农民或商人对武士阶级中的成员有粗鲁的行为，都会受到惩戒，甚至可能被该武士所杀。军国主义分子开始对政府和普通民众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的格言是尚武精神。

明治政权并未给人民带来平等，但人们确实体验到了一种在这个政权下取得统一的感情。那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他是大学毕业生，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女儿和他结婚。”当时，在同一个企业中，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政府的高级官员和财阀的薪金格外的高。工人工资水平差距最大的年份是1909年，当时政府经营的工厂中男性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一千雇员以上的大制造企业中男性工人平均工资的1.27倍。但是在日本，从传统上看，政府总是被置于人民之上（此外，明治维新中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又加强和巩固了明治政府），因此，尽管政府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在工资、薪金上存在的差距可能引起嫉妒，但人们仍把它作为一种完全自然的差距来接受。

当时，普通人之间收入上的差距并不很大。在总的劳动力市场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尚未分开。由于工人也是通过包工头被雇用到大企业中去，因此，以企业规模为基础的工资差距并不像后来（如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那样大。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全部制造工业，那么，1909年，5至9名雇员的企业的工资不超过千人以上企业工资的80%（这个数字是男工工资数，女工工资差距为76%）。1914年，这个数字分别为73%（男工）和72%（女工）。然而在这些年中，大多数男工（1909年为90%，1914年为85%）是在中、小企业中工作，少数人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工作。因此，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工作的男工可以被看作是例外。如果我们以500—999雇员的工厂的工资水平作为100，重新计算一下表2A中工资差距的指数，那么，结果就成了表4，很清楚，在那些年间，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中男工的工资实际上不存在差距。

与此相反，大多数女工（1909年为74%，1914年为79%）是在30个雇员以上的工厂中工作。如果我们考虑到，1909年30—40个雇员的企业中女工的工资是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女工工资的86%、1914年是81%的话，那么，我们必然要得出结论说，在

表 4　男工的工资差距

（500—999人的工厂中工人平均工资为100）

工厂规模	1909	1914
5—9	87	83
10—29	92	88
30—49	96	90
50—99	100	94
100—499	102	97
500—999	100	100

资料来源：《工厂统计表》

那些年间，女工的工资实际上也没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男工和女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却相当大。女工的工资大约只有男工工资的一半，而且女工的生活也很悲惨。但是，在日本，妇女当时既没有选举权，又没有被选举权，维护男子支配女子的儒教道德很盛行，因此，由性别而引起的工资差距还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工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在1914年8月，即紧接着6月末战争爆发后，日本就参加了战争并成功地消除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影响。由于欧洲成了主要战场，欧洲对亚洲的出口停止了，日本和美国开始共同垄断东方市场。日本商品成功地侵入了亚洲的所有地

区。不仅如此，由于日本丧失了在此以前一直由德国进口的麻醉药品、化肥和染料的供应来源，日本自身的化学工业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精纺工业中雇用的工人数量在1914年至1919年间增加了65%，日本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工业国。

此外，在这些年间，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只要考察一下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14年，精纺工业工人占了日本全部雇员人数的74%，而重、化工业（机械、机床、金属和化学）只占不到20%。到1919年，重、化工业成功地使50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精纺工业人数降低到日本雇员总数的65%，而使自己的人数上升到31%。

精纺工业主要是妇女们的工业，而重、化工业则是男人的天地。1914年，制造工业中的女工人数是男工人数的1.5倍强；但到了1919年，男女工人的人数大致相等。由于正是在大企业中，转入重、化工业的势头最强，因此，这些企业也就成了男子的天下。这些企业并不希望女工被长期雇用，但却期望男工终生工作在这里。特别是在日本工业迅速扩张和劳工供应不足的时候，企业一旦雇用了一个男工，就不希望放弃他，当然，除非他在这方面或

那方面有特别的缺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企业逐渐地开始要求工人具备忠诚的感情。除了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之外，还像以前一样，存在着一个“第一等级”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在终生必须忠诚上的默契。正是在这里，大企业雇用到了刚从学校或学院毕业的学生。每年，只有这些当年毕业的学生可以出现在这种市场上。而关于接受低工资工作的交易只能在任何人都能进入的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这种市场我在前面称之为“唯利是图”的劳动力市场。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种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成为日本经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

这样，日本经济的这种双重结构就与在制造工业中不断增长的男子的统治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也和向重、化工业的转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向重、化工业的转移不断地遭遇到不幸，这些不幸包括华盛顿会议所带来的海军军备的限制（1922年）、东京大地震（1923年）、大地震后政府为重建而发行的公债被滥用所引起的1927年财政危机、以及193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结果，这些工业在二十年代发展得很缓慢。但是，日本在1931年发动了“满洲事变”，第二年宣布“满洲

国”独立并在那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使得日本从大危机中复苏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业国都迅速。在接下来的1933年至1942年的十年间，重、化工业的发展达到了非凡的速度。

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并行的。日本驻“满洲里”的军队——关东军计划操纵中国北部军事集团的首脑张作霖，以保证“满洲”对中国大陆其余部份的独立。然而，张作霖被证明是不愿意顺从关东军意志的。于是，在张作霖1928年从北京返回沈阳时，关东军炸毁了他的火车，暗杀了他。这个所谓的“满洲里的一个严重事件”被证明是一系列事件中的转折点。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1931年满洲事件的爆发，导致了军部于第二年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傀儡国——“满洲国”。1933年，日本和中国达成停火协议，和平暂时恢复了。中国人被迫承认了强加于他们的既成事实。日本为了建起“满洲国”，尽了很大的努力，然而，正如所料，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尽管蒋介石有一段时间曾号召中日合作，但抵制日货和反日运动却遍及全中国。最后，1937年，关东军驻北京附近的部队在演习时遭到中国部队的射击（这是作者根据日方材料对“七七事变”真象的歪

曲——译者），这个事件导致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九年，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完结。

表5　日本制造业中雇员的分布（%）

年代	1934				1942			
工业 / 企业规模（人数）	重化工业	纺织工业	其他制造业	总计	重化工业	纺织业	其他制造业	总计
小型（5—99）	25	40	35	100	44	21	35	100
中型(100—499)	25	60	15	100	61	27	13	100
大型(500以上)	30	67	3	100	88	10	2	100

资料来源：《五十年工业统计历史》，1962年。

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如果没有庞大而强盛的经济来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满洲事件开始时，受雇于制造业的中型（100—499个雇员）和大型（500雇员以上）企业的工人，只有25—30%是在重、化工业部门中工作，而60—67%则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显然，这样一种经济（见表5）是没有能力来支持这类战争的。在三井、三菱和住友这样一些老财阀试图促进重、化工业扩张的同时，军部和政府也对前面所提到的诸如日产这样一些新建的康采恩提供援助，帮助它们发展成为新财阀。

老财阀最初反对经济结构向准战时经济的方向转变。但是，1932年，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被所谓“血盟团”的成员（他们都是右翼思想家井上日昭的追随者）刺杀以后，这些老财阀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与准战时经济结构合作。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法律。其中包括1931年的《主要工业控制法》、1934年的《石油工业法》、1937年的三个战时控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关于进、出口的紧急规定》、《资本紧急筹集法》）和《工厂管理条例》、1938年的《全国总动员法》和《电力管理法》、1939年的控制物价等项目的条例。内阁于1939年和1940年分别通过了《增加生产力的计划草案》和《建立新的经济结构的草案》。此外，1940年还颁布了《工资控制条例》。这样，到1940年，政府和陆军完全掌握了日本的经济。与经济在这种形式下的“军国主义化”相并行的是，向重、化工业转移的推进速度相当惊人，目的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之内，即在1942年，使发展达到一种新的水平。这就是要求大型制造企业中88%的雇员（中型企业中61%的雇员）要在重、化工业部门中工作。在这种工业能力的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珍珠港发

动了决定性的进攻。

不过，人们也许不应该纯粹从表面价值上来评价这种工业化。他们确实成功地把劳动力集中于重、化工业部门了。1942年，大型制造企业全部产品的91%都是重、化工业产品。不过，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1940年至1942年间，当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结束时，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存在的生产能力上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见表3）。说明在这段时间内大企业的生产能力增长得不如小企业快，但要确定这种生产力发展明显缓慢到什么程度却极为困难，如果以价值来衡量，考虑到物价控制的影响，要想确定当时大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是否真的发展缓慢也是极为困难的。

此外，由日产公司带头，许多重、化工业企业已经把经营业务伸展到了“满州国”和中国，因此，日本有能力动员的工业力量，应该被认为是远比单独的日本的统计所显示的力量要大得多。以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为背景，当时的日本政府正在达到“富国强兵”这个明治维新的目标，但是当这个梦想终于将要变为现实的时候，日本的精力突然下降到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军部不再是富裕国家的强大捍卫者，经济为了要提供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不

得不完全牺牲自己。为了适应国家政策的需要而作的这种巨大的工业转变，这样一场强行军（就像日本过去所作的那样），对日本来说，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从这次重大的实验中，日本政府、工业家和工人都学到了如何实现工业转变的本领。战后时期日本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就在于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表现在能够迅速地适应外部条件的各种剧烈的变化，而这种适应能力也许就得之于三十年代军部所强加于它的“强行军”时期。

2

不仅是企业，而且军部也欢迎低工资。士兵能够忍受艰难困苦，军官能够表现出忠诚，这在军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品质。希特勒的思想基本上是嫁接在这同一观念之上的，他也认为，为了加强军队，必须保护农民。同样，日本的军队尽管其中有一些人（如参加1936年“二·二六”叛乱的年轻军官）对农村的贫困状况恶化感到忧虑重重，但总的看来，军人对农民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感到欢欣鼓舞，而把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视作懦弱的根

源。政府和军队都赞美清贫的美德。为了在战争期间抑制通货膨胀，工资受到控制，消费上的奢侈受到禁止。不仅如此，而且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被看作是一种令人生厌的作法，人们的双重方式（西方的和日本的）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停止了。整个生活变得极为单调。军部也鼓励企业使用资历制和终身雇佣制。一个工人必须拴在一个企业上并非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所绝对必要的条件，但它却是达到这个目标所极为需要的一个条件。结果，终身雇佣制也从适合于战争事务的计划生产的观点这个角度受到鼓励。此外，对终身竭诚服务于一个公司的这种愿望的培养、对为不得超越自己的年长者的习惯而建立的资历工资制的承认，可以被看作是对工人一旦参军后将要过的生活的演习和模拟。这种生活要求竭诚服务于他的国家，服从军官们的命令，以及尊敬老兵。

结果，在准战时制度下、在战争期间，日本雇佣制的精神气质和它的两根主要支柱——终身雇佣制和资历制，被广泛地反复贯输，雇佣制本身流传开来。当时，劳动力奇缺，雇员们从不知道他们何时会被征召入伍。所有的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一旦雇用了工人就不希望失去他们。由于劳动

力市场极为紧张，因此在一种纯粹的“唯利是图”的基础上运转是不可能的。许多中、小企业也采用了终身雇佣制、允许雇员在被军队征召期间离厂，但却等待着他归来。

前面我已经指出，统治大企业的道德标准与中、小企业中流行的道德标准是很不相同的，但这种基于企业规模的双重道德结构的距离在准战时经济时期和战争期间却缩小了。整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军国主义的道德标准不仅会在大企业中流行，而且也会在中、小企业中流行。此外，由于工资受到《工资控制条例》的管制，存在于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工资差距大概在当时会缩小的。不过，由于许多大企业成了军需工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因此它们也接受原料和食品的分配。结果，卷入军工生产的企业和参加民用产品生产的企业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由于工资控制的原因，在名义工资上的鸿沟并不那么大，但由于军需工业中的工人接收以超定量食品和其他类似利益的形式出现的、数量相当可观的小额优惠，因此，当时企业间的鸿沟基本上是一种军—民的差距，而不是一种以企业规模为基础的差距。

由于当时日本在世界上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以

外，几乎与所有的国家为敌，它不可能依赖外国技术来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因此，日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科学上的进步、在国内发展新的技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知识分子的维新运动，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政策，教育和科学知识的获得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在全国推行强制性教育、建立配备有几所帝国大学的较高级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移植到日本，这是明治政府文化政策的几个主要目标。

正如前面所说，在进口技术的过程中，政府仔细地考察了每一个国家，对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领域中最突出都作出估价，然后从它认为能够提供最好的东西的国家（仅仅从这个国家）吸收某一领域的知识。例如，我们看一下1871至1876年间在东京受雇于政府的外国人工作的部门，我们就会发现情况是这样的：在海军部（包括水运董事会和海军研究院），有87名英国人、1名美国人、2名荷兰人和1名葡萄牙人；在陆军部（包括陆军研究院和陆军预备学校），有46名法国人；在工程理事会（包括技术学院），有16名英国人，3名意大利人；在铁路理事会和电报理事会，有59名英国人；在建筑

理事会，有6名荷兰人；在医学院，有11名德国人；在开成学校（后来的东京大学，以后又重新组建为东京帝国大学，现在仍称东京大学），有5名英国人，6名美国人，4名德国人，5名法国人和1名中国人。

这说明明治政府引进文化并不是普遍地无计划地从所有国家平均地引进西方文化。被引进的文化是经过仔细地分析了它对经济和国防可能作出的贡献之后才确定的。这些被引进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成份融汇在一起，成为日本特有的一种西方文化。政府每年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去学习，以便获得西方文化的信息，以备将来之需。在中国，控制权一直紧紧地掌握在信奉官僚主义和从事农业的官员手中，而明治政府的核心则是由以前的武士阶级构成，他们尖锐地意识到了西方国家造成的军事威胁，因而，在日本就存在着一种想要学习和掌握能够给军事力量提供基础的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1880年，第一批大学生从东京大学毕业，他们之中有90%的人是学物理或化学的。从明治时代中期（1895年）起，学技术的学生达到了学生总数的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从其他国家的相互

撕杀中坐收渔利，在战后时期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最初，日本政治试图用适合于它的新地位的军事能力和教育来装备日本，但当1922年华盛顿条约对军备进行限制后，日本政府便把精力集中在教育制度的完善上面。1918年，日本仅有5所大学和104所高等学校和学院。但是，十年后的1928年，这些数字分别上升为40所大学和184所高等学校和学院，到194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8和342。1942年，东京帝国大学开办了致力于把科学应用于战争的第二工程学院。军部和政府都清楚地知道，他们陷入了一场总体战。在这种总体战中，科学和技术能力将起生死攸关的作用。在准战时阶段和战争时期，日本都怀有完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关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企图。随着战争的进展，学习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学生被征召入伍，而学习科学和技术的学生一直在学校坚持到最后。日本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能够制造“零式”战斗机、“大和”号战列舰（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以及在“满州里”运行的“亚洲”号高速列车的水平；然而，从数量上讲，它的技术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大学和学院扩大了科学和技术的系别，但这些系的毕业生毕业得太晚了，以致无法支援战争；

可是战后，这些毕业生却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886年至1945年的这60年中的前半段时间，日本不论是经过宣战还是不宣而战，参加过许多次战争，它的军事开支达到很高的比例是不足为奇的。在这60年间，平均每年的军费开支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在后30年中，这个数字超过了12%。此外，在仅仅是最后才使得重、化工业得以发展的这样一种工业力量的基础上，与美国、英联邦、荷兰和中国同时开战，这简直就是发疯。然而，直到最后黑暗的十年以前，在明治维新后五十年的时间里，“富国强兵”的政策一直是成功的。

确实，战争胜利的结果意味着获得广泛的赔偿、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或无数的新市场，这些都使得日本人把战争看成是一场有利可图的冒险。然而，鉴于大量的人在战争中牺牲，大量的钱在战争中耗费，这种战争贩子的组织机构仍能持续这样长的时期，这是极不寻常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人民（有产阶级、经理和工人）总是在心里容忍政府的计划，并表现出一种极为合作的态度，在老财阀和军部之间肯定有某些磨擦，与共产党联盟的工人也进行了反抗。后来也出现过黑市交

易，这是日本人民无声的反抗感情的一种表达。然而，企业装备起来了；一种有控制的经济获得了成功；资本以军部和政府所需要的方式进入了“满州”；人民屈服于思想控制了。最后，在1938年通过了《全国总动员法》，人民同意建立一个“法西斯”国家。社会民众党的西尾末广（战后他成为民主社会党的一个创建人）在国会众议院一次会议上为《全国总动员法》的批准所作的辩护发言中说，近卫首相“应该是一个像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那样的获得全面信任的领袖”。在“斯大林不应该是我们崇拜的英雄”的反对声中，西尾失去了国会议员的资格，但是，日本显然已经转变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

日本人发现，支持极权主义国家的思想是很容易接受的。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已经要求个人对大多数人要采取“和”的态度。昭和时代早期，以军部为中心的“多数派”已经建立起来，不过，其中也包括新官僚、新财阀和右翼知识分子，天皇被用来作为他们的象征。日本人对“多数人的意志”存在的地方以及它的趋向非常敏感，他们循遵保持和睦的原则，从而迎合了“法西斯分子”的愿望。此外，由于“法西斯分子”使天皇成了他们的

象征，任何日本人要详尽地表达不同的意见，需要表现出相当大的勇气。这是因为明治时代以后，通过强制教育的手段，人民被教导说最高的美德就是忠于天皇和孝敬父母。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表现出合适的忠诚，这将会使他的父母感到忧虑，结果这也就说明他缺乏孝顺。

直到极权主义带来自我毁灭的最后阶段，日本人民仍然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惊人的合作态度。从进攻珍珠港以后，到1945年8月投降的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日本的造船厂造出了15艘航空母舰、6艘巡洋舰、126艘潜艇、63艘驱逐舰、70艘运输舰、168艘护卫舰，加上其他舰只总数共达682艘军用舰船。此外，还建造了720艘货轮和271艘油轮。同期生产的军用飞机在6,000架左右。这种生产水平无法与同时期美国的成就相比较，但在当时，它却是一个只被美国一家超过的世界记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大量的飞机当然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它的工厂没有遭受轰炸的破坏，在获取原料方面也没有任何麻烦。

如果我们回顾了战时的这些成就，那么，日本战后在造船工业和汽车工业上所获得的成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这些工业不像纺织工业，它们

不能完全依赖女工；如果在制造业中没有一个向男性工人方向的转移，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制造工业明显地朝着使用男工的方向转移。1914年，男工在所有从事工业的体力劳动者中的比例占40%，192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9%。但后来男工的比例没有增加，到1932年时仍然是49%。不过，到1937年，它达到59%，1942年达到69%。此外，不仅男工的比例增长了，而且1942年男工的总数是1937年的3·2倍。

这样大量地吸收男工必然要使社会结构产生相当大的变化。由于当时大量的青年男子被征召入伍，要想找到农业或其他工业中的男子来增援已有的男工，就显得格外困难。在和平时期，如果没有极高工资的引诱，男工不可能被吸引，但支付这种高工资就意味着经营亏损。因此，在和平时期，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也许会很缓慢。用战争的名义把男工强行集中起来，不论他们是否愿意，都要强迫他们学习技术，这是使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成为可能的关键。军部和政府对人民的要求是苛刻的，而且牺牲和损害是巨大的，但即使如此，在日本，确保人民合作也要比在西方国家里容易得多。

不管怎么说，在战争期间社会内部实现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尽管战后确实有很多工人回到了农业上去，但制造业中男工的相应比例在1947年时是从67%的水平上开始前进的。除非有一个事实上的社会方向的大转变．否则，日本要想回到以农业和精纺业为基础经济的国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日本战后成功的基础是在战争期间打下来的。

3

尽管在战时或准战政权的统治下完成了经济组织的激烈转变，但如果没有人民在思想上的支持，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时日本经济已完全失去了它的自由主义性质。在1937年以后，说得好听些，变成了一种计划经济或有控制的经济；说得不好听，变成了一种“法西斯”经济。因此，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与当时公众中的极右的意识形态是相当合拍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右翼曾有一段时间受到严格的控制，但是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它重新崛起，活动猖獗。当然，即使在此以前，右翼思想也没有

完全休眠，它从未坐视世界发展。德川时代末年，当时亲天皇、反对外国的情绪蔓延，右翼思想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右翼思想家对明治维新所作的贡献不能忽视。因此，他们对明治政府严酷地对待他们愈发不满。这种不满时常爆发出来，其中最严重的事件也许要算1877年的萨摩叛乱。当时萨摩藩的武士在西方隆盛的统帅下发动了反对明治政府的叛乱。中日战争后，俄国、德国和法国插手，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修改中、日间已经缔结了的和平条约的条款；也是在1905年，当时结束日俄战争的和约条款没有达到人们的要求，他们很自然地卷入了右翼思想的骚动之中。此外，强制性教育和军事教育也有助于忠孝的观念在全体居民中传播，到明治时代末年，人们的民族意识已经被提高到明治初年所无法比拟的高度上。此外，许多人对明治时代他们生活方式的突然西化感到不自然；当人们对他们祖先的传统生活方式表示眷恋时，也就深深地播种了对狭隘爱国主义和东方文化的同情和兴趣。尽管有这种右翼分子的活动和思想上极端的右倾，但大约1910年以前，政府一直对右翼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对政府来说，有时这甚至可以成为振奋精神的刺激剂。

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日本社会和经济中的双重性变得十分明显。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变得显著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加。面对这种形势，日本的左翼运动逐渐增强。右翼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观众。在日本，存在着“一君万民”的观念，从圣德太子时代起，就存在这样的看法：除了天皇，人人平等。正如前面所说，日本人分成为贫富被左派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而右派则认为是天皇被邪恶之人——年老资深的政治家（元老和众卿）、政府和政党的主要人物、以及财阀——包围的结果。这些人被右派看作是宫廷中腐败的因素。不过，大多数右翼思想家对于一旦他们清除了宫廷中的这些不良影响后将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并没有一种清晰的构想。

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外是北一辉，他认为，对日本最合适的组织制度是以天皇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许多右翼思想家对北一辉的这种思想都未提异议。六十年代末期，当一个激进的左翼学生团体和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对抗的时候，据说他们的观点除了一点之外，完全一致，这一点即如何对待天皇的问题。大正末期和昭和早期，日本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关系与此也很相似；双方都支持一种社会主

义。

北一辉无疑是日本最杰出的右翼思想家。他去过中国，结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任何革命、特别是年轻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革命中，军队的重要性。在北一辉著书的同时，年轻的军官正在为农村和渔村的贫困而担忧，因为他们的士兵即来自于这些地方。此外，年轻的海军军官认为，华盛顿协定和伦敦协定对日本海军极为不利，他们非常怨恨元老和政府的主要成员——这些宫廷的腐败分子，因为他们接受了这种协定。于是，右翼思想家与年轻军官建立相互联系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近卫文麿任首相的1937年结束时，日本的右翼尚未强大到足以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程度。在这个阶段中，右翼仍处于纯粹考虑有关日本国家的重建问题。

然而，在向右摆动的第三阶段中，一个不同的右翼派别的声望增加了。早在讨论明治维新时我已经指出，许多不同的集团组成了一个排外派，这个派别赞成日本向西方开国，在这个派别中有一个小派别赞成暂时开国，从长远看则要驱逐外国人。作为一种妥协，这个派别提出："国家虚弱时我们同意在对外交流中开国，但只要我们在增强日本实力

方面获得成功，就应该果断地转向排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变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它把自己的市场扩大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这种胜利增强了日本的高层阶级（贵族）、政府的中、高级官员、军部和各帝国大学的教授与学生的信心。他们开始同情亚洲各国，而同时又看不起它们。一种义务感在他们心目中不断加强：为了援助这些亚洲的国家，他们必须武装反抗英、美和其他世界强国。这些人把世界各国分成为三类：以前的先进国家、后起的先进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和俄国一起，被认为是后起的先进国家。一旦这种右翼登上舞台，他们就不再致力于国内问题，其主要目标变成了“世界的解放”。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并赢得一系列对外战争。国内制度也必然要以最适合于服从对外战争的方式加以改造。此时，这些人已不再认为致力于国内改革本身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从近卫文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第三阶段”右翼的一个典型例子。近卫是大化革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臣镰足（中臣氏后改为藤原氏）的后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出身于一个仅次于皇室的著名家族。1917年，近卫毕业于京都帝国大

学，随后在内务省供职。1919年，他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出席了巴黎和会。在此之前，1917年他已经在《日本和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抵制沿英、美路线设计的和平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英、美之所以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是由于这是保护它们自己利益的最好方式；这些国家视之为和平的东西，并非是一种能使所有其它国家都获得满足的真正的和平。它不过是一种使其他国家承认英美现存优势、并与之合作维持这种既成事实的企图。以前的先进国家希望保持目前世界划分状况的既成事实，但后起的先进国家绝不同意以前的先进国家的这种作法，除非它们自己能够打破现存状态。因此，仅仅提倡和平而不承认军国主义，等于是承认了由过去的经济帝国主义所导致的自然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这必然与公平和人道的要求不一致。近卫提出，消灭军国主义的先决条件首先是消灭经济帝国主义和白种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歧视。

近卫终生坚持的这些思想中有不少是与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内容不谋而合的。后来当他成为首相并接管了处理中日战争的责任的时候，他正是从这种观点来看待所谓“中国事变”的。他相信这场

战争不是日本反对中国的战争，而是一场使中国摆脱英、美影响的解放战争。因此，这是一场为达到正义而战的战争、是一场圣战。同样，太平洋战争也是一场圣战，是一场为使亚洲摆脱英、美帝国主义者控制的战争。这样一种对于英、美的看法并非近卫所独有，许多右翼思想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这种看法。因此，近卫不仅能够与右翼谈得来，而且与左翼知识分子也谈得来；由于他的出身，他又能够很容易、很随便地与贵族和天皇交谈，与资本家和政府高级官员交往。

从1933年至1940年“大政翼赞会”成立，近卫负责召集讨论现存问题的一个定期会议，即“昭和研究会”。政界、财界、官僚机构、学术界和新闻界的许多头面人物集合于其中，组成了一个实际上是近卫的智囊团的班子。当时大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中山一郎和户田清一参加了该会，其他人包括三木清（左翼哲学家，后来死于狱中）、尾崎秀实（“朝日新闻”社记者，后来在佐尔格——尾崎间谍案中被处死）、清水几太郎（社会主义者，战后被认为是“左派、进步知识分子，最近又成为“新右派”的一个领袖）。下面的引语体现了近卫所说的“在与包括左派、右派、军人、官僚在内的大批人的十

年友谊的基础上，经过仔细考虑，最近我得出的结论”：

“即使假定军部内要求改革的那些人目的不一定在于带来一场共产主义革命，那些包围着他们的官僚和平民同情者同样可以被称为右翼或左翼（所谓右翼不过就是穿着“国体”外衣的共产主义者），并且同样可以自觉地制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类活动的计划。如果无知而简单的士兵由这样一些官僚和平民来操纵，结果也许会安全些。”（近卫对天皇的《回忆》中的部份内容）

正是这个近卫，在太平洋战争前的四年中三次成为首相、掌管了政治形势。在他的第一届内阁建立之后，近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为了“在国际公正的基础上带来真正的和平”，应该创立一种“举国一致”的组织制度。近卫内阁建立后仅仅一个月，与中国的战争便爆发了。某些日本人希望近卫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军队采取的专横行动，但是，这个“与军部、官僚、右翼和左翼的所有阶层有着许多友好接触”的近卫却不能割断与他们的联系，并且缺乏抑制军队的力量。他既无勇气、也无才智来了结与中国的战事。另一方面，在他第二届内阁的任期内，通过1940年与意大利、德国缔结三

国协定，他开始“在国际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平”。很快，大政翼赞会建立了，各政党的活动被镇压了，一个按照希特勒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一党制国家、即近卫所谓的“举国一致”的组织机构完善了。这以后，政府的统治权转入东条之手，两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

只有一个右翼分子对“革命”后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具有清晰构想，他就是北一辉。他的主要著作有：《国家政体的理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1906年）、《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19年）和《中国革命野史》（1921年）。北一辉关于天皇的观点是非常进步的。他认为，把日本的国体视作永恒不变，并把与这种国体论相佐的一切学说都斥责为完全错误的看法，是一种不应在文明国家中发生的事态，是对学问的神圣性的亵渎。日本天皇不过是日本国家中的一员，就像日本人都是日本国民一样。但是基于他作为完成一种特殊职能的国家器官的地位，天皇也是拥有相当特权的人。作为一个国家，日本是由拥有作为国家最高机构的特权的人（天皇）为一方面、相互平等的人（人民）为另一方面而组成的。北一辉认为，企图恢复古代存在的天皇和人民的关系是错误的。那时，天皇和人

民组成一个家族，天皇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只有糊涂的野蛮人才把明治维新看作是对天皇统治的一种恢复，而使用“明治复辟”的字眼儿。通过明治维新，并没有恢复天皇的统治，相反，它使作为大化革新的理想的那种儒教的平民的国家得以实现。的确，由于天皇没有被允许成为日本的教皇，因此，他从来也不能够干涉科学，不能够制定伦理道德原则、政治原则、或历史和哲学理论。人们拥有的与国家形成对比的权力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必须遵守《教育敕令》的义务。这就是北一辉关于天皇的观点，他相信，天皇和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的。

北一辉关于日本复兴计划的主要观点如下：首先，在新时代中，天皇不应再被认为是一个家长，即使作为像古代那样全国最主要家族的家长也不应该；他应该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代表。因此，他应该树立一个榜样，把皇室拥有的一切耕地、山脉、森林、股票等等全部赠送给国家。贵族制度应该废除，天皇和人民之间的一切障碍都应该摧毁。贵族院应取消，代之以建立一个审议机构来考虑众议院的决定。所有年满25岁的男子都应具有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允许每一个日本人的家庭拥有

不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资产和不超过十万日元地产的财富。私人企业的资本不应超过一千万日元，所有的大企业应该归国家所有。

今天来看北一辉的思想，似乎其中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之为“危险的”内容。它很难被称之为右翼思想。北一辉关于天皇的观点很类似于今天一般日本人所持的观点。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监军总司令部指导下进行的改革完成了所有这些由北一辉论证过的任务：废除贵族制度；取消元老（资深年老的政治家）和枢密院（北一辉所谓的天皇和人民之间的“障碍”）；取消贵族院；改革选举法。在某些方面，改革比北一辉所建议的更为激烈。如果我们考虑到，1919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到每个国民身上只有260日元，每人的私人财产的平均价值仅有1,337日元（包括地产），每人拥有的地产的平均价值仅有593日元，那么，北一辉所建议的握有财产的限额，除了地产之外，实际上是相当高的。因此，北一辉关于国家重建的计划从经济方面看，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土地改革的建议，而土改也是战后在占领军的指导下进行的。

北一辉生命的结束是一种悲剧式的，他牵连进1936年“二·二六”事件，被判处了死刑。然而，

如果人们要问：究竟是北一辉还是当时的上层统治人士持有关于上述问题的错误观点？那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北一辉多少是处在他那个时代的前列的。

4

然而，北一辉关于通过用什么方法来达到国家复兴的思想多少有些极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他有在1911年中国革命中的经历，因此，相信军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此外，由于在任何需要革命的国家中，军队必然是腐败的，因此，北一辉也相信将军和高级军官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主张，在日本，革命必须由年轻军官和士兵所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来发动。北一辉认为，这样一场政变成功之后，天皇应该公布一项有效期三年的军事管制法令，解散国会两院，在这段时间里为国家的重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强制性的军管法有效期间，后备役军人应该在内阁的直接控制下，被委托以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同时，后备役军人要对每个地方的富人所拥有的财产进行调查，凡超出国家关于

私人财产限额的部份均没收充公。

有一种观点认为平民是一场革命的主要力量，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军队更重要。一场革命也许不过是达到某种目标的过程或步骤而已。但是，在这场革命中究竟是平民还是军队被认为是扮演了主角，这却预示了革命后人们所希望的社会类型的根本差异。一场平民作为主力的革命之后，基于资产阶级民主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政府就可能产生；而在一场军队扮演主角的革命中，一种狭隘爱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就可能随之建立。北一辉寻求在革命中应用自己公式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已经彻底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国家，所以当这样一个国家经历了沿着北一辉提出的路线而进行的革命时，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极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北一辉设想的温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由于企图通过与这些目标南辕北辙的方法来达到目标的这一错误，北一辉是有罪的。

当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与其私利完全一致时，另一个国家揭露这种自私自利将会导致被揭露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动摇。然而，当民族主义与一种认为自己绝对正义的信念紧密结合时，它就变得极其危

险了。近卫文麿曾设想在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北一辉也考虑着同样的事情，不过是在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中考虑罢了。“我们要求在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要有公平的分配，在完全同样的理由上，我们也要求对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的一切资源在国际上实行公平的分配。”这就是说，对北一辉来说，“建立革命的日本”和“解放亚洲人民”是从同一个“公正”的原理上溯的两个相关的前提。

更有甚者，北一辉相信不论是在国际形势中还是在国内形势中，这种公正必须通过武力才能达到。北一辉说：

“英国财富之多遍及整个世界，俄国在北半球拥有广袤的土地。在国际交往中基本上是处于穷国地位的日本，难道无权以公正的名义为打破这些垄断而战吗？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赞同无产阶级的国内斗争；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们可以称之为国际无产者的国家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和军国主义，这完全是自相矛盾……日本，这个国际社会中的无产者……求助于战争来纠正国际领土边界问题上的不公正状况，这是人们应该无条件支持的事情。

“如果日本在目前的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协同作战，那么这支军队将一举使俄国屈服，德国海军在欧洲能够碾碎英国舰队，日本则能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击败英国舰队。这意味着日本能够很容易地建立起一个北起俄国、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帝国。”

北一辉的这种《我的奋斗》成了鲁莽的青年军官们的圣经，是不会使人们感到异常惊讶的。此外，这种在“公正”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世界的观念是与近卫的世界观一致的。近卫在整个三十年代，被军队、财界、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寄予厚望，人们称颂他是政界的一颗“新星”。近卫及其同僚们的行动造成了北一辉的死。他死后，历史基本上是按照他所预言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北起满洲里，南至新几内亚岛的大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兴起了，又衰落了。

北一辉的著作包含有诉诸广大日本公民的思想。然而，日本人采取了在几年的时间内就使父辈们建立的伟大的明治国家悲剧性地毁灭了这样一种愚蠢的行动，却未必只是出于这一个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明治国家(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是儒教的民族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君主立宪制的、在

经济上至少表面上是资本主义的、在外交上遵循一条与西方国家合作路线的国家）就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之中：事情不像以前一样进展得那么顺利了。

首先，军队中出现了不满。在以前的两次大战、即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将军和高级军官是作为英雄而出现的。人们极其感激他们，他们自己也得到适当数额的奖赏。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却是资本家获利了，而实际上进攻青岛（德国在中国领有的城市）的部队、在太平洋中来回追击德国巡洋舰和潜艇的部队、在地中海里护航的部队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这种差别被军队认为是一种不公正。在战争中垄断了中国市场、甚至向西欧出口商品的资本家，在战后年代变成了暴发户式的百万富翁，有时甚至拥有几倍于此的财富。但是战后等待着士兵的却是军备限制以及伴随它而来的大量退役。更有甚者，在战争将要结束时日本军队已经深入到西伯利亚的心脏地带，甚至战争结束后这些部队仍然留驻在西伯利亚，然而1922年10月他们却最终被撤回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北萨哈村的撤退是1925年进行的）。陆军和海军感到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日本是应法国和英国的请求而进行西伯利亚远征的。这些国家所以请求日本和美国派遣部队进入西伯利亚，是因为它们看到俄国革命后，如果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德国缔结单独的和约，这将会使德国部队从东线脱身，从而使德国把全部军队投入西线，这样就会给它们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它们认为，必须试着重建一条“新的东方战线”来把大量的德国士兵牵制于东方。日本政府最终同意与美国一道派遣部队。不过，甚至是在法、英提出此项请求之前，日本军队就已经制定了它自己的派遣部队进入俄国远东领土的计划。该计划名义上的目的是保护该地区的日本侨民，而实际上却是要进行一次意在支持一个反布尔什维克政权、参加阻止革命的自发性远征。在政府中，也有人主张实行强硬路线，要求进行一次独立的远征。但大多数人的观点则同意进行一次旨在结束世界战争、由英、法支持的联合远征。

结果，甚至在西伯利亚远征之后，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合作也减少了。军部声称自己拥有独立的最高指挥权，不允许政府干涉军队事务。在中日和日俄战争中，军队曾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过英勇的战斗。然而，由于西伯利亚远征，同样是这支军队，

却开始摆脱政府的控制。所有的军事事务，包括增援派遣部队、扩大部队占领地区等，都开始由军部独自作出决定。

这样，日本军队开始对其他一切声音都充耳不闻，不予理睬。日本人民倒不一定把军队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任何反常的东西。1918年，恰好是明治维新后五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历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氏三个武士家族统治的三个世纪。大多数日本人对幕府——军事政府——还保留着非常清楚的记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平民控制军队的概念如果与幕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它更具有令人恐惧的前景；当然，对于那些试图抗拒这种形势的政治家，军队也有一些未受制止的行动，但军人们发现这种抵抗很微弱，因而也就放心了。军部变得越来越专横，它有自己的一套反对政府的办法，并强行推行自己的计划。结果，日本又进入一个双重政府和双重外交的阶段。随着军队政治权力的加强，军队内部争夺主导地位的派系斗争变得越来越严重。

尽管《军人敕谕》中严格禁止军队干预政治。但武装部队的成员、特别是陆军，却与右翼政治家和右翼思想家联合起来干预政治事务。他们和所谓

的右翼的“中国浪人”一起，密谋在满洲里挑起事端。1927年至1928年，当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军队进行北伐的时候，日本政府在保护日本侨民的借口下派遣部队进入中国山东省。此时的政府是由同时兼任外相的将军田中义一首相来领导的。因此，内阁不过是军队的一个分支机构。政府制定了一个将满洲里和蒙古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的秘密计划，并且打算使日本接管维护这些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的权力。当满洲里的铁腕人物张作霖明显地变得不愿意言听计从的时候，关东军便暗杀了他。除此之外，陆军于1931年在日本所有的南满铁路上制造了第二次爆炸事件。当时，它声称这次爆炸是中国军队干的，于是对中国部队发动了进攻。“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译注）开始了。

一方面，有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见，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工资差别有了惊人的扩大。此外，连续的歉收导致了农村的贫困。日本东北部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女儿。很自然地，不仅是右翼和左翼分子，而且许多普通的民众都怨恨财阀，并诅咒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除此之外，那些领导军队主要机构的人由于渴望光荣和进攻而头脑发

昏，密谋发动战争来改善军队的地位。再有，北一辉及其追随者企图实现民族复兴的计划，因而努力增加与年轻军官们的接触，这些通过灌输已经对日本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有着充分认识的天真的青年军官，对北一辉的思想怀有深厚的同情，并不困难。

1921年，安田财团的领袖安田善次郎被一名右翼分子刺杀。接着，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被刺，后因伤势过重而死。1931年，某些主要的陆军军官策划了两起政变，而其他部门的军官则发动了“满洲事变”。这两起政变由于事前被发觉，因此完全失败了，但首魁却非常轻易地逃避了处分。国家已经陷入了满洲事变，并且总的看来向右转了，那些政变的首魁与其说被看作是叛逆者，不如说被看作是爱国者。1932年，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团的董事长团琢磨双双被右翼分子暗杀。接着，一群青年海军军官攻击了首相官邸和警察总部，刺杀了首相犬养毅，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五·一五”事件。1935年，作为陆军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统制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属于皇道派的军官斩杀于陆军省。不必说，日本人民当然憎恶这种右翼恐怖主

义；然而，他们又感到自己受到了这支无法控制的军队的相当大的恩惠。因为它使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东北部建立了一个控制着广阔领土的傀儡政权“满洲帝国”。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民没有对军部展开广泛的批判。大多数日本人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国家永远是占第一位的，因此，在他们与军部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分歧了。

“满洲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它公开的政策是保持五个种族（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满洲人”、蒙古人）之间的和谐，但实际上，是日本人对其它四个种族的统治和剥削。在满洲，日本居民的成份如果有区别的话，那要比日本本土上的居民成份还复杂。那些由于参加左翼学生运动而曾经被捕和受到校方惩罚的学生与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右翼恐怖分子并肩工作。例如在南满铁路公司（它实际上是日本管理满洲的总部）研究部中，从大川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犯被捕）到尾崎秀实（战争期间作为苏联间谍被处决）等各类人物都在合作进行研究工作。其中一些人在东京工作，而其他的人中有许多是在日本失意，而在满洲成为高级人物并享受特权待遇的。

1936年2月26日，著名的“二·二六事件”

（我认为应该称作昭和政变）发生了。22名陆军青年军官领导着1,400多名士官生和士兵攻击了首相官邸、大臣官邸和东京警察总部，有一个时候他们甚至占领了部份皇宫。暴动者的口号是“尊崇天皇、驱逐奸佞”。这次攻击仅以三人被杀而结束。这三人是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宫内大臣斋藤实和渡边锭太郎将军。原计划要刺杀的人不仅包括所有国家元老重臣和内阁成员，而且还包括许多陆军高级指挥官。很显然，这次政变也是与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有联系的。结果，政变失败后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由于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是陆军内部的皇道派成员，所以政变失败后统制派便对皇道派进行了总清洗。皇道派主张除掉天皇周围的奸佞之人，从内部重建国家；而统制派的目标则是通过合法手段来扩大军队的政治影响，在日本政治家、官僚和企业家的默许下建立一个适合于总体战的国家，同时使经济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那些发动这场未遂政变的青年军官确实是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但同样确实的是，北一辉本人在政变中的实际作用极小。他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中，调整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因此他基本上不赞成政变，对青年军官的暴动

绝未超出默认的范围。然而，他被作为此次事件的首魁之一遭到逮捕，并于1937年8月19日被处决。同样被认为是此次事件首魁之一的西田税，也同时被处决。当时，西田向北一辉提出“咱们三呼天皇万岁后再死罢”。北一辉拒绝了，他说：“我不愿意这样做”。北一辉的弟弟在他的死刑执行前曾同他作过最后的谈话。据他弟弟讲，北一辉这样说：“我与这次叛乱没有任何联系。但是，由于这个集团胡说自己是我的著作的崇拜者，因此，人们可能会被问道：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否感到荣幸。”

天皇在自己的职责所允许的范围内曾企图阻止这次向右的偏移。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公开的各种材料来看，已经越来越明显。然而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天皇的意见。在“二·二六事件”发生的时候，日本已经退出了国际联盟，从那时到北一辉被处决的17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与中国再次爆发战争。日本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双重政府的国家，公开的政府很虚弱，幕后的政府却是一个强有力的军政府。两个政府有着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名义上的政府赞成与中国的战争不要升级，并希望寻求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而幕后的政府则采取一

次又一次的使冲突升级的行动，从而剥夺了名义政府在国际上留有的一切信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失去了发表任何有关对外政策的独立声明的能力，而完全受制于军部。当时，要表达一种与军部和右翼完全不同的意见，不仅对广大公众来说，而且对元老重臣来说，甚至对天皇本人来说，都意味着死亡。此外，宪法规定天皇只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因为天皇是一个活神，他必须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这种现世的神的观念所导致的结果是天皇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几乎全部自由，天皇和国家的主要政治家实际上已经被军部和右翼所取代，他们的公开声明已经成了窃窃私语，甚至根本不能传送到人民的耳中。

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开始生效。两年后，日本、德国、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军事协定。所有右翼派别都联合起来了，国家被塑造成为一种民族主义、天皇崇拜、狭隘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温床。日本国民由于受到儒教的教育和长期存在的对一切尚武形式的崇拜，因而根本就没有打算对这种新制度进行任何激烈一些的抵抗。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似乎也被这种似旧还新的米酒完全灌醉了。近卫和东条可能过于软弱，因而不能成为独裁者，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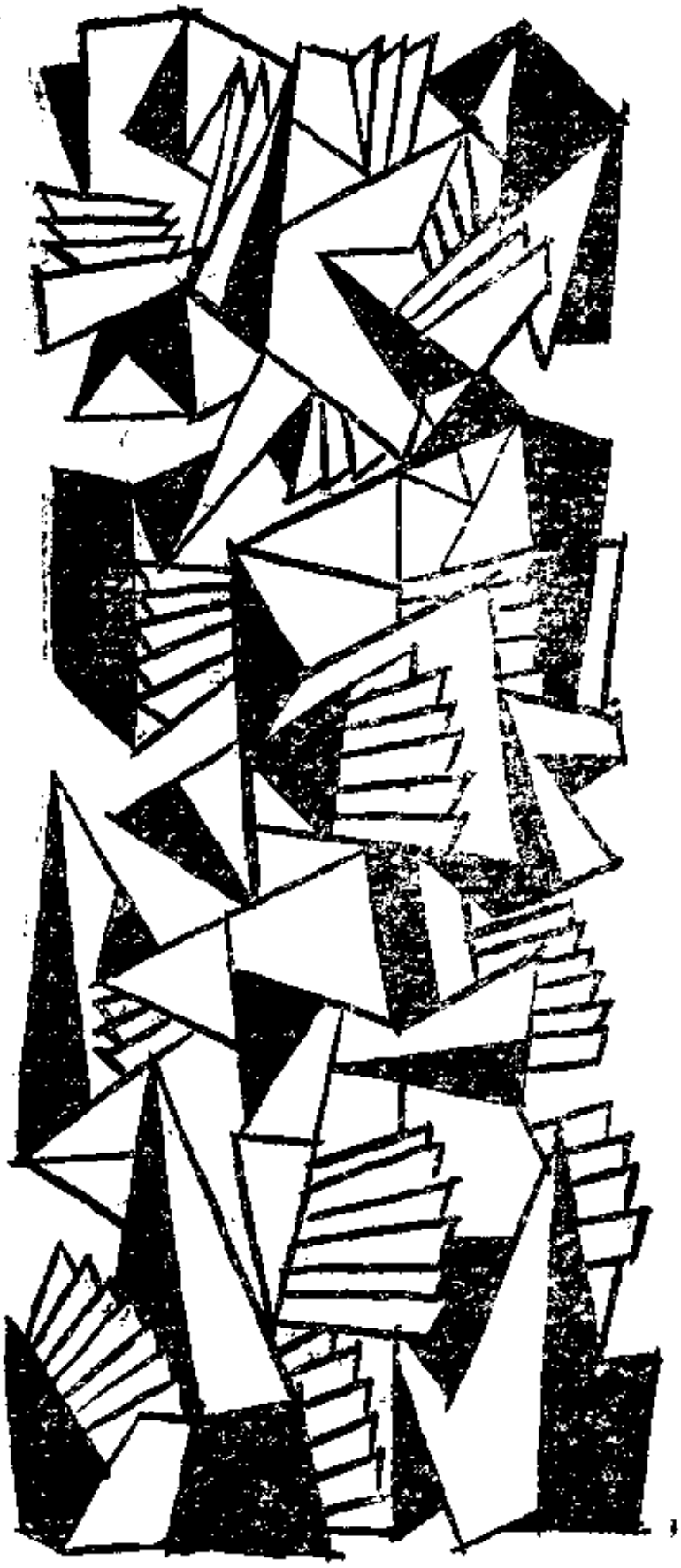
是国家作为整体来说，当时已经完全是侵略主义的了。日本自身已经统一起来，开始越来越明显地着手实现它的企图，即获得北一辉和近卫所说的那种“在公正的基础上对世界的重新划分。”

日本除了没有希特勒之外，已经完全变得像纳粹国家一样了。在这个时期，如果说日本还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那也只是从没有一个无视人民意愿，实施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政策的独裁者的角度上说。但是，作为军部和右翼鼓动的结果，作为日本人接受的强制教育的结果，作为传统上他们所坚持的道德观念、国家观念和天皇观念的结果，大多数日本人要求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策。因此，政府除了采取一条同样强硬的路线之外别无它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也许可称之为“民主的”法西斯国家。当时即便政府选择的是一条温和路线，不仅军部和右翼，而且国民也未必会同意，允许政府采取一项与美国和解的政策。

天皇本人通过对形势的审查得出了这个结论，从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时候（1928年）起，他就在自己的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地作出努力来维持和平，当狂热的战争鼓吹者东条英机最终被推荐为

首相继承人的时候，他以下面的评论来批准任命东条为首相的计划：“我想，这是一个不冒险就不能取胜的计划。”天皇同意这种任其自流的政策可能被批评为不尽职责，然而，在这种“民主的法西斯制度”下，即使不是东条而由别人在1941年10月份担任首相的话，我们可以想像，他要阻止战争也是极为困难的。

1945年，当东京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主要城镇已经化为废墟的时候，结束战争的行动在日本才最终成为可能。处在这些行动中心的人物是两位曾在“二·二六事件”中设法逃脱叛军袭击的海军将军。事件发生时的首相是冈田启介。当时他的内弟是其私人秘书，长得很像冈田，他欺骗那些叛乱的军官说自己就是首相，代替冈田被杀。铃木贯太郎遭叛军枪击，受了重伤，他的妻子恳求叛军司令安藤大尉不要再开枪，结果，铃木活了下来。在冈田的帮助下，铃木在1945年当上了首相，并能够制止那些希望继续抵抗的派别，最终使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昭和政变驱使日本对美国开战，而那些在叛乱中没有被杀死的人正是给日本重新带来和平的人物。



第五章

旧金山政体

1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人在军部专制主义统治下，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总是恐惧地感到秘密警察的眼睛在监视着他们。许多人在战争将要结束的阶段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他们真正的敌人并非是英国和美国，而是日本军队本身。日本投降后很短的时间内，当日本人民认识到盟国的占领远非他们想像得那样冷酷无情的时候，就不再害怕盟国军队了。更有甚者，他们甚至感激盟军，把盟军看成是他们盼望的解放者。派往日本的占领军士兵开始时士气很高，军纪很严，这是事实。在这些士兵和日本人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纠纷，事实上这是一种模范的占领。

在开始阶段，占领政策的目标在于把日本（迄今为止它一直是充满活力的国家，然而也却是具有

军国主义和侵略性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可能受到较多限制，然而却是和平、民主的，建立在自由企业制度基础上的国家。1945年9月，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给币原首相发布了一个指令。其中规定了五项主要改革措施，即给妇女以选举权；给劳工以组织工会的权利；自由教育；废除专制政府；经济民主化。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了选举法，组织了工会，改革了教育制度。此外，为了结束专制主义政治，废除了贵族爵位，贵族院改建为参议院，所谓的“第三院”，枢密院也废除了。接着，颁布了一个新宪法。按照这部宪法，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人民具有了主权和基本的人权，地方实行自治，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战争手段被放弃。在实行经济民主化的过程中，财团遭到分解，并且开始征收苛刻的财产税。皇室的财产也在民主化之列。由于没有什么例外，皇室在全国拥有的大量土地和皇家别墅都出卖了。此外，还实行了一项彻底的土地改革。

这种“新日本”与北一辉重建日本计划中所设想的日本非常相似。在他写《日本改造法案》（1919年）的时候，处于贫困边缘的自耕农正在下降为租佃农，农村正在变成少数大地主为一方、大

批租佃农为另一方的两极社会。在北一辉的改革计划中，他主张进行彻底的土改。北一辉宣称，天皇应该带头把皇室拥有的一切土地、森林、股票等全部交给国家。他所梦想的这种情况，战后在占领军司令部的指导下，以极类似的形式得以实现了。正如北一辉所期望的那样，天皇不再是“作为国家首脑，他是拥有土地和人民这两种国家基本素质的时代的天皇”。土地改革的结果是，以前占农民总数36.5%的自耕农在1947年上升为占总数的54.1%，而租佃农的百分比则从26.6%下降为7.9%。此外，无须多说，财产税大幅度地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尽管那些以前根据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命令化整为零的财阀所属的公司，后来又都恢复并发展了，但是，财阀家族再也不能恢复以前所握有的那种巨大的经济权力了。

这种形势是在昭和政变（二·二六事件）后大约13年才最终到来的，那次政变由相信北一辉的革新计划的青年陆军军官发动，但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北一辉的目标是在国家重建之后进行世界的重建，即把亚洲从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所以，即使昭和政变获得成功，并在1937年使日本建成为1947年这种样子，北一辉理想中的日

本迟早还是会发动一场自认为是为世界解放而战的战争。因此，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945年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占领，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日本人民不能够抑制狭隘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常常以“尊王攘夷”、“和魂洋才”、“富国强兵”、“忠诚爱国”和“以日本为中心的泛亚洲主义”为特征。

1945年至1947年虽然食品奇缺，但以前却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时代使日本人具有这样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确实，明治维新刚结束时，旧的等级制度被废除了，人民也有一种很强的解放感。但是，当时教育仍然不普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这次改革的意义作出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是明治维新80年后，却有大批的人意识到（即便仅仅是在理论上）自由是极为重要的。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日本人一直是知识上的饥饿汉。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排队购买食品，另一方面则要排队购买书籍和杂志。

陆军和海军的所有部队都被占领军遣散，但政府的官僚机构实际上未经触动而保留下来。当时日本被置于盟国军队的军事管制之下，有关重要的事

务，政府必须遵守盟军司令部发布的指令。不过，在1945年以前的长时期中，日本的官僚政治一直是扮演军部下面的“第二”政府的角色；在占领的环境中，官僚的角色与盟军最高司令部相配，这很像以前的情况。因此，占领的环境绝没有给官僚们带来一种它不曾经历过的新环境。相反，如果战后立即让日本政府独立工作，那么它很可能会完全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日本官僚机构的经历已经使它变成一个只有在军部下面工作才能胜任的施政者，虽然统治结构中的上层人物可能已经变化了，日本军部已经被盟军最高司令部所代替，但是官僚机构仍然保持以前那样的忠诚和能力，并且继续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进行着工作。在整个占领的年代中，日本政府没有对盟军司令部进行任何反抗，也没有进行任何怠工。

不用说，困难是很多的。通货膨胀率极高，失业人数超过五百万，并且罢工不断发生。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准备沉重的赔偿。他们认为，日本要作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复兴，那就是愚蠢的；同时他们也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准即使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也不过是对遥远的将来的一个 梦幻。但 是，到 1948 年，亚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不能不

影响到日本。在这一年中，蒋介石的军队在全中国范围内被共产党的军队所击败；在朝鲜半岛上，南半部建立了大韩民国，而北半部则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最后，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以苏联和中国为一方、以美国为另一方的双方关系跌落到了一个极低点上。

面对着这种新的形势，美国政府不得不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一个反对苏联和中国的堡垒，而这样一个堡垒又不得不以极高的速度建成。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占领政策上实行了一个较大的转变。以前目的在于把日本建成为一个以自由企业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它的行动将受到限制，并且必须是爱好和平的）的政策被放弃，代之以一些新的措施，这些措施将把日本建成为一个拥有与作为“自由”（反共产主义）阵营的前进基地的地位相适合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国。这种转变的结果使得日本的资本主义像一只长生鸟一样，又以某种与战前阶段几乎毫无二致的形式重新兴起了。

到此时，陆、海军已经被遣散，财阀的解散也正在进行之中。此外，以前的军职人员已经被从公共职位上清洗掉，主要的企业家也被强迫隐退。然

而，朝鲜发生骚乱时，盟军最高司令部指令日本政府组织一支警察预备队（后来称自卫队），并大量地增加了海上保安厅的人数。此后，一些前陆军成员未遭清洗，并被允许担任公职。他们之中有一批人立即加入了国民警察预备队，并在美国部队被派往朝鲜之后负责日本的防卫。除此之外，前海军官兵也被作为海上保安厅的成员派往朝鲜周围海域，从事扫雷工作。警察预备队开始征兵的事情仅仅发生在日本新宪法生效后的三年又三个月，而宪法第九条清楚地载明："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潜力将不被保留。国家的交战权将不被承认。"

从朝鲜战争爆发起，美国军队（联合国军）就向日本企业发出了大量有关武器、运载工具零部件和其他军用物资的订货单。为了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美国被迫紧急地复兴日本的经济，这样就使还在执行的日本经济非军事化的政策迅速中止了。同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在那以前所流行的把日本重建为一个自由、和平、具有中等规模经济单位的国家的观念被抛弃了；在日本的职责范围内，它被期望能够承担起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前进的任务。

重建日本的新目标后来变成了建立一种这样的

经济：它既能承担起发展东南亚经济的责任，同时又能提供应付美国物资供应紧急需要的各种储备。这是占领政策上的一个彻底的方向性转变。在以前对日本采取的措施中，不允许日本的生活水平比它所侵略过的亚洲其他国家高。结果，除了必需的商品和资本设备之外，日本的一切商品和设备都被作为赔偿交给了盟国和那些遭受过日本侵略之害的国家。1949年，这种赔偿计划被搁置了。最后，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通过这个和约，日本成了“自由”阵营中的一员）下，日本赔偿的责任被承认了，但作为和约之一方的许多国家却放弃了赔偿要求，仅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越事实上仍要求赔偿。

在占领政策的方向转变时，所采取的政策与以前的日本政府采取的几乎一样，以大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再一次复兴了。从1950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日本的企业由于军用物资的巨大需求而发达起来。在前两年时，需求的主要项目包括卡车、运载工具的零部件、棉衣和煤炭。但1952年盟军最高司令部开始允许制造武器，这时武器便成了需求中的最大项目。正如关东军的“满洲的特别需求”使三十年代大危机给日本经济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小程度

一样，现在，在美军的“朝鲜的特别需求”的帮助下，日本的经济指数开始从战后的最低点回升了。从1950年起，钢铁工业生产开始增长，1951年，不仅钢铁工业，而且纺织、煤炭和机床工业的生产水平也毫不费力地超过了战前水平。不过，从这种日益密切地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利的仅仅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则没有从这些“特殊需求”中分到好处。

不仅如此，在五十年代，许多大的陆、海军设施，包括以前的兵工厂，都被卖给了私人企业。这些项目包括：四日市的海军燃料站卖给了昭和石油公司和三菱石油化学公司；岩国的陆军燃料站卖给了三井石油化学公司和日本煤炭公司；属于大阪陆军兵工厂的播磨工场卖给了小部钢铁工程公司。在明治时代，官营企业的出售决定了明治工业界的结构，战后“军用财产的出售”对后来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同样的决定性作用。许多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基础的大型联合企业当初都是继承了陆、海军设施的企业，以前的海军兵工厂作为造船厂和钢铁工程而重新复兴，并繁荣起来。

对于日本来说，这种发展是极其幸运的。事实上，当朝鲜战争爆发、特别需求突然猛增的时候，

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都为此而高兴，并欢呼："神风终于开始刮起来了！"战后的经济困难远比开始预料的要小，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战后年代越来越稳固地形成的日本经济的特征与战前几乎完全一样。战争刚结束时人们期望着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这种经济尽管贫困一些，但却是民主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现在，这种自由竞争经济的想法已经像梦一样地逝去了。重建的经济如同战前一样。在这种经济中，政府的领导是起根本作用的，只有那些巴结政府的聪明人才能从中获利。一方面，许多公司都把它们的首脑机关迁到东京，大批的人聚集到首都去寻求就业和接受大学教育；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发展的是日本人民对一切新的军国主义因素的憎恨。

许多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把推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统治看作是太平洋战争的唯一成果，因此，对重新武装和大企业垄断的加强极为敏感，并表示强烈地反对。他们特别猛烈地批评美国对日政策的方向性转折，谴责美国当初就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强迫日本非军事化；在形势变化后，又立即完全改变了作法，命令建立警察预备队（这实际上就是一支军队），复兴军火工业，把日本变成美军的

供应基地。美军来后最初一段时间，日本国民甚至包括共产党人也把美军看作是解放者而表示感谢。但到这时许多日本人，都对美军感到绝望。结果，到六十年代中期，反美情绪在某些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团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1960年批准美日安全条约修正案时，反美情绪达到了高峰。东京沉浸在自1936年“二·二六暴动”以来从未有过的紧张气氛之中。这是对日本被建成“‘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大工厂”的一种报应。

2

战后初期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危机时期。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丧失了信心，甚至憎恨它们。尽管如此，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未在日本坚定地扎根。工会在战后阶段被作为自由化政策的一部份而受到占领军的鼓励，但最终还是转变成了十足的“日本式”的“企业工会”，就像企业管理也被看成是十足的“日本式”的管理方法一样。它流传得非常广泛，并且建立在人们可以称之为“企业主义”的原则之下。

战前也有工会，但是到战争结束时，很少有人对战前工会运动还有什么了解。在日本进入准战时政权阶段时，工会运动被禁止了。每个企业都建立了以公司经理和工厂厂长为首的“爱国工业协会”来代替工会。占领军很看重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看得与他们整个占领政策中的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一样重要。但是，如何在日本牢固地建立起一种公正的劳工运动（就这方面来说，日本实际上尚属处女地），他们既没有计划，又没有能力，更缺乏知识。他们开始时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劳工煽动起来。

战前劳工运动的倡导者们很自然地掌握了领导权。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共产党人，其中很多人还具有相当大的魅力，不过多数人都被在监狱中关了好多年（一些人甚至被监禁达20年之久）。日本社会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动荡，而这些人在他们最应学习参加社会运动的关键时候，却被与社会隔离开来。而在日本共产党人当中，流行着在监狱中渡过的时间越长，这个共产党人就越伟大的错误观念。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对世上的认识越少的人，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却越高。

这些人把劳工运动误认为是一场革命。殊不

知，在占领军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革的时候，任何怀着与占领政策不相符合的想法、企图进行一场革命的集团，不论其是右翼还是左翼，实际上都是占领军的敌人。另外，在中国大陆上，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军队正在共产党军队的打击下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都使占领军和日本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向坏的方面发生了惊人的转变；最初，尽管占领军并不喜欢共产党人，但由于共产党人把占领军作为解放者来欢呼，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爱有恨的关系。然而现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禁止计划在1947年2月举行的总罢工，因为它可能使大量的工会与共产党、社会党结盟去实现他们推翻内阁的共同目标。接着，在1950年7月，所谓的“赤色大清洗”开始了；共产党人及一切被认为属于这一类的人物，都被从公共企业、教育机构、报刊公司和其他宣传机构中清除出去。这事仅仅发生在警察预备队建立之前的一个月，也是前职业军人不再受到清洗之前的四个月。

此后，日本的工会运动明显地衰落下来。最初，日本工会运动的活动家们认为，工会一开始应该在企业这一级组织起来，然后这些地方工会再根据产业进一步组织为跨行业的工会，最后，这些跨行业的

产业工会再共同置于日本产业工会代表大会的领导之下。这个“代表大会”是以美国产业组织代表大会为模式的，不过它是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领导权的激进组织。1949年，产业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达到56%的最高峰，以后逐年减少，1978年属于工会的产业工人比例不超过32%。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开始明显转变的时候，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成立了，它采取的态度远比产业工会代表大会要现实，而后者最终于1958年被解散。

由于工会运动衰落并日益缓和下去，工人运动的中心变成企业工会。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终身雇佣制和资历制在战后时期越来越广泛地蔓延开来。在这种制度下，工会开始全神贯注地考虑公司的事务，而资本家也经常对他们自己公司的工会表示出同情。由于资方和工会领袖经常进行关于增加工资问题的谈判，资本家开始认识到工会领袖控制会员的能力，而工会领袖也开始对公司资方所面临的环境有了清楚的了解。于是，双方之间产生了一种属于同一公司的共同意识，工会主席的职务，或者其他工会领导的职务甚至逐步被看作是在公司内获取成功的道路上的重要路标。事实上，

在许多企业中，工会领袖因此而成为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一个企业的经理或副经理曾经是卓有成就的工会主席，这种现象并非不寻常。就像英国学校中的老师看待级长那样，日本的经理们开始把工会的领导看作是未来大有前途的学生。这种情况意味着曾经在全国招致罢工浪潮的激进的工人运动完全平息下来。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企业工会是以像战争期间存在于每个公司内部的爱国工业协会那样的方式，与资方合作而告终。占领当局作为民主化政策的一部份而加以鼓励的劳工运动，最终被同一个占领部队的“停止”命令所瓦解。

占领军关于民主化政策的另一个要点是清洗主要企业的高级领导人。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在寻求战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这种清洗所带来的空缺都由年轻人填补起来。这些年轻人有着大量的战争经历，但事实上在有关的企业管理方面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成就。从1931年起，日本有15年的时间处于战争之中。因此，即使是在战争结束时年龄为四十岁的人中，多数也在战场上当了十年的兵，而在公司工作的经历却不超过八年。此外，他们就业的公司一直是在战争环境里经营，因此，他们没有在经济自由经营时期的公司就业过。这种

年轻人被草率地提拔到经理的职位上来代替那些被清洗的人，很自然，他们只能属于“三流经理”。

这种人是以一种类似于指挥部队那样的方式来指导劳工操纵机器的。同样，工人们也有很长的军事生活的经历。战争结束后，所有军国主义时代的惯例和制度都被看成是邪恶的，然而，资方和工人在军队中的经历都太长了，他们已经对资历制和终身雇佣制产生了一种好感；对这种制度的功绩他们都不存疑窦。不仅这些惯例在战后继续流行，而且它们变得越来越普及。年轻的经理们敦促工人“团结起来对付严重的形势”，并且为了获得更高的生产率而让第一厂去和第二厂竞争，就像在战争中让第一营设法胜过第二营一样。对企业做出无限的贡献被看作是最高的美德。

以前与财阀联系在一起的大企业受到这种变化的特别影响。占领军发出的指令禁止财阀家族卷入管理活动，新财产税的结果使他们失去了大量的财富。同时，那些在战前和战争中曾经作为自己人的忠诚的“工头”们，即财阀企业中的高级经理，也被清洗了。于是，在这些企业中，管理权和所有权一下子分开了。新的年轻的经理感到与工人的关系远

比与企业主的关系要密切。这种非资本主义的、年轻的受雇经理对改进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很热心，而对于通过努力获取最大可能的利润来为企业主服务倒不感兴趣。经理们的这种态度完全可与那些认为学术成就比聚集财富更重要的真正的学者相媲美。由于经理们相信，要达到这些目的，工人们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并不要求给自己以很高的薪金。却热心地为工人提供充足的福利设施。战前，财阀家族的成员和他们的经理们由于任意追求自己的私利而受到左翼和右翼的激烈批判，人们不断地要求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但现在人们也许可以说，战后这些以前隶属于财阀的企业在应付这种批判方面，几乎无懈可击。

当然，在日本，也有一些其他的大企业从来也不属于某个财阀，其中有许多是由以前曾是公司普通雇员的董事长或经理来管理的，与上面所提到的隶属于财阀的企业基本一样。也有一些其他的大企业是由该企业的创办者或其家族的成员个人来经管的，这类企业包括松下电器公司、索尼公司、丰田公司、本田公司、佳能公司、三得利公司。这些经理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个人的超凡的魅力，但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白领和蓝

领工人的支持，他们也将失去自己的魅力；如果他们以冷淡的态度对待雇员的话，他们就别指望雇到优秀的人材。总的说来，这类经理比上面提到的那种曾经是公司雇员的经理更富于冒险精神，办事也更果断。不过这也有坏的一面，即公司的原则和格言是尊崇于把经理的个人哲学强加于每一个雇员的这种惯例的。不论它们以前是否属于某个财阀，现在日本的企业或多或少地成了这样的团体：在其中，资本家和雇员都被一种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极而言之，它们是一种具有共同哲学的团体，而公司的创建者经常是像一个宗教派别的创建者一样受到尊崇。

战后时期公司的经理们要求他们的雇员表现出对公司的最大忠诚，并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他们对新入厂的、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雇员并不满意。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当然是发掘出每一个人的潜在能力，但也有一种教育是要使每一个人仅仅去适应某一种模式。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学校教育也许是希望发展个性，然而在一支军队内，教育却是希望增进一致性。当人们标准化了的时候，指挥官就很容易估计自己指挥下的这些人的总的能力。事实上，人的标准化是大部队行动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

件。战前，甚至在日本的学校中所进行的教育都是把人塑造成一种统一类型的教育。即使是在战后，虽然口头上说要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实际上，目的在于培养一致性的这种教育仍然一直在实行。尽管如此，经理们还是认为仅仅接受学校教育并不足以使一个雇员在企业的工作中显示出团结。新雇员刚一进入公司，就要立即在公司内部接受训练，公司有一个完善的道德训练的计划，它把公司的习俗反复地灌输给这些新人。这样，进入高级企业的新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雕琢成唯经理之命是从的第一流的公司“士兵”。

大企业用这样的方法来要求它们的雇员忠诚，而中、小企业却没有能力要求自己的雇员在正常工作之外做到任何事情。结果，战前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结构——由大企业的第一个劳动力市场，即我在前面称呼的“忠诚市场”和中、小企业使用的第二个劳动力市场，即我所说的“唯利是图的市场”结构——在战后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随之而来的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与战前曾经存在过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同样地出现了。

表6A显示了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

距，这是包括了男女所有雇员在内的1951年以后的统计数字。它说明：在五十年代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工资差距；从1960年起，这种差距迅速缩小；但1970年前后，这种缩小的趋势停止了；在七十年代，大企业和较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再次缩小，但程度也很小。不过，人们决不能轻率地把这个表与显示1909年和1914年间工资差距的表

表6A　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工资差距（%）

年　代	企业规模(以企业中的雇员人数来衡量)			
	5—29	30—99	100—499	500—
1951	38	56	75	100
1953	41	54	71	100
1955	41	53	69	100
1958	44	55	70	100
1960	46	59	71	100
1963	58	69	79	100
1965	63	71	81	100
1968	63	69	80	100
1970	62	70	81	100
1973	61	71	82	100
1975	60	69	83	100
1978	61	68	83	100

资料来源：1951—55年：通产省（工业统计表），
1958—78年：劳动省（就业统计月评）。

2A上的那些数字作直接的比较。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日本制造业中的大企业在三十年代越来越变成为男人们的领域了。在此之前，大企业中的女工比例很高，从五十年代起，男工的比例高了。女工的工资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都大大地低于男工，因此，大企业中的平均工资在1930年以前是低的，而战后则是高的。这样，表2A中的数字所显

表6B　不同规模的企业及不同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

年代、性别	企业规模（根据雇员人数来衡量）			
	5—29	30—99	100—499	500—
1909男	85	92	97	100
女	77	89	93	100
1914男	78	84	89	100
女	74	85	89	100
1960男	54	71	83	100
女	62	77	86	100
1968男	69	76	86	100
女	69	73	85	100
1973男	70	81	90	100
女	63	72	83	100
1977男	70	77	90	100
女	63	69	83	100

资料来源：1909—1914：工厂统计表，1960—1967：就业统计月评。

示的1909至1914年间的工资差距比实际的状况要低一些，而表6A中的战后的数字则要比实际状况高。

表6B显示了男女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但它有着高估和低估实际状况的缺欠。即使是在实际差距下降的1960年，男女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明显地高于1909年和1914年。因此，即使没有关于五十年代不同规模的企业中男、女工各自的工资差距方面的满意数据可以利用，要隐瞒下面的事实也是困难的，即在五十年代工资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此外，即使是在这种工资差距最小的年代（男工是1973年，女工是1968年），它也仍然要比1914年的差距大，更不必说1909年了。

尽管如此，有些经济学家在这种实际状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已经克服了它的双重结构的问题。与此相反，我认为即使不看上述事实，不同规模的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在现实中仍然是非常大的。的确，如果我们从狭义上，即包括加班费和奖金在内的正常工资的总数上去考察工资，我们就必须承认表6B中提供的数字。但是在战后时期，特别是从大企业完成了复兴任务的1960年以来，大企业就开始给它的所有雇员提供小额优惠

了。给工人提供膳宿是不必说的，而且还包括门诊（某些企业组织甚至拥有自己的大医院）、疗养院以及座落在山区和海滨的娱乐中心等充足的设施。此外，还有免费渡假的组织制度，以及中、小企业所无法比拟的养老金和退休金。如果把这些小额优惠计算在内的话，那么，雇员的月薪和年终所得的红利不过是全部报酬的一部份而已。在终身雇佣制下面，大量的报酬从养老金和退休金中支付出去，那些从公司退休的人，由于以前受雇于该公司而被允许使用公司的医疗设施和疗养院。中、小企业没有什么剩余可以用来修建这些福利设施，即使它们的工资似乎很高，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公正而已。

3

在今天的日本，一个人全部生活的幸福实际上仍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受雇于一个大企业。确实，日本变得富裕了，中、小企业的雇员在国际上比较起来也不能再说是过着贫困的生活了。然而在国内，与大企业比较起来，他们仍然在生活水平上有着很

大的差距。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困难的问题是阶级问题；而在儒教的资本主义的日本国内，双重结构（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分割）的问题正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问题。

正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为获得大企业的雇佣而进行的竞争是激烈的。进入大企业的考试对每一个刚从学校或学院毕业的人来说，一生中只有一次。如果他毕业于其中的学校不是一个好学校，他就没有什么机会进入大公司，因此为进入一个好的大学就要进行激烈的竞争，由此而来的是，为进入一个好的高中也要进行激烈的竞争，如此下去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教育阶梯。说得极端一些，这种竞争如此残酷，以致扩展到了家长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进一个好的幼儿园的程度。为了把孩子送进一个好的幼儿园，某些孩子甚至在家里就开始接受训练。由于在一个儒教的社会中，不论人们接受与否，他们都被按照受教育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因此，大企业希望从人们所认为的声望较高的机构中招募毕业生，因为这显然是保持企业水准的最合适的方法。

战前以来，日本一直是世界上具有最好的教育设施和教育制度的国家之一。然而，战前的教育并

不适合于个人，而主要是适合于国家的目的。《帝国大学法令》的第一条清楚地宣布："帝国大学的目标是按照国家的先后次序来教授艺术和科学，并进行有关原理的研究。"不仅是帝国大学，而且其他的教育机构也必须培养出把自己的天赋用于国家的人材。由于国家频繁地从事战争，所谓对国家有用无非是对进行战争作出贡献。特别是1930年，日本朝着准战时制度迈进以后，大学不得不使自己全身心地支持军队。当国家的重点被放在工程学和对公司雇员有用的经济学上面时，艺术、哲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就受到了轻视。战后，教育制度按照美国的路线重新改造，教育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发展一切个人的潜在能力，但这从来就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战后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已经完全成为从属于大企业需要的了。大学所作的完全是"按照企业的先后次序来给予知识上的指导"，大多数学生仅仅是为了被一个高级的大企业雇佣而学习。结果，教育机构成了战前那样：拥有学生最多的学院是那些工程、经济和企业管理学院。

与联合王国的高等教育（这种教育对工业没有什么用处是众所周知的）比较起来，日本高等教育的这种特征是很明显的。在联合王国中（不包括苏

格兰和北爱尔兰），1974年有17万在校大学生，其中15%，即二万四千人左右是工程学专业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一年在日本，国家、公立和私立大学中的在校学生是159万人，其中21%即33万人左右是属于工程学院的。正如罗纳德·P·多尔所说，在日本有许多大学，“如果一只聪明的黑猩猩的保护人给这个学校的建筑基金捐献了一笔足够大的款项的话，这个学校也会把这只黑猩猩接纳入校的”。因此，把日本的大学全貌与英国的大学相比，几乎是不公平的。然而，作为一种规律，这样的大学由于它们需要如此多的钱，它们是不设工程学系的，所以那些读工程学的学生一般集中在有关的好的大学里。从1955年起，日本通过进口和改进外国技术，设法改善了它的生产能力，然而，这种技术改进仅仅是由于战争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不断地创办工程才成为可能。大量的这类改进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从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商品大量地打入国际市场，而这完全是这种技术改进的结果。

属于这类的好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日本对世界造船市场的控制就是由于日本成功地对焊接技术进行了极大的改进的结果。在这种成功的改进之前，日本最大能够造五万吨的油轮。采用新技术以后，

它开始能够生产五十万吨以上的完全焊接起来的轮船了。此外，它同时也成功地对引擎进行了改造，使它能够让庞大的坦克高速行走。在另一个领域中，人们有理由说，1964年奔驰在新干线上的“高速列车”开始运行，是乔治·斯蒂芬森以来铁路界尚未发生过的一种技术进步。日本国有铁道局1958年就决定修建这条“新干线”，这仅仅是在日本人民发誓要在当时彻底毁灭的状况下复兴他们的国家后的第13个年头。当像日本这样一个趋向于群体的社会完全掌握了现代技术的时候，它能够很容易地释放出可怕的生产能量。这种能量之大，甚至可能导致它自取灭亡。

然而，对自然科学（它是工程学的基础）的研究在日本一直受到忽视。1974年，在自然科学各系的在校大学生总数，还不到整个在校大学生总数的3%，即使是在京都和大阪这样的好的大学中，百分比也只有10%。联合王国的所有大学生中有24%是在自然科学各系，与这比较起来，日本的数字肯定是相当可怜的。科学教育强调工程学而忽视自然科学的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治时代。这种现象可以视为“日本的精神加西方的技术”的政策的自然结果。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一直就特别注意以最

快的速度引进西方的技术，改进它们，使它们适用于工业生产，以便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对于这些技术的学术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一类的根本问题，日本人并不希望自己去探讨。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的精神都在排斥科学——这个可以称为西方精神中的主要因素。难道不是这样吗？日本的大学不去大胆地对付基本的问题，而是不断地为国家、军部或者还有大企业的需要服务。只要有钱，日本就能继续购买外国的技术。结果，只要日本具有充足的工程学知识用以改进那些它所需要的技术并使它们参加到工业进程当中去，日本的工业在技术上就决不会比其他国家落后多少。在战争结束时常听人们说："日本的试验设施损失殆尽，将来在发展应用物理学方面不会有前途，因此，日本的物理学家除了从事理论研究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然而，战后35年的历史显示出，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倒是真实地存在着。

日本大学建立的目的在于把它的毕业生输送到企业界和政府。日本的孩子们被迫从早到晚地学习，就只为了一个目的，即进入一所好的大学。特别是那些为应付大学入学考试而学习的高中学生，在结束了正常的学时之后，还要到为准备考试而设

立的特殊的私人学校去上课。当他们从这些私人学校回到家的时候，一个大学生正等在家里给他们讲课，于是他们不得不再多学几个小时。这里不包括那些“甚至一个黑猩猩”也能进入的大学。正常大学的入学考试进行得很严格，也确实很公正。日本人认为，在这类考试中评定成绩的最公正的方法是把一个考生在各门考卷上所获得的分数全部相加的这样一种机械的方法。因此，考试题可能采取一种很容易提供机械的记分的方式。所有的父母几乎都渴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入大学。对教育的这样一种热情在一个儒教的社会中是决不令人惊奇的，因为在这里，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以他是否拥有钱财为基础来衡量的，而是根据他是否受过教育来衡量的。人们当然希望在日本父子两代人之间职业上的流动性大一些；但另一方面，一旦一个人被中、小企业雇用，他要转到大企业去就极为困难。因此人们预言说，日本一代人内部职业上的流动性是非常之小的。

这种推测的正确性可以被有关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性的调查所证实。在日本，对社会各阶层及其流动性的第三次全国普查是在1975年进行的，它产生了在表7中我们见到的一代人内部的职业流动

表7　1975年一代人内部职业流动状况统计a（%）

目前雇用状况		首次雇用								
		职业人员	大企业			中、小企业			农业	自由职业者
			管理人员	白领	蓝领	管理人员	白领	蓝领		
职业人员		75	*	*	*	*	*	*	*	*
大企业	管理人员	*	100	9	*	*	*	*	*	*
	白领	*	*	54	7	*	*	*	*	*
	蓝领	*	*	*	37	*	*	9	*	*
中小企业	管理人员	*	*	*	*	75	9	*	*	*
	白领	*	*	8	11	*	40	8	*	5
	蓝领	*	*	5	15	*	13	50	18	13
农业		*	*	*	8	13	*	5	62	*
自由职业者		7	*	14	11	13	24	22	10	72

a * 表示小于4.5%的数字，抽样的总人数为2,514人。

性状况的这幅图景。在这个表中，职业被分成为九类，每一栏的数字都表示所有那些首次被雇用在一个特定的职业类别（例如，被雇佣在一个大企业中当蓝领工人）中的人，现在在九种职业中的分布比例。为了使分布的情况更清楚，小于4.5%的数字用符号＊代替了。这些数字可以被忽视，只当它们

是零。如果我们把职业人员和大企业中的管理人员、白领和蓝领工人四类称作高等阶层，而把中、小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蓝领和白领工人、农民和自由职业者等五类称作低等阶层，那么，在上面右手和下面左手部份的数字则表示出这两部份人之间的变动状况。这就是说，上面右手部份的数字越大，从低等阶层向高等阶层变动的速度也就越快，而如果下面左手部份的数字大的话，通常表示向另一个方向的运动。在表7中，除了最初受雇于中、小企业做蓝领工作的9%的工人现在在大企业中从事蓝领工作之外，其余所有在上面右手部份的数字都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总的看来，从低等阶层向高等阶层的移动很小（除了一小部份蓝领工人之外），与此相反，从高等阶层向低等阶层的移动（特别是向自由职业者这类职业移动）却相当普遍。这就是说，毕业时在高级职业中就业，是永远处在高等阶层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却不是一个保证。表7不仅证实我关于双重结构的观念，而且也说明了一个人的学历是多么重要。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我的第二个推测，即日本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变动是否很高。在表8中，职业被分成为八种。每一栏显示的是父辈在世时主要

表8　1975年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变动状况a（%）

		父辈的职业							
		职业人员	管理人员	办公室工作	推销	技工	半技工	粗工	农工
子辈的职业	职业人员	37	9	10	6	6	8	*	*
	管理人员	15	28	24	11	8	11	6	6
	办公室工作	24	26	27	21	14	15	10	11
	推销	7	11	17	30	10	11	6	9
	技工	5	10	14	16	39	25	32	17
	半技工	7	10	10	11	11	23	25	16
	粗工	*	*	*	*	6	*	11	6
	农业	*	*	*	*	*	6	*	30

a *表示小于4.5%的数字，抽样调查的总人数为2338人。

从事的职业，而每一行则是子辈的职业。每一栏中的数字显示了那些父亲都从事同一职业的儿子们的各种职业的分布比例。小于4.5%的数字用符号*来表示。前四类职业是非体力劳动，而其余四类职业可以一起归在体力劳动的名下。这个表中的数字显示，两代人在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职业之间的变动，远比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一代人内部的高等和低等职业间的变动要大得多。此外，富永先生（表8即参考了富永所制的统计表）的原表显示了从体力劳动的职业向非体力劳动的职业的移动要比相反方向的移动（即从非体力劳动向体力劳动的移动）

大，这就说明在日本经济内部，存在着一种非体力劳动增多的趋势。

这样看来，表8似乎支持了我的推测。不过，必须说明，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与1972年制的英国两代人之间阶级变动的一张表作一个比较的话，必须承认，日本的变动无论如何是较大的。但事实上，我们注意到，在从体力劳动向非体力劳动移动方面，日本和英国基本上是同样大的，而相反方向的移动（即从非体力劳动向体力劳动的移动）方面，英国则要比日本大得多。英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两代人之间阶级变动非常小的国家，而日本人心目中的日本则是一个变动比例非常大的国家。这种自我感觉并非是建立在客观的两代人的比较基础上的，而是受到渴望、幻想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一代人内部的社会低等和高等阶层之间的变动极小（一旦某个人被固定在低等阶层，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要逃离这个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深深地铭刻在日本人的头脑中，因此，他们认为两代之间的移动肯定会很大，其实它是相当小的。

尽管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孩子们都被卷入大学入学考试的残酷竞争之中是事实，看到日本两代人

之间的阶级变动大致与英国相当、甚至更小，无论如何都令人感到惊讶。也许这是因为那些来自非体力劳动职业家庭的孩子们被送进私人补习学校并从小就接受家庭教师教育的缘故，结果他们在答考试题方面就比农民和工人的儿子具有更强的技巧。此外，由于入学考试题和出题方式是机械式的，因此，考试中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一个人是否掌握了这种技巧，这样说也许是真实的。东京大学据说是集中了全日本最优秀的学生，该校学生的社会背景最近也变得在社会等级上越来越高，因此该校经常被批评说，它正在变成一所资产阶级子弟的大学，而不是一所最优秀学生的大学。在一个儒教社会中，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纯粹是根据他本人所受教育的程度，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也会像孩子的社会地位要由老子的财富来决定的资产阶级社会一样地不公正。再者，由于日本的少年要被迫在正规的学校中学习六小时，在私人的补习学校中学习三至四小时，再在自己家里学习四至五小时，即每天要学习13—15小时左右，这种“剥削”程度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童工所受的几乎毫无二致。某些日本的经济学家说，正是由于孩童时期有这种艰苦的工作和严格的纪律，才使得日本工人的素质如此

之高。然而，请一定不要忘记，这也导致了他们生命的毁灭。

4

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大小城市，除了几座历史名城如京都和奈良外，几乎全部毁于战火。不仅大量的居民没有住房，而且生产设备也全部被毁。此外，在以前日本占领的土地上工作的大量日本人及其家庭，随着军队一起回国。这些人回国后，必须支付生活补助费和复员费。战时积累起来的购买力此时也释放出来。不出所料，日本的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战争期间，大量的工人被转移到机器工业和军工生产上去，而消费品生产中劳工短缺。在三十年代，日本在从消费品生产急剧转向军工生产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现在，它不得不极迅速地进行相反方向的转移。然而，在这样一个贫国的社会中，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发展余地是很有限的。每个人直接从农村弄来蔬菜，鱼也是直接从船上进入个人的厨房，肉也同样如此。由于城镇居民把钱全

用来购买食品，就很少买新衣服了。那些在空袭中幸存下来的人，把自己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最好衣物拿到农村或渔村中去交换大米或鲜鱼，因此，农民和渔民对衣物的需求多少获得了一些供应。这是一个连压在箱底已经被忘记了的最好衣物都被从城镇拿到农村去代替货币的时代。由于超过军工和机器制造工业需求的过剩劳动力不可能全部被吸收到消费品生产中去，因此，一部份劳工便返回了农村，他们原来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但是，从日本全国来看，耕地是不足的，农村容纳这些劳工的能力极为有限。街道上到处都是这些不能务农的人。结果，他们只好在黑市上工作以勉强糊口，也有人以给黑市提供商品为生。

日本的官僚机构在此以前一直在固执己见的军部后面熟练地充当着二等政府的角色，因此在占领军的下面，它也能够很容易地证明它的能力。正像有时人质和他们的扣押者之间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和友好关系一样，日本政府很早就成功地和占领军建立了一种和睦的关系。由于得到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积极支持，1946年8月，建立了经济稳定委员会（E.S.B.），1947年3月，麦克阿瑟发出一项指令，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果断政策，给经济稳定

委员会以优先权，以便找到一条对付当前经济危机的出路”。经济稳定委员会立即被扩大，吸收了一批杰出的年轻官僚和企业家。后来这些人几乎都在官僚机构、政治、企业或学术界中成了名家。不管怎么说，日本的基本权力结构实际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在这个结构中，就是要依靠第二政府的“管道”，使第一政府、即真正的政府（在这里是盟军总司令部）能够按照它认为应该遵循的路线来指导经济。

麦克阿瑟的指令是要“采取给经济稳定委员会以优先权的果断政策”，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能力采取果断政策。因为占领军自己就不果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方向上来了一个完全的转变），日本政府已经成了它忠实的“代理人”，要它显示出果断是很不可能的。不过，由于新路线的方向对日本有利，因此，政府和企业界都全心全意欢迎这个方向性的转变。在这以前，日本为了能够进口食品，不得不一直出口商品。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日本此时能够出口的唯一商品就是生丝。战前棉服业生产最高峰时使用的设备，有30—40%未被战争毁灭，但由于原料供应不充分，即使是这些设备也不能全部运转。在进口不能进一步增加的

情况下棉织业也无法生存。在明治政府向西方开国时，生丝的出口是工业化的起点；而在麦克阿瑟政权统治的早期，日本政府可以使用的唯一资力也是生丝。在日本国人被绝望压得发狂时，盟军总部方向性的转变对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幸事。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军的“特需”给日本的纺织业带来了它历史上最近的这次大兴旺，钢铁和有色金属部门也掀起了一个繁荣的浪潮，不仅如此，而且冷战当时愈演愈烈，西方国家（除了美国）都忙于它们各自的复兴，在这种形势下，拼命逼日本付出赔偿费，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合适的政策。如果日本被战争赔偿严重地削弱，那美国将要成为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的唯一国家，这将进一步加重美国人的负担。鉴于冷战正在进行，美国教育日本人进行合作是很必要的。结果战争赔偿的负担被大大减轻了。那些受到日本左翼批判的诸如重整军备和垄断资本复活征兆的动向，当然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欢迎。经济稳定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在美国身上的橱窗，同时也是美国在日本身上的橱窗。在它的鼎盛时期，甚至被称作是“使婴儿停止啼哭的经济稳定委员会。”这是那句旧话“甚至能使婴儿停止啼哭的帝国陆军”的套用语，

它说明经济稳定委员会的年轻官员就像过去的年轻陆军军官一样自负，从而也说明尽管战争结束了，日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并未经历任何根本的变化。

纺织品成了日本第一出口商品，但是，在这种产品还是主要出口商品的情况下，经济显然不可能发展。当时要进入中国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也都正处于在纺织业方面自给自足的过程之中，因此日本能够出口的数量是很有限的。由于轻工业的前景并不光明，日本不得不再次转向发展重工业。那时，朝鲜战争造成的“特需”的繁荣似乎还要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因此，铸造业各厂家使设备现代化的投资在不断增加。例如，川崎制铁公司新建的千叶铁厂就是座落在西海岸的一个巨大的最现代化的工厂。日本用现代化的制铁工业作为机械工业所有部门发展的一个基础是完全可行的。面对着日本工业战后的第二次改组，曾经在第一次改组行动中起司令部（或称从属于盟军总部的代理司令部）作用的经济稳定委员会随着盟军占领的结束而被解散了。它被经济企划厅所接替，这个机构不再拥有以前经济稳定委员会的那种“甚至使婴儿停止啼哭”的权力。

第二次工业改组中的主角是由通产省担任的。

经济企划厅在公开表达政府对企业的指导意见方面不再扮演主角，它愿意扮演一个更为幕后的角色，充当政府工业控制的主要管理机构，并负责制定政府的经济计划。正如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一样，战后历届内阁也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政策目标。1955年，鸠山内阁公布了“经济自力更生的五年计划”，其目标在于平衡进、出口贸易、充分就业。此后，一届又一届的内阁都公布了自己特定的经济计划。在这些计划中，最著名、也确是最成功的是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它的目标是要在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其他的计划则不然，如大平内阁公布的“新的七年经济计划，”在一年半时间里就失去作用了。

由于政府并不具备强制推行这些计划的权力，经济的实际实施常常离计划的目标相去甚远，计划的许多内容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不过，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有关的政府部门、私人利益集团和知识分子的代表经常要审议，因此，这种“计划”的实际作用是增进了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中，“和”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国民都倾向于相信和谐即意味着倾听政府说些什么，这些发布的“计划”已经成了人们活动的指导方针。

这样，经济企划厅的贡献确实不能被忽视。不过，通产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执行甚至是无权强制推行的计划的权力，与它比较起来，经济企划厅虽然是强有力的经济稳定委员会的再生之体，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而已。

由于“新的长期经济计划”（1957年）和发展重、化工业的“国民收人倍增计划”（1960年）的被确认，工业政策即以下述方式付诸执行。通产省首先在重、化工业中指定应该发展的种类，它包括石油精炼、石油化工、人造纤维、机动车、工业机械、飞机、电子工业和电器等。然后给这些种类的工业提供绝对的保护和发展援助。最初提供的免受外国企业竞争之害的保护方式包括强制规定外国商品进口额以限制进口；采用进口特许证制度等方式直接限制进口数量；采用对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对国内产品实行优惠商品税等方式来间接管制进口。

此外，日本发展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政府财政机构给这些工业提供了低息资本，拨给补助金，并采取一些对它们有利的税务措施，如降低或免除通过出口来获得进口方面的公司税等，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工业的发展。此外，最主要的

是通产省和大藏省给这些企业以一定的行政指导：当它们认为产量过高时，它们曾建议棉纺、钢铁和化肥制造业减少生产；当他们认为投资过多时，他们曾建议石油化工、造纸和纸浆、以及钢铁业的企业对工厂和投资进行调整；为了稳定钢铁价格，通产省带头采用了公开出售钢铁的制度。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行政指导是属于通产省自己的行政权限范围之内的，但即使不是这种情况，只要通产省提出一种意见，效果也是很可观的。自明治时代以来，企业界一直是由政府来指导的，并且由于蜂拥在政府周围而获得好处。当占领军在政府之上行使统治时，情况仍然如此。政府对一些特殊的企业集团极为偏爱，而对其他一切企业则冷酷无情。因而，即便政府发出的不过是一个建议、一个要求或是一个通知，并且根本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但只要它是来自通产省，任何企业都害怕如果不遵照执行的话可能受到冷遇。这样，他们除了遵照执行外别无其他选择。在日本，被政府遗弃就等于降成了二等企业。结果，所有的大企业不仅把自己的首脑机构迁到了东京，而且把通产省和大藏省的前高级官员聘为董事，以便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

表9显示出这种工业政策获得成功的程度。那

表9　1948—1977年制造业装运的产品价值的最高（最低）比率（%）

	食品	纺织品	木材和木制品	化工产品	石油煤炭产品	钢	金属制品	普通机械	电力机械	运输设备	精密仪器
1948			5.8			(7.5)					
1949				14.1	(0.7)		(2.7)				
1950		21.5								(5.2)	
1951									(3.0)		(0.7)
1952											
1953											
1954								(4.8)			
1955	18.0										
1956											
1957						11.7					
1970								9.9			
1971									10.6		
1972											
1973	(10.2)			(7.2)			5.8				
1974											
1975					5.9						
1976											
1977		(4.6)	(2.7)							12.2	1.5

资料来源：工业统计表

些数字是每年制造业里装运的产品的总价值中，各类制造品装运价值所占的百分比。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只把每一类产品的最高和最低的数字标出来（最低价值的数字写在括号里）。例如，装运的食品价值的比例1955年达到最高峰（装运的制造业产品的总价值的18%），而在1973年则跌到了最低点（10.2%）。

从表9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消费品生产（主要是在木材和木制品中）恢复了，然后化工、纺织和食品工业依次恢复，大约到1955年，战时存在的那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向以消费品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的转变，或多或少地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接着，钢铁工业复兴，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重工业的发展。六十年代，出现了从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制造业转回到以重工业为主的制造业的变化过程；消费品中装运产品的价值的相应比例下降了，而重工业品装运的比例增加了。到七十年代，这种再转变的过程在某些部门已经完成了，工作母机（包括武器）、电力机械和设备工业的装运比例在1970年达到了高峰。金属制品、石油和煤炭产品在1973年和1975年分别达到了各自的高峰。与此相反，食品和化学工业的相应价值却在

1973年降到了最低水平。不过，运输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设备的相应比例1977年仍在增长，而纺织、木材和木制品的比例却仍在下降。无论如何，这个表证实了日本经济向重工业的再转变过程的完成的速度，是与战前发生的第一次这种转变的速度大体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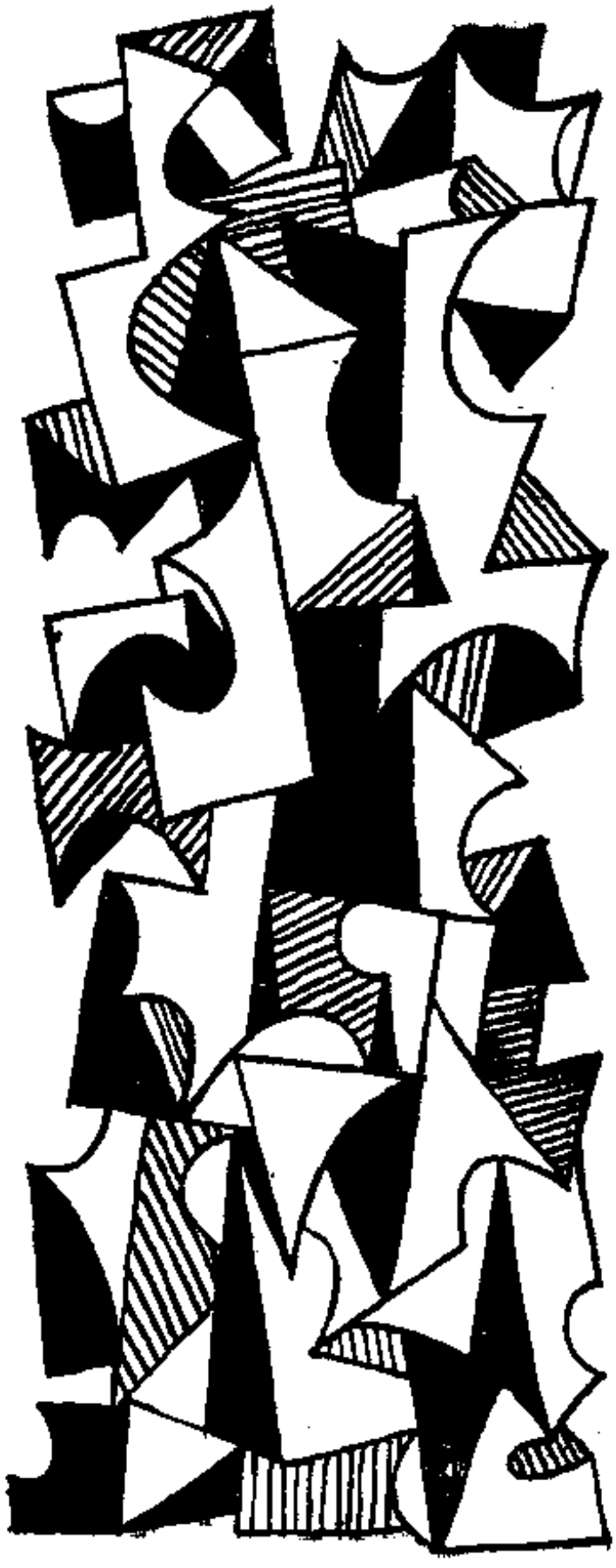
某些评论家使用了“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一词来比喻日本经济从属于这种由政府作出的强力工业政策的情况；另外一些人则把这种促进工业的政策看作是国家和人民合作的公式，或者看作是政府、工业家和金融家合作的公式。在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中，那些被指定为国家的战略性的工业受到仔细保护和扶植；而那些被政府认为是未来发展没有前途的工业，则绝对不可能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任何资本，它们被迫去自我奋斗。然而，这种把经济发展集中于某些重点项目的政策，战后一直在实行，并且不仅是那些包括在被选择给予优惠待遇的工业中的企业，而且那些被牺牲的企业，都支持国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这种政策是选择某些战略性的工业，通过牺牲其他工业来加强这些工业的不公允的政策。

日本成年人中间流行的这种伦理道德是与他们

的孩子们中间流行的那种竞争的伦理道德尖锐对立的，后一种伦理道德是通过把一个孩子在考试中所得的全部分数加起来的方式来判断他的能力的，在决定他入学考试的成败时，没有任何其他的判断标准可资利用。乍一看，这两种伦理道德的共存是不可思议的，它们甚至似乎相互矛盾。然而，如果我们记得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民最诚挚的愿望一直是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国民一直怀有这同样的抱负的话，那么，这一点也就变成很清楚了。流行于父子两代人之中的两种明显不对称的伦理道德事实上是适合于日本国内的环境的。为了有选择地加强那些能与西方进行有效的竞争的战略工业，优秀的人材只要可能，就必须集中在这些工业中；为了发掘出这样的人材，孩子们必须被迫相互进行无情的竞争。一旦这些天才的人物走上了他们的岗位，他们的任务就是发展和加强这些工业，为此，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可能获得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此外，日本的公司通过增强雇员们忠于公司的感情和给雇员提供广泛的训练来加强自己。因此，在雇员们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团结在一起的公司里，即使是从另外一个公司招募了一批天才的人员，也

几乎不存在他们可以起积极作用的余地，而公司也不愿意摧毁已存在于公司雇员中的这种团结。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重要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中的雇员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竞争，而那些成为这个国家队中的一员、并且接受政府各种优惠的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样是激烈的。没有这种前途的其他中、小企业被迫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不得不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这就是使日本到大约1975年在许多方面赶上了西方国家、并在某些方面设法超过了西方国家的战略。



结　论

世间基本上有两种宗教。第一种宗教由统治者统一在一个国家中，它是作为国家的合法性的保护人而存在，其作用在于使占统治地位的部落或部族的血统神圣化。第二种宗教不理睬那些统治者，它渗透到那些被统治（而不是统治）的部落和阶级以及那些没有高等地位的人当中，它是一种试图给这些人带来帮助的宗教。前一种宗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工具；而后一种宗教，如果不考虑它对现存制度的批判的话，至少可算是一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宗教。如果一种目标在于帮助被统治者的宗教是理性的，那么它将会对现政权采取强烈批判态度，并且这样的宗教会否认统治集团所信奉的任何神。同时，它们也将试图把所有非统治集团团结起来，形成一些新的反对派的政治集团或是一些新的神圣的运动。这种政治的或宗教的结合是建立在一种超越任何部落意识的理性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理性原则是一种任何人都必须服从的普遍的和万能的原则，不论他是哪一个部落。这种宗教的最高义务就是帮助个人，而不是证明权力的合法性。然而，也有一些其目的在于救助被统治者的宗教仍是非理性的，具有强烈的巫术色彩，在这些情况下，被统治阶级便被教导不去对政治发生兴趣，而去过一种秘

密的隐居生活，一味寻求长生不老和其他各种养生之道。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三种类型的宗教划分为第一类型（那种为统治势力辩护的宗教）、第二类型（目标在于帮助那些被统治者或个人的理性的宗教）和第三类型(目标在于帮助个人的神秘宗教)，那么，我们看到清教教义是第二类型的一个典型，而儒教和道教则分别为第一和第三类型。这意味着在西欧、例如在英国，培养起一个其精神世界的主要依靠是新教的现代文明社会；而在历史上的中国，官僚们为帝国政府的合法性辩护，而人民却完全对政治不感兴趣。

然而，在从中国引进了儒教和道教的日本国内，不仅是儒教，而且连道教也被改造成了亲政府的第一类型的宗教。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相比，对现政权的支持更为热心。在德川时代，它的作用就是证明幕府政权是天皇承认的合法政权的这样一种思想。在明治时代，它的作用是证明所谓“天皇政权”的合法性。道教的日本变种——神道教，不再能够被称作是第三类型的宗教，而变成了作为皇室这个统治家族的宗教。考虑到这种宗教是由统治氏族或统治阶级介绍到日本来的这一事实，

这种转变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日本不断地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国家（无论是中华帝国或是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技术上的差距。这种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意识使日本的统治阶级在同一时间内变得既有防御性又有侵略性。从其他地方引进来的一切东西都被日本改造成对保护日本及发展日本有用的因素。甚至佛教在日本也不例外，从上面提到的原则来看，佛教虽然随派别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是介于第二和第三类型之间的一种宗教。当佛教被引进日本时，它被尽可能地用来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服务。由于佛教当时在整个东方社会中广泛传播，因此，通过比较佛教在各国的繁荣程度，就可以对各国的文化水平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在圣德太子促进佛教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种企图，即通过佛教这种工具，使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尖锐冲突得到调解，不过也不能否认，其中还有试图提高日本在各国中文化地位的强烈愿望。

对同样的神圣经典进行不同的重新解释可能在广大人民中间带来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趋势，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西欧已经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了，而同样的现象在东方也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具有第一和第三类型宗教的中国，上等阶级放荡的生活方式

与下等阶级的贫困和惰性似乎永远是不变的（直到中国共产党兴起）。社会被窒息了，甚至朝代变了，这种窒息的状况也不会改变。然而，日本把中国具有的同样的宗教加以改造，使它们成为强烈支持现政权的宗教。因此，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轻易而迅速地使自己上升到能用西方的技术促进日本发展的地位。

由于日本仅仅拥有第一类型的宗教（一种为权势人物的地位提供统治依据和支持现状的意识形态），而没有任何第二类型的宗教（一种建立在怀有帮助人类的目标的个人基础上的宗教）。结果，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这里都不发展，而人民没有自己的宗教，已经完全变成了非宗教的（日本佛教中最大的宗派净土真宗，从原则上来讲，应该包括在我们的第二类型的宗教之中，然而织田信长挫败了一向宗起义后，它的信徒就不再反抗权势人物。）日本国民的这种不信教的状况使他们成为实利主义者，加上他们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为日本国家的物质繁荣而团结奋斗中，他们就不会有半点的犹豫。

这种倾向意味着日本经济很容易向右偏移，由于日本居民中的每个人都被民族主义意识严重熏

陶，因此，即使没有出现强力的领袖或独裁者，舆论的力量也能够（相当民主地）使一切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受到压制。在1932年以后的准战时政权时期，国民期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极右政府。报纸和其他宣传媒介拼命为这种民族愿望占卜，影响舆论并进一步煽动舆论，造成了一种人人希望法西斯上台的颇为风行的气氛。一旦这个进程的车轮开动，便无法阻止，而经济也就完全从属于国家的控制了。甚至在战后自由经济显然恢复了的时候，要保证舆论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当权人物的想法传达给了国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容易得到国民同意的，因为国民一直是受到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已经使他们丧失了抵抗的精神。结果，虽然战后年代各届内阁所支持的“经济计划”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它们却一直毫无问题地得到承认，而人民也一直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合作。如果我们把日本战前的政权称作民主的法西斯政权的话，那么，日本战后的经济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民主的‘计划’经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建立在第二类型宗教（一种目的在于解放个性的理性宗教）基础上的、在西欧获得成功的现代经济、即具有一种建立在技术和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工业的经

济，都在日本成功地被移植到了第一类型宗教（即目的在于证明现状合法的一种宗教）的基础之上了。

在儒教和道教中，中国具有第一类型和第三类型的宗教（神秘型和个人型的宗教），它的个人主义的成份比日本多，而民族主义的成份比日本少，日本的意识形态只有第一类型的。中国可以被看作是处于日本和西方之间的中间道路上，结果，它的情况与西方和日本都大不相同。中国的情况使得现代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和日本式的资本主义要想兴起都极为困难。中国的落后状况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蹂躏了它。

正如人们所盼望的，一场希望拯救国家的运动兴起了。1900年，一个提倡排外的神秘宗教团体义和团摧毁了铁路和电报设施、焚烧了教堂，并且进入北京，攻击了主要西方国家的公使馆占据的租界。这次暴力行动的爆发，正像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排外派采取的恐怖主义攻击一样，是一种狂热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国政府援助了义和团，但是他们最终被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一支联合军队打败了。

单独的爱国主义并不解决问题的教训，就这样被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了。由于日本的成功就在眼

前，因此大批中国留学生被送到日本去学习。然而事实证明，要在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任何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族团结结构，在中国要比在日本困难得多。因为中国儒教中的集体主义比日本儒教中的更少。

在中国，道教一般对政治不感兴趣，它提倡自己的信徒过一种神秘的隐居生活，但是它也不时显示出自己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并与儒教的政府发生严重的对抗。道教确实是一种目的在于拯救个人的、为人民的宗教，但不幸的是，它也是一种没有什么能力对现实生活做出有见地、有理性的判断的神秘宗教。任何能够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宗教不仅必须把拯救个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且必须是理性的。与明治维新（它不过是日本人的精神形态带来的一场政治结构上的革命）比较起来，中国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显然也是一场关于是否需要换换脑筋这种基本问题上的革命。

这样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在中国是绝对必要的。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变成了信奉儒教的官僚和信奉道教的农民之间的斗争史。即使王朝作为农民起义的结果而更替了，农民

们不久又处于新王朝官僚们的统治之下，继续生活于屈从、无精打彩的状态中，直到下一次起义爆发。

在日本，推进国家的近代化是为了扩大所谓的“千大差别”。近代化并不是在农村所有的地区中都进行，也不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步伐来进行。在国内的每一个部门中，都建立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与西方国家的相应企业比较，在所有方面都大大领先或者相等，近代化就是通过扩大这些核心部门来推进的。结果，日本在技术发展方面能够迅速地到达前列（至少在过去是如此），并且利用在这种方式中所学到的东西促进了其他部门的近代化。然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双重结构在日本牢固地生根，并且导致了被一小部份人（资本家和工人贵族）剥削的广大劳动的无产者的产生。中国共产党要消除这种性质的剥削，消除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这意味着在所有部门都达到技术前列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么大的国家的时候，这种现代化的方法可能会导致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人们也许可以说，日本曾进行了一次向近代化进军的强行军，而中国过去则选择了工农齐并

肩前进的漫长的“长征”道路。

不论是哪种情况，这些政治和经济的选择都是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配置的方式。同样真实的是，意识形态本身又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改造，甚至被经济发展所毁灭，而且这种反作用不能忽略。在本书中，我们所见到，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不仅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经常起关键性的重要作用，而且是它具有把日常经济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事情限制在这种意识形态所特有的结构中的作用。日本的成就并没有被限制在西方所取得的成就范围内，即使是在日本与西方的物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反过来情况也一样。如果我们把考察限制在短时期内，情况更是这样。由于它本身的意识形态，日本的经济与西方的自由企业制度很不相同。同样，中国的共产主义经济也具有与苏联经济很不相同的特征。因此，仅仅考虑到把中国和日本作为落后国家的可能的模式，是一个错误。

如果忽视了可以制约以后发展的自身历史，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进步。缺乏历史观点的经济政策同样是极端危险的。在日本被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在英国却不见得切合实际，反之也是一样；因为它们的民族精神气质、人民的行为方式、以及它们从

各自的过去所继承下来的所有其他文化特征都不相同。